

孔府内宅轶事

孔子后裔的回忆



孔府内宅轶事

——孔子后裔的回忆

孔德懋

天津人民出版社

孔府内宅轶事

孔德懋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 5 1/8 插页3 字数110,000

一九八二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八二年三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8,700

统一书号：11072·99

定 价：0.56元

前 言

孔德懋老人所写的《孔府内宅轶事》介绍了孔氏家族“衍圣公府”的大小事件，记述了她从童年一直到结婚离开曲阜定居北京以后的人事沧桑。在她的介绍之中，我们仿佛真正到了既有贵族的豪华，又有儒家简朴的衍圣公内宅，而且似乎还看到了“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一时贤者皆从之由”的楹联；又似乎亲身参加了隆重的祭孔大典和孔府的婚丧大事。

这篇回忆中，还介绍了闻名中外的孔林。两千多年以来，墓碑林立，坟茔垒垒，苍松古柏，倏然展现眼前，以及孔林的“风水”之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从而让津浦铁路路基为之改道的滑稽措施。

由于孔子是几千年来中外闻名的大学者、大教育家，从汉以来的统治阶级都崇奉孔教，自宋朝开始，将孔子的嫡裔袭封为衍圣公，民国廿四年又改为特任的奉祀官。由于这些原因，孔家这个贵族的地位，更不同于一般的贵族，他们在豪华之中，还要蒙上一层古朴的外罩，乃至太太小姐们的华贵服饰一概存于箱底，平日只穿布衣布鞋。因为他们经常接待中外的贵宾，所以备有最高级的厨师和最名贵而又分有等级的珍馐异饌。

文中还介绍了乾隆皇帝的女儿下嫁孔府的经过和“荣宠”。也提到了一些北洋军阀和蒋介石等人对祭孔的重视，以及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在祭孔时所闹的笑话。着墨不多，却深刻

地揭露了这些人物的附庸风雅和沽名钓誉的行径。

“小公爷”孔德成的诞生、结婚，以及抗日战争爆发后，仓皇出走重庆，都作了有声有色的描绘和揭露。

作者还提到了孔府家族孔继汾受到文字狱的迫害。以及《桃花扇》作者孔尚任的偃蹇生涯。她的高度的同情心慨叹了孔府这两位“叛逆”的悲惨结局。

作者对于她那丫环出身的生母王氏，有着无限的敬爱，对她的悲惨命运，又寄以深切的同情。她写出了这么几句话：“她做孩子的时候，离开了母亲；做母亲的时候，又离开了孩子。逃荒、被卖、挨打、毒死。这就是她一生的道路！一个美丽善良农家女儿的道路。我的母亲已经死了，但是这条道路不是还有人在走着吗？”寥寥数语，真不啻一篇蓼莪之章，一篇为千百万旧社会可怜妇女的控诉状！写她姊妹两人的遇人不淑以及和孔府有关的一些妇女的悲惨下场，也无一不是揭露和批判旧礼教的罪恶。

作者和她的胞弟孔德成，有着非常深厚的手足之情。在她婚后琴瑟不和的困境中，孔德成不断去信慰问，还附寄一些让作者深受感动以致至今还能背诵的诗篇，解除了她当时的寂寞。她还描绘了他们别后重逢的欢愉和激动，都象诗一样地温润着读者的心灵，令人为之悠然神往。假若他们姊弟能在暮齿华颠之际，再次聚首，那将会如何使他们激动和振奋啊！这是可能的，我们为他们寄以良好的祝愿！

最后，作者谈到了孔府的崩溃，好多县的祭田收不上租子，府内仍旧维持着送往迎来的表面豪华生活，实际上已陷入债台高筑捉襟见肘的窘迫境地，甚至连待客的二两酒，都得由仆人垫钱购买，而在空屋子的鸽粪堆中，还埋有散碎金子却无人知

道。这些细节的描述，都有力地抨击了封建大家族子弟之无能
和必然崩溃的发展规律，读来不禁令人联想到《红楼梦》中荣
国府式微以后的凄凉景象。

在这篇近十万字的回忆录中，我们看到了作者的情操，尽
管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之下，她对美好和丑恶，有着鲜明的界限
和强烈的爱憎。虽然深居简出，却也阅尽了人事沧桑，从而写
出了寓沉痛于欢愉，蕴悲凉于热闹的一些场面，把读者引到了
各种不同的境界。假若不是经历过人生旅途的坎坷，而又能在
荆棘纵横之中找到了正确的出路，那是很难写出这样深刻的文
章的。

整理人柯兰同志是作者的女儿，是一位青年教师。她以满
腔的热情和酣畅的笔墨，帮助完成了这篇具有史料价值的回
忆，牛刀小试，具见锋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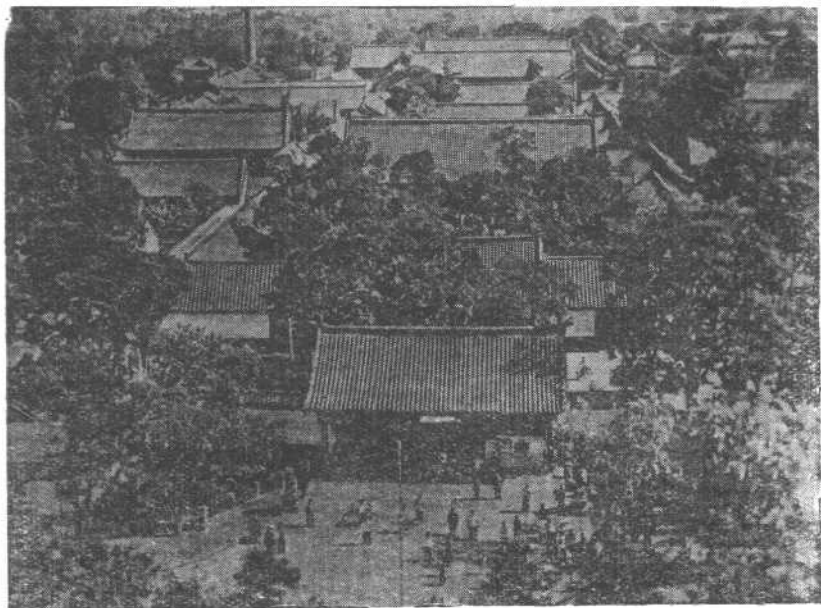
读了这篇文章以后，不禁为之击节称赏，欣然以一言志
之，聊作试射者之嚆矢云尔！

董一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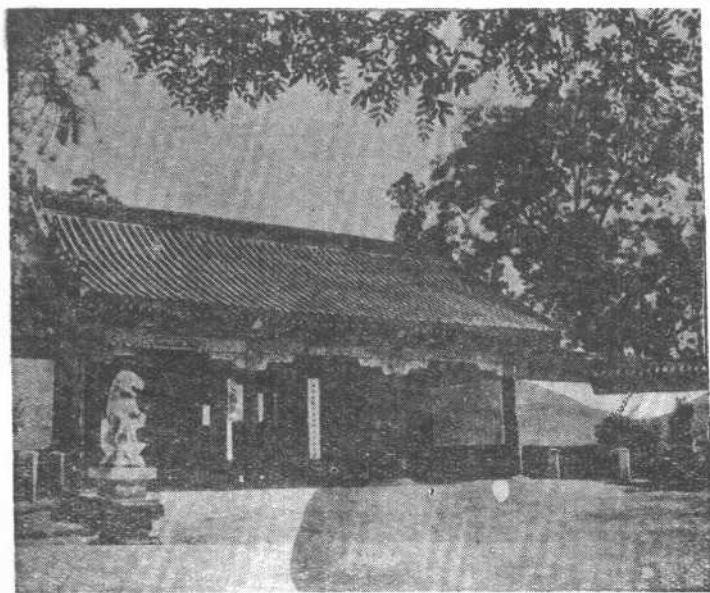
一九八一年五月于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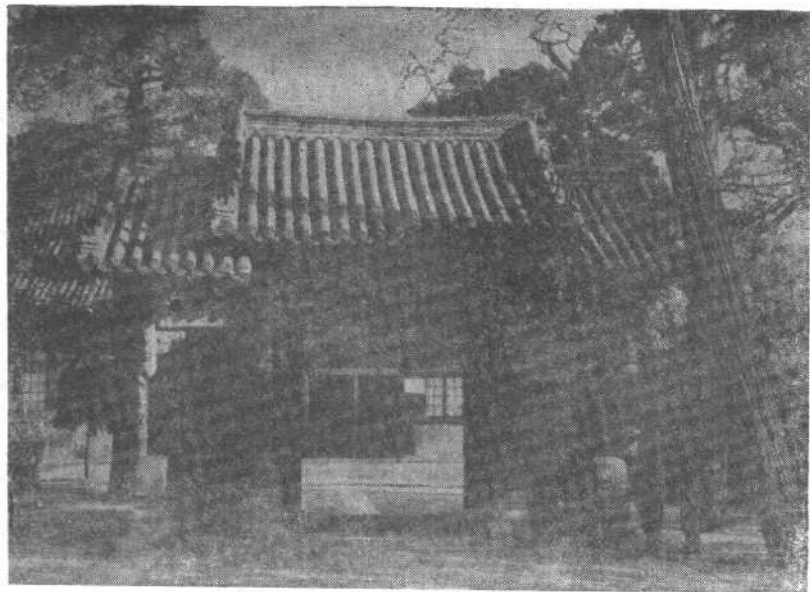
孔德懋与女儿柯兰



鸟瞰孔府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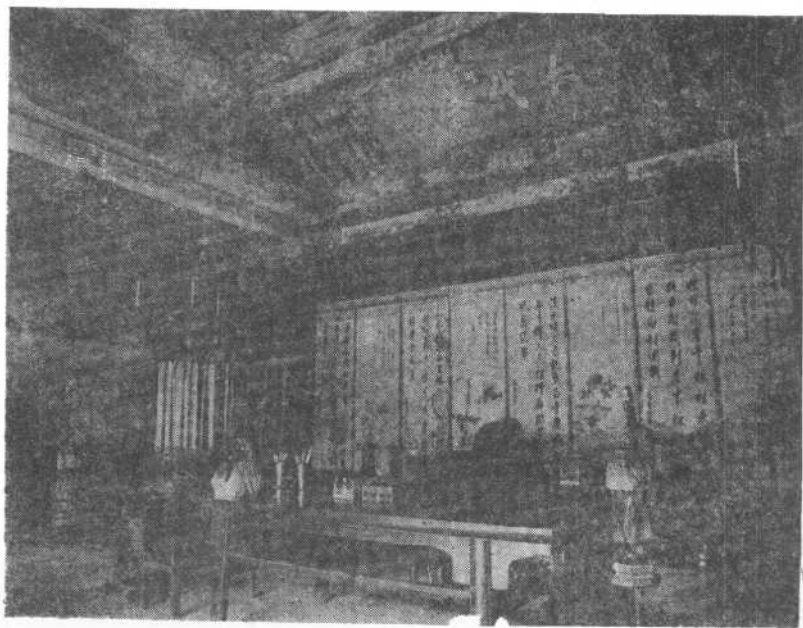


孔府大门



重光门

三堂内景





孔德成的生母王氏



孔令贻与女儿孔德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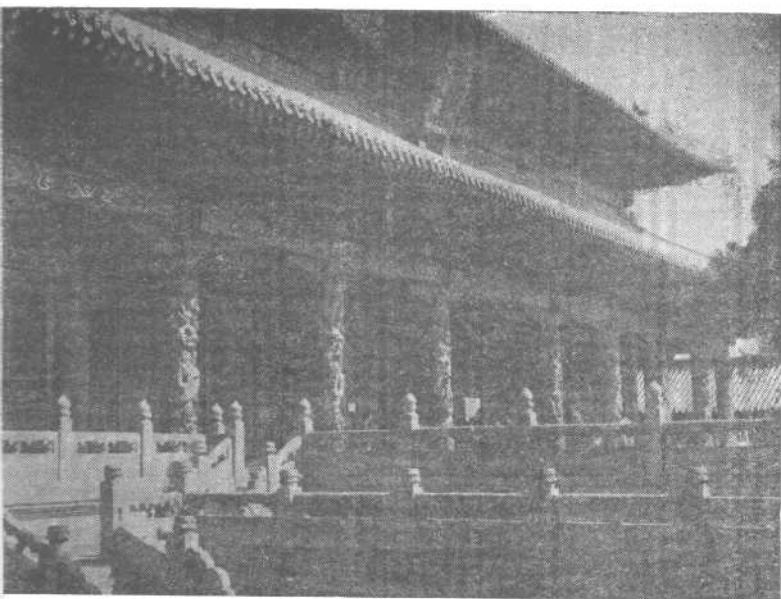
孔德成十六岁
就任奉祀官后留影



祭
孔

(前排中立者为孔德成)





大成殿



西关花园
(前从左至右孔德齐、孔德成、陶氏、
孔德懋，后中立者乳母王妈妈)

目 录

一、天下第一家	(1)
1. 孔府	(1)
2. 家族	(9)
3. 十二府	(18)
4. 世代恩亲张姥姥	(20)
5. 公主下嫁孔府	(24)
6. 家族殉难者	(28)
7. 祭孔	(34)
8. 丧礼	(40)
二、我的父亲和母亲	(46)
1. 我的父亲孔令贻	(46)
2. 小公爷的诞生	(54)
3. 陶氏	(58)
4. 母亲之死	(63)
5. 一个被遗忘的人	(69)
三、内宅生活	(71)
1. 禁地	(71)
2. 童年	(30)
3. 乳母	(85)
4. 家学	(88)

5. 年节	(94)
6. 府菜	(99)
7. 传说	(103)
四、动乱时期	(111)
1. 穷	(111)
2. 《子见南子》的风波	(117)
3. 阎冯战事	(121)
4. 曲阜沦陷	(123)
五、我的小弟孔德成.....	(128)
1. 手足情	(128)
2. 大婚盛典	(139)
3. 奉祀官	(143)
六、重返故乡	(151)
后 记	(155)

一、天下第一家

1. 孔 府

在孔子的故乡曲阜，城里有一条整洁的马路叫阙里街，街上有一座宫殿式府第，坐北朝南三启六扇镶红边的黑漆大门，门额上高悬蓝底金字“圣府”竖匾，两侧一副金字对联：上联是“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下联是“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门板上有狮子头形的大铜门环，门前蹲着一对精雕的大石狮子，迎面是宽大的粉白照壁。这就是孔子后世嫡孙长支、历代衍圣公的府第，也是我的家——孔府，人们通称“公府”。

从孔子到我这一代是七十七代，两千五百年来，我的祖辈世代居住在这里，所以孔子后裔又称为“阙里世家”。在孔子时代，阙里街只是城外一条小胡同；现在孔府大门旁边有两扇狭窄的小门，那是孔子故宅门。孔子一生很穷，相传当年只有三间小屋，后来建成殿，我小的时候常去玩，那里有一辆破车，据说是当年孔子周游列国时乘坐的，还有他用过的琴和书。孔子死后二百多年，汉武帝刘彻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定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孔子学说才受到重视，从此历代帝王不断给他各种谥封号：汉平帝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北魏称“文圣尼父”，唐代开始称孔

子为“圣人”，封为“文宣王”，元代再加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以后又加封为“大成至圣先师”，清王朝更进一步追封孔子先世五代为王，即：启圣王、昌圣王、贻圣王、裕圣王、肇圣王。

随着对孔子谥封号的增加，历代帝王对孔子后裔也一再封赐。我从刚记事的时候起，就常听老人们讲，孔府既是公爵之府，又是圣人之家，是“天下第一家”，比皇帝的家还要尊贵。皇帝只是一朝一代的大贵族，而孔府是两千多年来世代代的大贵族。从汉高祖刘邦开始，封孔子九世孙孔腾为“奉祠君”，汉元帝封孔子十三世孙孔霸为“关内侯”，唐玄宗又将三十五代孙孔燧之提升为“文宣公”，宋仁宗为使圣裔繁衍，世袭不断，将“文宣公”改为“衍圣公”，明代又将“衍圣公”由三品官升为一品官，列为文臣之首，明清时还特准许衍圣公在皇宫御道上和皇帝并行，在紫禁城骑马，还陪同皇帝“临雍”（视察学务），衍圣公每次来京，诸贤后裔，五经博士，四配十二哲百十多人都随同前来。从宋朝宋仁宗封孔子四十六代孙孔宗愿为“衍圣公”，直到七十六代我的父亲孔令贻，代代世袭衍圣公的封号，已经继续八、九百年了。

宋朝以前，孔子后裔在阙里的宅第称为“袭封宅”，宋仁宗景佑五年（1038年）始建“衍圣公府”，以后历代均有所扩建。孔府占地二百多亩，有厅、堂、楼、殿四百六十多间，还有一些门坊、花园等。雕梁画栋，飞檐彩拱，奇花异石，凉亭曲桥，称得上是中国最大、最豪华的贵族府第。整个布局是前衙后宅，分为中、东、西三路，与北京故宫相似。中路前为官衙后为内宅、花园，西路是衍圣公接待贵客、学礼、读书的地方，东路有家庙、祠堂，还有亲属的住所。二门里有座“重光

门”，是在院中孤零零地盖起一座双层飞檐的门坊，斗拱建筑的屋顶，八个倒垂的木雕花蕾，门下有石鼓夹抱，左右无墙，平时关闭，从两侧通过，只有在皇帝出巡或祭孔时才能在十三声礼炮声中打开。这是一般官宦人家所没有的，只有列士封侯的邦君才有资格建造。据有关史书上记载，历代帝王中曾出巡到孔庙的有汉高祖、汉明帝、汉章帝、汉安帝、魏文帝、唐高宗、唐玄宗、周太祖、宋仁宗、清圣祖、清高宗等，共十一个皇帝、十九次出巡来过这里。这是历史上所有的贵族之家都没有得到过的皇帝“宠幸”。民国以后，蒋介石、孙科、冯玉祥、孔祥熙等国民党要人都亲自来过。

孔府的西侧，一墙之隔，便是气势雄伟、金碧辉煌的孔庙。孔庙更大，有三百多亩，古木参天，碑碣如林，厅、堂、殿、庑四百六十六间。在正殿大成殿前的平台上，围着曲曲折折的汉白玉栏杆。双层飞檐下有十根龙柱，每根都雕镂着石龙，以及明珠、云头，镂空雕刻，功力极深，在阳光照射下，只见云龙飞舞而不见石柱，连北京故宫龙柱也不能媲美。据说每当皇帝来此出巡，十根龙柱都要用黄绸包裹，以免引起皇帝忌讳。孔庙里还有我国的十大名楼之一藏书楼奎文阁，高耸入云，光彩夺目。我小时候就常听人念叨古诗中有赞美奎文阁的句子：

“嵯峨俊阁入宫墙，上有云梯百尺长。”

此外还有孔子讲学的地方——杏坛，孔子教给儿子习礼的地方——诗礼堂，孔子夫人亓官氏的寝殿，孔子手植古树，十三碑亭，以及自鲁以来汉、魏、宋、元、明、清的大量珍贵石碑、门坊和其他古迹。

孔府的北面，穿过三里多长古柏森森的神道，就是孔子及

其后裔的墓地——孔林。孔林内老柏古桧，青翠苍郁，四周林墙长达十五华里，占地三千多亩，是我国最大的人造园林。六十多座楼、亭、殿、堂隐现在密林深处，还有上千的古代碑碣和丰富的地下文物。

孔府、孔庙、孔林，合称为“三孔”。“三孔”古迹驰名中外，对于研究古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建筑、书法演变等，都有珍贵的价值，因此素有“东方文化宝库”之称。在过去，孔庙、孔林都属于孔府，要由孔府统一管理。

此外，明代皇帝又在北京钦赐宅第，设立孔府在京的官邸。初赐宅在东安门外，后又改在正阳门里，明英宗时又在西单太平寺街赐宅，也称做“圣公府”。

孔府的管理机构设在中路前部大堂前东西两侧，分为六厅，很象封建王朝的六部。典籍厅、司乐厅，掌管祭祀的典章和音乐；掌书厅、知印厅掌管文书和大印；管勾厅掌管祀田收租；百户厅掌管林庙、守卫。六厅的官员有知印官、书写官、掌书官、司乐官、典籍官、管勾官、百户官等，一般都是四品官员。此外还有孔府总管、管家、师爷、帐房、祭祀官员等等。

六厅正中的大堂是衍圣公宣读圣旨、审理重大案件的地方。大堂中央有一彩绘云朵的暖阁，内有披着虎皮的太师椅，前面长长的红漆公案上摆着文房四宝、大印、令箭、令旗。两旁摆满了正一品爵位的一百多种仪仗和云牌銮驾、锣、伞、旗、扇和各种官衔牌，“肃静”、“回避”牌、堂鼓等，那场面如同京剧舞台上表演一样。

二堂正中挂着“钦承圣绪”和“诗书礼乐”的大匾，是衍圣公会见四品以上官员及代替朝廷考试礼学、乐学童生的地方。

三堂也叫退厅，是衍圣公处理家族纠纷和府内仆役问题的地方。

这大堂、二堂、三堂，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就从没有用过，空有摆设而已。我生活在孔府的时期，内宅日常府务主要是由设在三堂院内东西配房的司房和册房处理，司房是管理财物的帐房，册房是管文书、档案的书房。大门里的西边还有赍奏厅，又叫外西房，专跑京差还兼传达。过去赍奏厅的赍奏官是六品，平时相当于七品的知县有事来到孔府，只能在此等候，由赍奏官向内禀报，不经特殊允许，知县不许进入二门。

听老人们说：过去孔府的土地很多，在清朝盛时大约百万亩，有数十万户佃户，分布在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河北五个省的数十县。管勾厅掌管收租，佃户交了租，帐房就在户册上打个勾，所以叫“管勾”。因为地亩多，孔府管勾厅在外地还设有管勾衙门（主要在巨野县），下面还有屯官、总甲、小甲等，小甲就是各庄的庄户头，直接向农民收租子的。

孔府在鲁西南的两千大顷地是按五屯、六厂、十八官庄管理的。五屯是郓城、巨野、平阳、东阿、独山；六厂是巨野、平阳、郓城、及独山三屯，十八官庄，在曲阜有十二个，泗水有四个，邹县有两个。

较远的土地和外省的土地管理很混乱，因为孔府的土地是皇帝赐给的“祀田”，是把地租收入用来祭孔的，孔府无权买卖；佃户可以转让，同时每逢改朝换代，祀田数字也有增减，有些就查不出了。

除大量祀田外，衍圣公个人还有近百顷私田，如同一般地主的土地一样，可以变卖，叫“汤沐地”。还由于孔子的原故，曲阜县有免粮地数百顷，轻粮地四千多顷。

在赐祀田的同时也赐佃户，叫“钦拨佃户”，也有自己租种祀田的，叫“寄生佃户”。另外还有钦拨的“庙户”，是洒扫林庙的。这些佃户和庙户统称为“户人”，属于孔府的“户籍”，不编入地方保甲，也减免对朝廷的徭役，但负担着孔府派给的各种劳役。“户人”中有各种不同的分工，有“屠户”、“猪户”、“羊户”、“牛户”、“笞帚户”、“挑祭户”、“鸭蛋户”、“菱角户”、“香米户”、“择豆芽户”等等，世世代代为孔府从事屠宰、养猪、养羊、养牛、绑笞帚、挑祭品、供应鸭蛋、菱角、香米、择豆芽等单一的劳动。还有“花炮户”、“吹奏户”，专在孔府年节、祭祀、喜庆寿筵时来放花炮、吹奏乐器。“司茶户”、“烧水户”，专来给客人斟茶、烧水。“冰差”、“林差”，专为孔府运冰、打柴。另外还有“哭丧户”，专在孔府死了人时来跪棚哭灵，这种“哭丧户”在清末以后逐渐取消了。

这些佃户、庙户都属于衍圣公府的“民”，衍圣公府就是“户人”的“父母官”。“户人”如有民事纠纷打官司，要找衍圣公府而不能找当地县政府。有的事如果需要找县政府，也必须先通过衍圣公府。孔府有“信票”，相当于“逮捕证”或“拘留证”，可以拘押任何小宗户及佃户、庙户，可以开堂审讯并且制刑。持一只大堂上的绿色令箭，即可把抓来的人打四十板。孔府有皇帝赐给的雁翅钺、金头玉棍、虎尾棍，用皇帝赐给的这些凶器打死人不用偿命。在孔府还有东房（刑房），又名“四路常催”，即管催租、抓人、监押人及送远信。据说当年此屋里摆着些红棍、笞板、甘广棍、牛尾鞭、锅板枷等各种刑具。府内一份档案记载，清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东房人役达二百四十四名之多。但上述这些“信票”、东房、开堂

审案等等，到了清朝末年就随着封建制度的逐渐衰败而取消了。

孔府占有的土地，每年收入多少地租呢？根据有关材料记载，清朝盛时估计每年有五万两到十万两的收入。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商品粮食在市场出售，以及“户人”交的大量实物，而且皇宫每年还有俸禄和赏赐。我的父亲孔令贻有年俸数千元。明朝以后，孔府还设有卖官制度，朝廷给孔府一些官员名额，可以出卖，每年有几十万两收入。每年有这么多的收入，而孔府的主人不过是几个人。怎样消费掉这巨额的钱粮租银呢？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来祭孔，其次是向皇宫进贡，给地方官吏送礼，仅是向皇宫进贡，每年就要有好几次。

除了祭孔和进贡送礼外，就是孔府本身的生活消费了。孔府虽然只有几个主人（如我小的时候，不过是四个人），但却拥有包括管家在内的数百名仆人，听说最多时达到七百多人，平常总在五百人左右。孔府的仆人大多是世袭的，祖祖辈辈在孔府当差。按孔府的规矩，如果当差的死了，他儿子还小，不能来干活，则临时找人顶替，待成年后，仍由其子世袭当差。

数百名仆人中只有内府十多名女仆，其余都是男仆，待遇最高的是男仆中主要当差的和内宅里主人身边的女仆。他们之中有的在外面有房产和土地。我父亲的老当差的屠世奎，因为在我父亲发丧时，德成刚一岁，由屠代替“摔盆”，打哀杖，就赏给他一个庄子。我的小弟德成的乳母，也被赏给一个很大的菜园子。孔府内的小当差的要侍候他们，叫他们“爷”，颇象皇宫里大太监和小太监的关系。这些老当差的世代在孔府当差，礼教观念很强，读过些古书，也很讲礼节，穿着长袍。男仆外出时都骑马，女仆外出坐轿，别人常误认他们是孔府的主人。他

们也常代替主人外出办事，孔德成结婚，就是派他的当差吴建章去北京迎亲；我的父亲孔令贻在北京病逝，也是由他的当差赵庆具名向内务部递呈文。特别是老一辈的仆人在孔府小主人面前以长一辈自居。我祖父时内宅的女仆金三姑娘和项二姑娘，在我父亲当衍圣公的时候，她们仍住在内宅，有专人服侍，好象是我父亲的长辈。

但是象这样有身份的仆人毕竟是少数。孔府内一般的仆人，都规定有很严格的规矩，看大堂的不能进二堂，看二堂的不能进三堂，越往里走，等级越高，界线是很分明的。孔府虽然有这数百名仆人，但每逢年节或红白事时，还要有许多“户人”来干活。

孔府仆人的待遇不同，“八房”当差的待遇较高，其地位和职员相似。“八房”是：内宅、门房、司房、书房、慕恩堂、西学、跟班房、外西房。其余厅堂庭院、车栏、马号、花匠、水夫、茶炉、剃头等勤杂人员，都属于低一等。一个水夫每年口粮一千余斤谷子，大堂的小当差的（侍候大当差的），一年口粮六百五十余斤，喜庆寿筵，年节应酬，平日来客都要给赏钱，赏钱交帐房，统一分配，这是仆人们的一项主要收入。孔府卖粮食时，仆人要分“斗差钱”。还有的仆人在庄子上“入股”，帮助做点事或出些资金，每年也能多少分些钱。这些庄子叫“茶水庄子”。

孔府由于是世袭贵族，自己还可以养兵。“百户厅”相当于封建王朝的兵部，又称“林庙守卫司百户”，下设“百户衙门”，统辖“户人”中的大量健丁组成孔府所属武装力量。民国建立以后，改由北洋军阀给孔府派警卫，叫“奉卫队”，有三百多人，常驻在孔府的有一百五十多人。我小的时候，只有

一个连的马队驻在东学，连长姓刘，我们外出时，他常带着一些“奉卫丁”跟在后面。奉卫队的服装、装备都和外面的军队相同，只是由孔府领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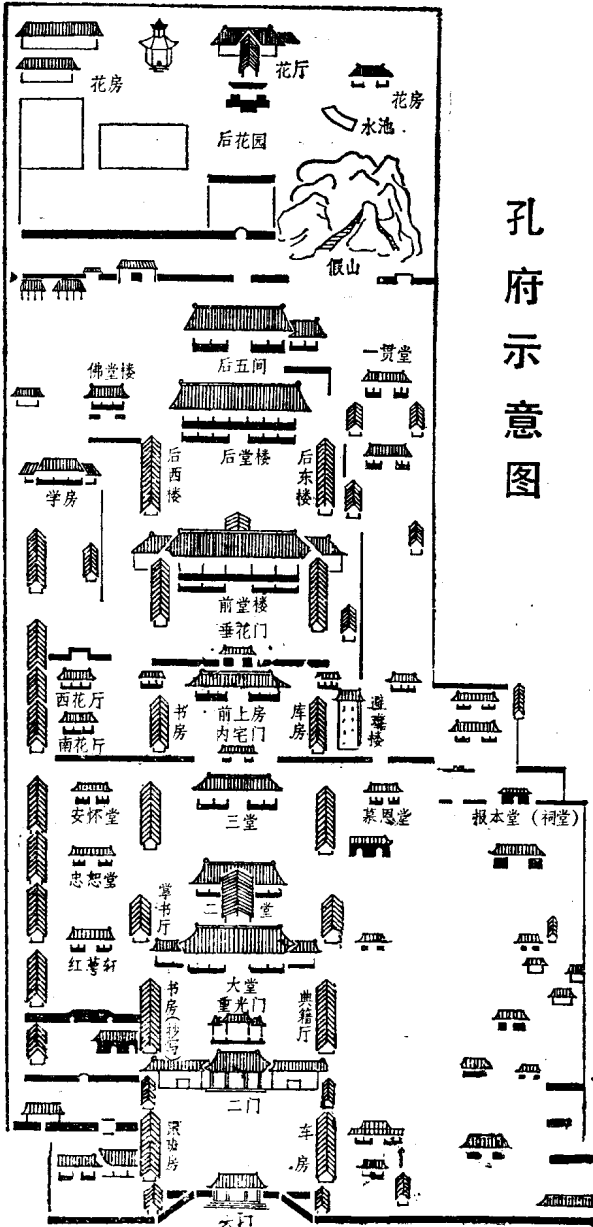
孔府因为是圣人之家，还有一套祭孔的组织，有礼生约八十名，乐舞生一百二十名。他们主要在祭孔时来，平时减免徭役。乐舞生是向孔府花钱捐来的，但花的钱并不多，当地有句俗语：“一个钱的萝卜，两个钱的葱，走到捐个乐舞生。”

清朝乾隆年间是孔府兴盛时期，那时开有钱庄——“顺兴店”，自己出钞票，流行好几个县。孔府根底厚，人们也信得过。清末孔府开始衰败了，土地变动很大，小甲、总甲等贪污敲诈现象严重，所收地租，比起开支所需，真是微乎其微。皇宫俸禄又几乎断绝。听老人们说，以前每年可得几十万，而我父亲那时年俸只两千。在这种情况下，顺兴店钱庄也就关闭了。不过那时虽然家境已衰落，但象孔府这样几千年继续下来的大贵族，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生活上有什么大的变化，总还维持着外强中干的奢华生活。听说在我父亲过三十岁生日时，曾大摆宴席十多天，翅供、海参高级席面七百多桌。

2. 家 族

传说轩辕黄帝有个儿子叫玄嚣，继承其父位为天子，修太昊之法，所以玄嚣又叫少昊。少昊死后葬于曲阜云阳山，现在那里仍然保存有少昊陵。在曲阜城东七、八里，叠石为坟，上小下大，很象埃及金字塔。这少昊就是孔氏家族的祖先。他的后世是殷商王家后裔，为诸侯、太子。少昊的第四十一代嫡长孙孔父嘉，做过宋国大司马，“孔父”是他的字，据史书记

孔府示意图



载：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姓孔氏”。他的子孙就以孔为姓了。从孔父嘉开始姓孔，孔子是第七代。

孔父嘉的第四代，也就是孔子的曾祖父孔防叔，为逃避宋国内乱，迁到鲁国定居。从此孔家便丧失了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

孔子有九姊一兄，兄孟皮有足疾，不能任祀事，其父纥与母颜征在共在尼山祈祷，盼望再有个儿子，果真生了孔子，于是取名仲尼。几千年来在曲阜流传着许多有关孔子生于尼山的传说。比如说孔子出生后相貌丑陋、顶如反字，中低而四傍高，面有“七露”：眼露筋、鼻露孔，耳露轮、嘴露齿（眼、耳、鼻均双方露，故曰七露），颜母以为是怪物，起先将他弃于山洞中，这时来了一只老虎为他哺乳，暑天，山洞中闷热异常，又飞来了一只老鹰用翅膀为他打扇，后来颜母才将他抱走，所以有“凤生虎养鹰打扇”之说。至今尼山还有那个山洞叫“夫子洞”，又名“坤灵洞”。

孔子的子孙七世都是单传，到了第八代才开始繁衍。孔氏家族人口没有过准确数字，现在仅在曲阜居住姓孔的约有十万人。因年代久远，时代变迁，还有许多散居在外地。散居外地的以河北省为最多，称为河西派，是阙里孔氏的一大支派。河西派的始祖是孔子三十一代嫡长孙之侄孔颖达，孔颖达为唐文学馆学士太常公。皇帝去世，他陪葬昭陵，全家迁居到西安守墓，自此称为河西派。至宋初，移居凉州，明初又迁到河间府南柯营。在南柯营又分为八支，居住在青县、沧县、交河、良乡一带。还有南宗派也是孔氏家族一大支派，南宋时期四十八代长子孔端友随宋王南迁在衢州，另立衍圣公府，称南宗派，居住在四川、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安徽的很多。四十八

代次子留在曲阜守庙，其后人袭封衍圣公爵位。

居住在曲阜的孔氏族一般称为阙里孔氏，又分内孔和外孔，孔子后裔叫内孔，也叫内院孔；孔末的后代叫外孔，也叫外院孔或伪孔（因为孔末本不姓孔，是冒充）。外孔续不上孔氏家谱，所以曲阜孔姓中有的人能续家谱，有的人不能续家谱，就是这样区分的。现在，内、外孔的区分在人们观念中已十分淡漠，许多姓孔的人自己也不知道是内孔还是外孔。

内孔又分为六十宗户，是从四十三代中兴祖开始的，这以前孔族支派主要有十派：平阳派、郟县派、宁陵派、献县派、丹阳派、岭南派、湖南派、临江派、浏阳派、鲁山派。中兴祖以后的孔氏支派，由十派改为六十宗户。

中兴祖有四个儿子，二、三子早死，失传；长子宜传下来到五十二代有六派：浣、沂、潞、治、澄、济；四子鬲的后人这时有十四派：淙、泄、演、淑、泗、滨、滋、浩、淋、滹、洵、泗、注、麟。这样合起来就有二十派。到了五十五代族人更多，于是分做六十宗户：宜的后人二十五户，鬲的后人三十五户，这六十宗户就是阙里孔氏家族的本支，六十宗户的名称如下：

大宗户	临沂户	孟村户	道沟户
滕阳户	旧县户	终吉户	蔡庄户
戴庄户	栗园户	时庄户	泗北户
店北户	西郭户	仙源户	泉南户
齐王户	盛果户	苗孔户	文献户
沂北户	冀门户	石村户	鲁贤户
沂阳户	孔村户	王堂户	小庄户

宫端户	华店户	古城户	冈山户
鲁城户	孔屯户	西城户	旧城户
吕官户	林前户	防西户	林门户
官庄户	大薛户	广文户	小薛户
陶乐户	北公户	纸坊户	董庄户
防上户	高庄户	南公户	星村户
古柳户	吴孙户	东村户	磨庄户
张曲户	息鄗户	西林户	林西户

衍圣公府是六十宗户中的大宗户，其余各户是小宗户。

大宗户和小宗户的关系完全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衍圣公就是整个孔氏家族的最高统治者。在孔氏家族中，宗、政合一，特别是在明、清时，宗法、族规极为严格。清顺治六年（1649年），皇帝下令衍圣公统治管理宗族人员，严格按照“礼度”办事。孔氏家族的族长要由衍圣公委派，（是五品执事官）赐治家藤杖。在曲阜还设有族长衙门。我所记得的族长孔传堦，是孔氏家族的最后一任族长了，那是一位白胡子老爷爷。民国以后，族长职务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他平时很少来，除了祭孔，人们很少想到他。只是在修家谱时，他是“四十员”的成员，几乎每天都来孔府，拄着拐杖，在长廊和庭院中蹒跚而行。后来，曲阜师范学校学生上演歪曲孔子生平的话剧《子见南子》，这位老族长被活活整死了。

族长以下还有“四十员”，是全族近支中德高望重的四十个长辈，共同商议族里的事。我的堂伯父孔令誉以及本家孔印秋、孔灵叔、孔继伦，都是“四十员”成员，先后都主持过府务。

六十宗户各户都要有“户头”、“户举”，属于地保性质，负责本户的祭祀、族务纠纷、词讼等。过去曲阜县的县长也由衍圣公委派。清朝中期以后，县长虽不由衍圣公委派了，但每次审理案件，都要按照衍圣公送去的帖子办理（帖子上写着衍圣公的意见）。县长也要执行族规，如果得罪了衍圣公就要被撤职。

尽管县长的地位远在衍圣公之下，但在封建官吏尔虞我诈的复杂社会环境中，各个时期情况也不相同、有的时候、有的事情，实权仍操纵在县长手里，衍圣公甚至不能过问，七十一代衍圣公就是为此招来了灾难。

在孔府的诗礼堂，贴着一张乾隆九年二月十七日的告示，是乾隆皇帝赐给孔府的三十个字做为行辈，凡孔氏家族都要遵照三十个字行辈取名；如果有不依字序，随意取名的，不准入家谱。这三十个字是：

希言公彦承 宏闻贞尚衍
兴毓传继广 昭宪庆繁祥
令德维垂佑 钦绍念显扬

全国孔氏族谱就是根据这三十个字排下来的，我的父亲是“令”字辈，我们是“德”字辈。小弟德成的儿子孔维益，女儿孔维鄂。

民国九年（1920年）冬，我的父亲孔令贻继这三十个字后，又续了二十个字，报北洋政府内务部批准并咨行各省县布告周知。续的二十个字是：

建道敦安定 懋修肇益常

不光孔氏族人要按字行辈，颜、孟、曾的后裔也一律如此。颜、孟、曾的后裔也都称为圣裔，都是世袭的翰林院五经博士，他们同孔府的关系，完全是小宗户同大宗户的宗族关系。他们给皇帝的奏折，需要交给衍圣公，由衍圣公转交朝廷。衍圣公赴京晋见皇帝时也总是带着他们同去，但皇帝不召见他们，只见衍圣公一人，他们可以和衍圣公一起在国子监演礼，在瀛台站班。

孔府还制定了合族同宗的族规，大体是这么几条：（一）祭祀“必丰，必洁，必诚，必敬”；（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三）“崇儒重道，好礼尚德”；（四）踊跃纳租；（五）孔氏嗣孙“男不得为奴，女不得为婢”；（六）“读书明经，显亲扬名，勿得入于流俗，甘为人下”。

根据孔氏族人不得做奴仆的规定，凡是姓孔的人去做奴仆，一律改姓，不入家谱。我记得孔府里有些当差的就是原来姓孔，进府当仆人后改姓了。

族规对妇女的束缚最为严重，有许多专门的单独规定，如：不许朝神拜庙，不许再嫁，女不为婢等等，特别是在婚姻方面，要在一而终，所以造成许多悲剧。如颜氏女许给孔闻训为妻，还没过门，孔闻训死了，这个十七岁的女孩殉夫自缢，于是在孔林门外给她立了“贞节”牌坊。在曲阜这种贞节烈女牌坊很多，还有孔府的近支四府里的“贤良大太太”，她订婚后还没结婚，男的死了，她抱着牌位拜天地，入洞房，下了花轿，脱下嫁衣换上孝服，从此守寡到死，几十年连院门也没出。还有东五府的本家，在八国联军时期父亲领兵打仗，战败

自刎殉国，消息传到十二府，他的儿子为对父亲尽孝上吊自尽了；儿媳将其夫收尸后，也上吊自尽殉夫了，皇帝赐给横匾“满门忠孝”，我小的时候，那横匾还挂在他家门上。象这类悲剧，在明清年间，孔氏家族里是很多的。

孔氏家族的族谱，在我国历史上最久也是最完整的族谱，自宋朝元丰年间建谱以来，一千多年谱系不乱，按旧例族谱是每六十年（逢甲子年）一大修，每三十年（逢甲午年）一小修。我的祖父孔祥珂小修过，最后一次就是我的小弟孔德成大修的。

这次大修距前一次大修已经一百多年，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前一次大修家谱是在乾隆甲子年（1744年），当时负责修谱的是十二府的孔继汾，因为被诬告触犯了清朝《会典》，遭乾隆文字狱迫害，被充军到新疆伊犁，死在那里，从此就没有再大修家谱。

小弟德成八岁那年，母亲陶氏和“四十员”商议修家谱。为此事筹备了两年，建立“曲阜全国孔氏合族修谱办事处”（简称谱馆），小弟德成是宗子，担任总裁，由族长孔传堉，“四十员”中的孔印秋、孔继伦主持日常工作。谱馆有职员六十六名，还有一些勤杂员役，办公地点设在大堂、二堂、三堂。三堂院里东西两厢十多间房腾出来当印刷车间，由济南聚文斋印刷所派来了三十多名工人，在屋里安装了机器，排满了铅字。平时冷冷清清的孔府顿时热闹起来。谱馆于一九三〇年夏历十月初十日告庙开馆，全国各地孔氏族人派代表前来参加，仪式在孔庙诗礼堂举行。七岁的德成穿着古代祭服，率领全族长老、族众有执事者，朝北面跪举行告祭。族长孔传堉宣读修谱誓词，读罢将誓词供在香案上，德成率众人行三跪九叩大

礼，然后众人又依次向德成作揖行礼。仪式完毕又在大堂设宴招待族人。大堂前扎起彩棚，鸣放鞭炮，吹奏乐器，我虽是女孩子，也跑出跑进，象过年一样高兴。

经过七年的工作，到一九三七年才完成这次修谱工作。那时德成已就任“特任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有些新式礼节了。谱成仪式仍在孔庙诗礼堂举行，将一部新修的家谱置放在香案上，德成先率领族众到报本堂告祭，然后到诗礼堂鞠躬四拜，执事者捧家谱授给德成，德成跪接，族众在德成身后依次敬跪。德成接过家谱后，族众又依次向德成作揖行礼。当天在大堂摆宴，大肆庆贺一番，德成并和各地族人代表合影留念。

在这次大修家谱中，各地有些孔氏族人因年代久远或生活变迁，过去没有续谱的，这次也续了谱。孔祥熙就是这次修谱时续的家谱。后来我听到一种说法，说孔祥熙是山西太谷县人，不是曲阜孔族，花了两千元买了个纸坊户。孔祥熙的祖辈究竟是不是曲阜孔族，我没有考证过，我所知道的情况是：明朝确有大量纸坊户从曲阜迁到山西太谷。家谱中记载孔祥熙的先世五十六代孔希翥是在明朝时迁到山西的。从孔希翥到七十五代孔祥熙这中间十九代也都是按照曲阜孔族字系行辈取名。

至于说孔祥熙花了两千元的事，据我所知，当时情况是这样的：大修族谱所需经费是向全国各地孔氏族人募捐，我曾看到过一本捐款的帐本，不单是孔祥熙，全国各省县都有孔姓族人捐款，少则一元、十几元，多至成百上千，记得滕县的孔繁蔚捐了五百元（孔繁蔚曾在山西当过军长，在山东当过厅长）。帐本上还记载当时曲阜县六十户捐款的数字是三千六百八十二元。外地支派捐款四千八百二十四元一角。孔祥熙是当时国民党中央财政部长，他捐钱多也是合情理的事。

在修谱中，六十六户各户的祠堂都要修葺，纸坊户的祠堂在孔祥熙续谱前就有，地址在户首孔广梁家的西边（曲阜城北小孔家村），因年久失修，旧祠坍塌，在修谱中，当地纸坊户捐了数百元，孔祥熙捐了两千元，重建的纸坊户祠堂，只三间小屋，规模不大。

这次花费七年时间和巨大人力修成的家谱，是孔氏家族最后一部家谱，由德成写了序言。可惜因为经费拮据，印的本数极少，没有发到全国各省县孔氏族人手中。

3. 十 二 府

衍圣公的长子继承衍圣公爵位，住在孔府，他的弟弟们就要搬出去分别住在外面的十二府里。这十二府类似明清时代的亲王府。十二府并不是十二个府，而是当初修造时按照大排行叫的，行几就叫几府，一共有九个府：大、二、三、四、五、七、八、十、十二。其中大府指的是庶出长子。还有个一贯堂，在孔府里面，因为当初分出去时外面没有房子，也盖在孔府里面了，仍和外面十二府一样，分开单独过。

衍圣公的兄弟搬出去时，除了给房子，还要给买一部分田地，但数量不多，不过几十亩。孔府的祖传赐田虽很多，不能动。

衍圣公的兄弟没有封号，明朝曾封过衍圣公次子为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三子为世袭太常寺博士。十二府没有世袭俸禄，土地不多，经济状况很不稳定。

十二府每个府都有堂号，其中有几个府和孔府关系最近：五府是凝远堂，十府是凝道堂，十二府是凝静堂，另外一贯堂

是凝祉堂，再加上孔府叫凝绪堂。这五个府合称五凝堂。

我的父亲孔令贻是独子，五岁时祖父就去世了，他没有兄弟。我的祖父孔祥珂也是独子，所以十二府里，没有很近的本家，比较近的是我父亲的叔伯堂兄孔令誉了，他住在五府。父亲临终在给大总统及逊帝的遗呈里曾要求由孔令誉来料理孔府的府务。父亲死后，我的堂伯父孔令誉和堂伯母就带着他们的独生女儿孔德恭，由五府搬进孔府居住。堂伯母袁氏是袁世凯的妹妹，她待人很随和，也不大管事，和我们姐弟关系很好。她死后，因为没有儿子，在出丧时就由小弟德成代替儿子“摔盆”。

五府的建筑在十二个府中是最讲究的，有些独特的设计，如园中的假山、山石象个巨大的灵芝，房子也很多，分为东五府、西五府、南五府、南府。我听说是当初严嵩的孙女嫁给孔府的第五十几代，怕她想娘家，回娘家又太远，就在曲阜盖的南五府。房屋设计，凉亭样式，庭院布置，都仿照严嵩家的样子。也正因为严嵩孙女嫁给孔府的原因，孔府里唱戏不许唱《打严嵩》。

在孔府的大堂后面通向二堂的通廊里，靠墙放着一条红漆长板凳，这条板凳已经在那里放了几百年了，至今还在。人们都叫它“阁老凳”，据说是在严嵩被劾快要治罪的时候，他到孔府来，恳求衍圣公看在姻亲的关系上，去皇上那里替他说情，来到孔府后，不便直接进去，独自垂头丧气地坐在这条板凳上。后来人们便叫这条板凳为“阁老凳”。

十二府与孔府的来往走动规矩很严，不能象现在的亲友邻居间那样随便串门。人与人的关系，一切都典章制度化了。因为孔子的思想核心是“礼”，孔氏家族也就处处要讲“礼门仪路家规矩”，本家中都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礼仪是衡量一个人

的道德标准。在清朝以前，孔府有一套极严格的、完整的家庭仪式并编印出版，题为《孔氏家仪》。这是任何别的大贵族家庭所没有的，乾隆时此书被列为禁书销毁，家仪也不那么严格了，但在我小的时候，十二府与孔府间还是沿袭着过去的老规矩行事，每逢年节或者孔府有什么红白喜庆大事，由当差的到各府去通报，各府才来。各府送礼有规格，孔府对十二府的招待也有规格，都是世代沿袭下来的，不能变动。比如生小海道喜时要送六样东西：米、鸡蛋、红糖、挂面、江米糖、点心。死了人要送金银纸。十二府本家到孔府后，要摆出十一盘点心招待，吃饭要吃“三大件”酒席（是孔府一种普通的酒席，即海参、鱼翅、鸭子这三件），每件再附带四冷菜、四热菜、四饭菜。待客地点也有规定，近支在东房、远支在西房；男客在花厅，女客在内宅。每逢十二府的亲戚们来，孔府的“户人”——司茶户要去孔府侍候倒茶，烧水户要专去烧水，本家们见面礼节繁琐，晚辈向长辈行跪拜礼，还要有司垫在旁边提着黄缎子跪垫侍候。

孔府有事通报时，在街上敲十三下锣，十二府则敲七下。如果有人犯罪，他家办喜事或丧事时就不能用乐器。八府里就因有人犯了罪，一直不许用乐器，光敲鼓。民国以后才逐渐改变这种状况。

4. 世代恩亲张姥姥

在孔府众多的亲友中，有一门很特别的亲戚，既不是书香门第，也不是官宦之家，而是世代种田的庄稼人。这家姓张，住在林前张羊村，主人是一位老妈妈，人们都叫她张姥姥。每逢

孔府有红白喜事，张姥姥就带着她家的大人孩子们到孔府来吃喝。别的客人都是王孙贵族，满身珠光宝气，只有她一身蓝粗布衣裳，农民打扮。别的客人们都彬彬有礼，只有她土里土气，而且最特别的是她却比所有的客人都神气，当差的虽然穿着打扮比她讲究，但却要小心翼翼地侍候她，很象《红楼梦》中的刘姥姥，但又比刘姥姥硬气得多。孔府上上下下都这样敬着她，是什么原因呢？

在我稍微长大以后，了解到一段“孔末乱孔”的故事，才明白何以张姥姥来到孔府如此神气。

孔子第四十三代孙孔仁玉是个独生子，仁玉九岁那年正赶上五胡乱华，到处兵荒马乱，孔府又远离朝廷，早已断了恩赏，仁玉的父亲，四十二代老公爷孔光嗣也失了爵，只靠在当地做个洒水令的地方官支撑门面。

孔府有个洒扫户，原姓刘，叫刘末，后来进府当差改为孔末——那时是唐朝，外姓人进府当差都要改姓孔才行，明朝以后，这规矩就相反，姓孔的不许当差为奴。孔末早想要篡位夺权，在一天夜里将孔仁玉的父亲，也就是孔子第四十二代孙孔光嗣杀死了，并且要斩草除根，杀死孔仁玉。但凑巧孔仁玉去他乳母张妈妈家没有回来，孔末就追到张妈妈家来了。正巧张妈妈有个儿子和孔仁玉的年龄相仿，而且这两个孩子都是秃子，张妈妈就给自己的儿子穿上孔仁玉的衣服冒充孔仁玉，结果被孔末杀死了。

孔末回到孔府，夺了大印、令箭，自荐袭爵，以孔子后世自居，而真正的孔子世家便至此断了宗。在那个乱世年头，族人们也都是敢怒不敢言，就这样过了十年。这十年里，孔仁玉改名换姓，和张妈妈以母子相称，发愤读书，到了十九岁那

年赴京赶考，被朝廷授以太学生。这时孔仁玉就向当时的皇上明宗递了奏折，禀明孔末乱孔的真相，明宗派官来曲阜查实，将孔末治罪杀死，恩准孔仁玉回到孔府袭爵。断了宗的孔子世家得以中兴，孔氏家族后世尊称孔仁玉为“中兴祖”，在他死后，孔府里还为他盖了祠堂叫“报本堂”，在孔庙的崇圣祠里也有中兴祖的牌位。

孔仁玉为了报答张妈妈舍子救命养育之恩，奏请皇上恩准孔府认张家为世代恩亲，张家的世世代代都算是孔府世世代代的恩人。张家的后人不管哪一代到了孔府，都必须以贵宾相待，如有不周到的地方，就是触犯家规祖训。从此孔府上下和孔氏全族都通称张妈妈为“姥姥”，这“姥姥”就成了张妈妈的官称。孔仁玉还赐给张妈妈一柄楷木制的龙头拐杖，就象佘太君的龙头拐杖一样，可以用来管教孔府的衍圣公一品夫人。孔仁玉规定，张妈妈死后，这“姥姥”的官称和龙头拐杖由长房儿媳继承，世代相传。

为了纪念张妈妈，在曲阜城外张羊村附近封了一小片树林，叫张家林。另外在孔林里历代衍圣公都要给张妈妈立“报恩碑”，每逢祭孔仁玉时，要有张家嫡孙二人来陪祭，有时还委托张家代替衍圣公去孔林扫墓。

关于孔府认张家为世代恩亲，曲阜《续县志》中还有一段记载：

“按孔氏中表著闻者以颜姓为最，然衍圣公与颜博士论师生而不叙表亲，惟曲阜县张羊村唐张温之裔孙与衍圣公及诸孔氏称表亲，而男女通呼曰亲戚妇人老年称姥姥，遇喜庆事不尽来，遇衍圣公有丧以内外张亲戚皆来为荣，遇衍

圣公祭四十三代公时，则张姓以嫡孙陪祀祭，祭四十二代张夫人亦然，亦有时代请张姓代行扫墓之礼。

考张姓嫡裔孙由衍圣公奏准恩赐一人爲监生，世袭奉张温祀以报其教孔子四十三代奉祀孙仁玉之功。”

上面所记载的恩赐张家一人爲监生一事，我从未听说过，问起老年人也都不知道她家有人当过监生，只知世代种田，想必是她家对这监生也不大看重，还是务农为本。那柄龙头拐杖听说也早已不见了，没有保存。但世代恩亲的关系却一直沿袭下来。

我所看见的那一代张姥姥每次来孔府也拄着一根拐杖，是普通的拐杖，其实她走路稳健用不着拐杖，大概是表示什么象征吧。那也是一位农家妇女，五十来岁，粗布裤褂，紧扎着肥大的裤腿脚，一双小脚，挎着个竹篮子。酒席筵上在达官贵客中毫不在乎，呼三吆四，大吃大喝，临走时，竹篮里还要装满吃食。衍圣公夫人陶氏这个一品夫人当着许多客人，对张姥姥总是很尊敬的样子。有好几次我还听陶氏悄悄吩咐当差的：“张姥姥来了，要什么给什么，别得罪她。”我想这不单是出于对祖宗的孝敬，很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怕麻烦。记得有一次，当差的在侍候中稍有怠慢，张姥姥竟站在大堂前破口大骂，没有一个人敢吱声。我那时是个小孩子，没见过撒泼骂街的——在孔府上上下下不管心地如何，外表都是彬彬有礼，斯斯文文的——所以觉得非常新鲜，一直在她旁边看着。

陶氏所说要什么给什么，其实张姥姥也从未要过别的，每次都只要两样：馍馍、酒。后来当差的掌握了这个特点，每次都把她安排在前上房西间吃饭，那间既是正房又离西厢房近，

西厢房是放馍馍和酒的仓库。

张姥姥常带许多人来，不光是她全家，几乎是全村，我十三岁那年，陶氏出殡时，张姥姥带来的人就摆六桌酒席，但后来逐渐减少了，到小弟德成结婚时，她带来的人只摆了两桌。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张姥姥这个人物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我非常欣赏，佩服她那在王孙贵客中不自惭形秽的态度——不止是因为那早已不存在的龙头拐杖的权利，更主要的是她的胆量。

5. 公主下嫁孔府

衍圣公的兄弟不能住在孔府，要搬到外面的十二府中去住，但在孔府里却世代代住着一户外姓亲戚，人称“于官亲”，住在东学，占有一大片房屋院落。

这于官亲是乾隆年间搬进孔府的。在历史上，曾有十多个皇帝多次亲自来过孔府，其中以乾隆皇帝来的次数最多，先后来过九次。乾隆有个女儿，是孝圣贤皇后所生，对她十分钟爱。这位公主脸上有块黑痣，据相术说这块黑痣主灾，破灾的唯一办法是将公主嫁给比王公大臣更显贵的人家，这就只有远嫁孔府了。因为只有衍圣公可以在皇宫的御道上和皇帝并行，皇帝到曲阜后，也要向衍圣公的祖先——孔子，行三跪九叩大礼，这都是别的王公贵族所没有的荣耀。因此，乾隆第一次来孔府时，就选定将女儿下嫁孔府。但满汉不能通婚，为了避开这个族规，乾隆便将女儿寄养在中堂大人于敏中的家中，然后又以于家闺秀的名义嫁给第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孔府的后人称她为于夫人。

孔宪培，字养元、号独斋。他的名字是乾隆赐给的，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和公主结婚。结婚前，从京城到曲阜，百官运送嫁妆每日不停，整整运了三个月。光是服装首饰就有上千箱，另外象人参、灵芝、珊瑚树、牙雕福禄、翠玉盆景等等，更是应有尽有。孔府大兴土木工程，内宅的后花园（铁山园）就是那次扩建的，占地五十亩。祖国东南西北各地的珍奇树木花草都移植到这里，盖了大型暖房，后花园里一年四季鲜花盛开。公主嫁到孔府，有随身太监跟来护侍，陪嫁中有七屯八厂十二庄，这些田庄、屯集上的全部收入，都是给公主日常打发仆人的零用钱。公主所寄养的于敏中全家也随同迁往孔府居住，从此孔府里就有了这户外姓亲戚。

结婚时，孔宪培亲自入都迎娶，乾隆召见赏赐貂皮六张、大缎四端、笺五卷、砚一方、笔四盒、硃二匣，算是给这位驸马的见面礼。皇太后也召见，赏赐：碧玉如意一件、貂皮四张、朝珠一盘、大小荷包三对、玻璃瓶碗各一对。公主临行时，皇太后又召见，赐上方珍饈碧玉如意一件、寿字衣大缎荷包、翠花妆具、手帕脂粉等物。

公主结婚时还有这样一段小插曲，百官前来祝贺，送来各种珍贵礼品，当时来了个府台，只送了一把小金斧子，乾隆问他为什么要送这东西。他说，留着以后给御外孙砸核桃吃。乾隆听了非常高兴，说这把小金斧子是所有礼品中最好的礼品。金银在孔府本来不算什么，可是因为有了乾隆这句话，这把小金斧子就成了孔府的一个传家宝。

公主嫁到孔府后，乾隆和皇后、皇太后都来过，孔宪培随其父孔昭焕率颜、孟、曾等诸贤后裔，还有公主及孔昭焕夫人程夫人、孔昭焕之母何太夫人等赴德州北界迎接圣驾。

乾隆在曲阜大多住在孔庙的斋宿，在庙里吃饭，斋宿的房子并不特别讲究，但因为是衍圣公祭孔前沐浴、习礼的地方，是个圣地，所以皇帝住在那里。

乾隆每次来都要赏赐一些东西，孔府也要进贡。皇帝赏赐有的很名贵，有的也不值钱，不管赏什么，都要供起来，还要记入孔府档案。乾隆就曾赏过一碟苹果、一瓶桂花糕，还曾十九次赏过满洲克食、糖葫芦。

据说公主婚后和婆母程夫人关系不好，公主自恃“毓德高门”，程夫人又是继母，而且上面还有祖母、太祖母（到后来是六代同堂），对程夫人不大尊重，而程夫人又不愿委曲求全，曾在乾隆面前告过公主的状，说她不孝顺，希望乾隆仿效《打金枝》的故事，管管公主，没想到乾隆对公主一向娇惯，现在她又远嫁山东，乾隆更是心疼，并没管教公主，只对程夫人说：“她的脾气一向如此，这不必说，我知道。”听说此后她们婆媳关系更不融洽。

公主结婚后，过生日时，乾隆还派官员前来贺寿、赏赐。孝圣贤皇后升遐（去世），孔昭焕、孔宪培及公主人都送梓宫，乾隆又几次来曲阜。从孔府与朝廷关系更为密切来看，公主在孔府的地位也是高于任何人的。

公主不生养，过继侄儿孔庆镕为后。孔庆镕出生时是难产，长时间不落生，公主说：“这么久不出生，想必是我的孩子了”。便命人将孔府各门层层打开，直到大门，在大门上挂上弓箭，还打开了正对孔庙的曲阜城正南门。孔庆镕刚落生就抱到公主这边来，并立即呈报皇上有了御外孙。

孔庆镕是我的高祖父（生子繁灏，繁灏生子祥珂，祥珂生子令貽，即我的父亲），他在历代衍圣公中是个著名人物，很

有才学，留下不少诗文书画，代表作有《铁山园诗稿》，《铁山园画稿》。铁山园是孔府的后花园，嘉庆年间修建过，搬进几块铁矿石。孔庆镛将后花园取名“铁山园”，自命“铁山园主”，虽然年代并不久远，但后来人们却又就这几块铁矿石编出神话，而且尽人皆知，说这几块“铁山”是地下长出来的，象竹笋一样，渐渐长大然后由木变成铁，这是因为地下有宝贝的原因。我童年时就熟知这个故事，而且深信不疑，每到后花园去总要在铁山周围察看一番，看看地上是不是又长出了什么宝贝，这情景留给我印象很深，所以每提到孔庆镛总要想到铁山，忆起我童年时那稚气的幻想。

现在再继续说孔庆镛，他的《铁山园诗稿》和《铁山园画稿》，我却从没有见过，只是读了不少零散的诗句，也许就是那《诗稿》和《画稿》的内容。在孔府许多处还有他题的对联和匾额。据说结交了许多南北名人，常约请来孔府作诗作画，每次来都在西花厅聚会，花厅门前抱柱上有他作的对联：“酒渴诗狂啸傲且随今日景”，“花晨月夕风光仍似昔年春”，他酒量很大，在南北文人中有“第三酒人”之称。他为自己的独生子孔繁灏选的妻子也是个才女，是清代著名工笔女画家毕景恒。

孔庆镛六岁见乾隆，九岁袭爵，他自幼就善于词令，能顺从上心，一生中十九次受皇宫赏赐。他从曲阜到北京，水路、旱路要走十多天，道光三年他到北京，皇上在勤政殿，召见他，问起他一路辛苦时，他说：“臣已十年不曾瞻仰天颜，恋主心切，巴不得早到一天是一天。”皇上又问：“山东民情还安静不？”他说：“总是皇上洪福齐天，爱民勤政，百姓都还安静。”孔庆镛有腿疾，皇上为照顾他行走不便，恩准他除了

国家大典例可以少来，还派御医来给他治病。

孔庆镛对公主素日就非常孝敬，公主生病时他昼夜服侍，寝不解衣。

公主死后，道光皇帝派官员前来致祭，并且建立一座“鸾音褒德”木质牌坊。孔府里有家庙，叫“报本堂”，供着各代祖先的牌位，每到年节、初一、十五、生死忌日，我们都去家庙磕头。公主的牌位不入家庙，另在东学建个祠堂，叫“慕恩堂”，供奉公主牌位，并且还象公主生前一样，有如数的仆从妇差侍候，一日三餐定时开饭，起居洗漱等种种生活琐事一点不免。那种侍候牌位象侍候活人一样的场面，我没有见过，在我记事的时候，那里就只有看祠堂的，这大概也是民国以后的变化吧！

于官亲的后代一直住在孔府的东学，但和孔府无甚来往。在我小的时候，于家已经穷困潦倒，寄居在孔府，每月从孔府领取口粮，成为孔府的食客了。我偶尔去于家玩玩，那家只有婆媳二人，男人在外面干个什么小差事，难得回来，家里已经很冷落了。

6. 家族殉难者

在古木参天的孔林（孔子及其后裔的墓地）大门外面，路边野地里有一座长满枯草的荒塚，里面埋葬着我国清代大书法家孔继涑。他所留下的“玉虹楼碑帖”是我国历史文物中的珍宝，一九七九年还在北京隆重展出，受到中外文化界的高度重视和赞赏。

孔继涑一生勤奋治学，才华超人，但他的一生也是极不幸

的。他排行第二，住在十二府，是孔府的近支，因为落了个反叛朝廷、反叛衍圣公、企图篡位夺权的罪名，被开除孔氏家族，成了朝廷的罪人、孔府的罪人，死后都不许葬在孔林里。他的棺材下葬时还用三道铁链子锁着。

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老人们说起孔继涑的“罪过”，而所说的没有一件是孔继涑的言行，完全出自于封建迷信的无稽之谈。

据说最初是有那么一天，北京皇宫里有个人在晚上忽然发现天空的紫微星座发暗。紫微星是代表皇帝的命运，星座发暗也就表示皇帝可能遭到厄运了。又继续观察，发现紫微星附近另有一颗星格外明亮，也就是这颗星将要取而代之。经过巫师们卜算，这颗特别亮的星座是指山东某人，后来算来算去，不知怎么就确认指的是孔继涑了。于是皇帝立即派人去曲阜孔继涑家抄查，发现孔继涑所居住的十二府房屋是按八卦样式建造的，其中有正房九间，房脊完全连在一起，而这是犯忌讳的。于是立即拆断了他家的房脊，这还不算，又去刨了他父母的坟，发现坟的左右各埋着一条大虫子，象条龙，每条都缺一只爪。按照巫师的解释，只待龙爪长齐全，孔继涑即可篡位为真龙天子。与此同时，孔府也发现了孔庙大成殿前的柏树，中间正枝不长，而侧枝茂盛，不知是谁又解释说这都是因为孔继涑会念咒语，他排行第二，想要篡衍圣公的爵位，就念咒语损害衍圣公，使得大成殿前柏树的正枝都不长了，光长旁枝，这象征着孔继涑主张衍圣公的爵位不由长子继承，而由次子继承。在孔氏家族中，也就给孔继涑定下了“念咒语发二枝”的罪名。这样一来，孔继涑就成了地地道道的“罪人”，被开除出了孔氏家族。

孔继涑被开除家族后，十年没下过他居住的玉虹楼，发愤

研究书法，搜集历代名家书法精工雕刻，制成了著名的“玉虹楼碑帖”五百多块。他晚年去北京，病死在那里，直到死后，也没解除罪名，所以棺材是用三道铁链锁着，运回曲阜，埋在孔林外野地里。而且他的后代，世代不能解脱“罪犯之家”的名声。按照规定，罪犯的后代，红白喜庆一律不许用乐器，只能敲鼓，所以他家每逢喜丧大事，不能奏乐。一直过了八代，到了我的父亲孔令贻世袭七十六代衍圣公时，当时已是民国了，有一次他家又发丧，别人来向我父亲请示是不是还敲鼓，我父亲说：“已经是民国了，不用老敲鼓了，该用乐器的就用乐器吧！”从此，他家才又开始用乐器。

孔府虽然开除了孔继涑家族，但对于他的书法成就却视为孔府的传家之宝。听说后来将“玉虹楼碑帖”移到五府保存。我、我的大姐结婚时，也把“玉虹楼碑帖”的拓片做为孔府一项特有的嫁妆赔送到北京。

在曲阜，无论是大人、孩子都知道孔继涑，都能讲出很多关于孔继涑的故事。

孔继涑的胞兄孔继汾遭遇更为悲惨。

孔继汾一生从事孔氏家族的研究，著作很多，二十一岁即编成《乾隆甲子孔子世家谱》二十二卷，以后又编《阙里文献考》一百卷，还有《乐舞全谱》、《丧葬仪节》、《阙里仪注》、《嫡系小谱》、《行录诗草》、《劭仪纤缪集》等书，他十四岁即成贡生，后又任过国子监中书、军机处行走等职。乾隆来到曲阜，他在孔庙给乾隆讲经，并担任乾隆的引导官，很受重视。孔族中凡有婚丧吉凶诸事多来向他请教礼仪，他为了使后世子孙在婚丧各事的礼仪上有法可依，将孔氏家仪集有成典，用了三年时间写出《孔氏家仪》十四卷，《家仪答问》四卷，

没想到这两本书给他招来了杀身之祸。孔族中有个叫孔继成的，是个五品执事官，写了呈文上告说：《家仪》中所述礼仪与清朝的《会典》大法不符，胆敢篡改朝廷制订的大典仪式，又抓住孔继汾在《家仪》自序中有“于区区复古之心”，说这是对当今社会制度的不满，有恢复过去社会制度之意，在那乾隆文字狱正在十分严重情势下，山东巡抚看到孔继成的检举信，大吃一惊，立即上奏乾隆皇帝，并星夜驰赴曲阜，将孔继汾押解到省里审讯，然后又按照乾隆旨意押解到京拿交刑部和大学士九卿“严加讯究”。虽然孔继汾一再解释《家仪》是指家庭行事，“复古”是恢复孔子祖风，当今朝廷也是尊圣孔子的，这里毫不牵涉过去和现在的社会制度。但这些解释一点不能减轻“罪责”，刑部和大学士九卿按乾隆意见做出议决云：“孔继汾身系圣裔，曾登仕版，世受国恩……妄著《家仪》一书，异趣名誉，诚如圣谕：‘此等进退无据之徒，最可鄙恨’，且《会典》为奉行定制，典则昭然……。孔继汾应从重发往伊犁，充当苦差，以为在籍人员，亦知妄作者戒，除《家仪》版片，现经山东巡抚处理外，所有此项书籍亦应令一并查取销毁”。当时孔继汾已六十多岁，身戴枷桎，充军到遥远边疆新疆伊犁当苦役，定案后十六个月就死了，大概是死在充军的路上。

孔继汾定罪后，《家仪》被列为禁书之列。山东巡抚根据乾隆谕旨，来到曲阜对《家仪》进行了数月之久的大规模的查销，衍圣公孔宪培出告示，向全族下达了牌令：“无论近房远房各生，倘有存贮《家仪》一书，或继汾所著别书，立即呈缴如敢隐讳，匿藏及瞻徇观望者，一经查出，从重究拟”。对孔氏家族许多人进行严密搜查讯问。孔族六十宗户的户头、户举、

大小执事官员等人都写了保证书。

在孔府数以万卷的档案资料中几乎没有提到孔继汾，在孔府生活中凡有盛大喜庆的场面，常提到一些祖辈人物，也从没人提到他，这可能是出于“家丑”的原因吧。我只是从一些本家老爷爷、老奶奶闲谈中了解到他的一些情况，每当我想到孔继汾、孔继澂时，心中常充满悲愤，这两个人生活在世袭大贵族家庭，处在特殊优越的生活环境里，没有成为纨绔子弟，而是勤奋治学，有所造诣，处在他那样的历史位置，这是难能可贵的，但他们生前遭迫害，死后也得不到应有的评价，而人们引以为荣耀的下嫁到孔府的乾隆皇帝的女儿也正是孔继汾、孔继澂的对头。

我曾听几位本家老年人谈起此事，他们兄弟二人的遭难不是偶然的，是家族矛盾发展的结果。

六十八代衍圣公孔传铎的长子孔继护在二十多岁即去世，当时孔传铎还健在，后来孔传铎患重病，就让爵位给孔继护的长子，也就是孔传铎的长孙孔广燊，而他自己和他续娶的夫人徐氏就搬到十二府，和徐氏生的两个儿子孔继汾、孔继澂同住。那时小“衍圣公”孔广燊才十二岁，每天要到十二府来请安问事，孔传铎年老多病，日常府务就由小衍圣公的两位叔父，孔继汾、孔继澂来主持，那时十二府里许多珍宝也是孔府所没有的，听说孔氏家族和孔府大权的实权掌握在十二府，孔广燊去世时，他的儿子孔昭焕仍旧每天去十二府向两位叔祖（孔继汾、孔继澂）和曾祖母徐夫人请安问事，这已形成了家规。从孔广燊幼年到孔昭焕，几十年来每天去十二府请安问事已形成惯例。后来孔昭焕的儿子孔宪培娶了乾隆的女儿为妻，公主的地位在孔府高于一切，她怎能容忍孔府大权旁落，即使

是形式上每天衍圣公去十二府请安也是对孔府地位的降低，更何况几十年来，孔继汾、孔继涑已经逐渐参与了府务管理。公主自然要在乾隆面前说起孔继汾、孔继涑的坏话，所以乾隆说孔继汾虽是“有才干”，但是“在家多管闲事”，在刑部和大学士九卿对孔继汾发配充军的奏文呈到乾隆那天，当天乾隆就作了“依议钦此”的批示。乾隆在许多文字狱事件中对此格外重视是有双重原因的。

孔继汾的儿子孔广森，是清朝著名汉学家，他的著作至今被北京图书馆鉴定以善本收藏，由于他的文章有叔叔的原因，他一生不得志，曾冒着生命危险，在屡次抄家中将一些《家仪》残卷保存下来，可惜十年动乱后这些残卷也只字无存了。

《孔氏家仪》和《家仪答问》的内容主要有四部分：（一）杏礼，庙祭、株、墓祭；（二）凶礼，丧服、丧服表、丧祭、奔丧扶柩、改葬、吊时会葬；（三）嘉礼，有婚，家庭宴会、相见、修家谱；（四）自序。

《孔氏家仪》和《家仪答问》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家族礼仪，但如能保存下来，对我们今天研究孔子、了解封建社会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孔府及孔氏家族虽重礼仪，各种场合礼仪繁琐，但《家仪》二书被禁毁后也就无法可依，宣统年间和袁世凯时期曾颁发过祭孔的“武舞谱”、“崇圣典例”和孔府的官服制，民国初年北大教授马季明先生曾专门研究过孔府丧仪，著有《孔林葬例》这些是关于孔氏家族礼仪的仅存文字了。

由于曲阜是春秋以来古代文化的中心，而历代帝王又都尊崇孔子的原因，曲阜孔氏家族文人较多，但又大多不得志，前面已经提到孔继涑、孔继汾、孔广森，另外还有，如孔尚任居

住在曲阜城东南二十里的湖上村，他的祖父是廩生，闭门读书六十年不进城，他的父亲是明朝举人，因看不惯官场黑暗腐败也退官隐居，孔尚任自幼在其祖父、父亲膝前长大，他曾追求过功名，但屡试不中，后来就隐居在曲阜城外五十里的石门山中。五年后，康熙来曲阜，衍圣公孔毓圻请孔尚任给康熙讲经并担任引导官，受到康熙重视，授国子监博士，孔尚任离开家乡赴京就职后，对社会有了新的了解，曾写下不少反映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诗作：如“驿亭乞”、“皇华驿亭大官坐、小官跪迟遭何唾，千人万人拥看官，官长面前路须破，仆隶华服公然立，乞儿衣蔽被侦逻，见官不跪官嗔怒，岂知乞儿腹中饥”。这些诗作都引起朝廷的不悦，后来他利用工余花费九年时间写成《桃花扇》，轰动京门，人们争相传抄，上演时座无虚席，康熙得知此事，连夜派人向孔尚任索取《桃花扇》本。不久，孔尚任即被罢官，他怀着“真嫌芳草秽，未信美人妍”的愤慨心情，回到了家乡曲阜。比起孔继涑、孔继汾来，还算幸运，有个“叶落归根”的下场，他的坟墓就在孔林里，离我父亲的坟不远。我们每到父亲坟前扫墓时，常到他的坟前去看看。

7. 祭 孔

在深宫般的孔府内宅，夜半醒来，时常听到远处隐隐传来牛羊的哀鸣。这是孔庙里披着红绸的“屠宰户”在寝殿后面的“神庖”宰牛羊，准备祭孔用的祭品。

孔府的主要职掌就是祭孔，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认为隆重地祭孔和办理丧事，民心就会归向，在社会就会产生巨大影响。孔府每年的祭孔活动大大小小五十余次。主

要是四大了（也叫四大祭，是每年春、夏、秋、冬的丁日）。此外还有四仲丁（大丁后的第十天），八小祭（清明、端阳、中秋、除夕、六月初一、十月初一、生日、忌日），每月初一、十五有祭拜，一年二十四节气还有二十四祭。

孔府有一整套祭孔组织、司乐厅掌管祭孔的乐章、八佾舞，保存乐器舞具以及培训乐舞生。祭孔由衍圣公主祭，孔府还有祭孔官员，分献、监祭、典仪等一百零三人；鸣赞、相礼等礼生八十人；弹琴、吹箫、敲鼓、打旗、跳舞等乐舞生一百二十人（多时一百八十四人）；每次大祭除上述人员参加，还有执事人员，“四氏学”（即孔、孟、颜、曾“四氏师范学堂”）师生、族人、来宾等千余人。

我的父亲去世后，小弟刚出生，就由族长代替他主祭，每次祭孔都抱着他在一旁观看，两、三岁时孔府里就有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教给小弟习礼，不厌其烦，连哄连劝，我和大姐也常常在旁边跟着学，小弟五岁正式主祭，每到大丁或圣诞祭祀，礼仪极为隆重，除了分献、监祭、典仪等祭祀官员和鸣赞、礼生、乐舞生以及执事人员、本族长老、四氏学师生外，还有政府高级官员参加（按规定是中央部长级以上）还有一大群新闻记者、来宾等人，在这样的盛大场面，五岁的小弟穿着古代祭服主祭。祭孔中他要走长长的一段路，从杏坛前绕到殿前的月台上，要磕许多头，那时有句俗语：“小小公爷跪拜多”。他到很听话，也不胆怯，由陈景荣和吴建章在两旁照顾；上台阶或迈大成殿那高门槛他迈不上去，都由陈、吴抱上去。

大祭前三天，小弟要住到孔庙的斋宿去沐浴和习礼，是用八抬金顶轿从孔庙的正门抬进去，孔庙和孔府一墙之隔，有一

小门可通，习礼期间随时可从小门回来，这规矩叫“明进暗出”，我们也时常从小门到庙里去看小弟。

习礼的人很多，乐舞生、礼生、鸣赞等祭祀人员都去。祭孔时的鸣赞相当于开会时的司仪，但要求条件相当苛刻，嗓音必须特别洪亮，祭孔时鸣赞站在大成殿前平台的侧面，发出各项“口令”，要使全曲阜县城都能听到，否则不合格。担任鸣赞的人平日的任务就是到孔庙在树林里练嗓子，习礼时更要加紧练。那嗓音不光是洪亮而且极富音乐性，象吟诗一样，拖着长长的尾音，很象京剧中的道白。到现在回想起来我耳边仿佛还响着那“执事者各行其事~~~~”，“陪祭官就位~~~~”，“分献官就位~~~~”，“行~~~~伏~~~~平身~~~~”很有韵味的声音。

“引赞”是站在主祭身旁，引导主祭进行各项活动的，主祭身边还有手罩、提炉、纱灯、跟班等许多人。祭孔开始，在杏坛前磕头，然后从侧面走到大成殿前的平台台阶再上去。到了殿门口，提炉、纱灯不能进殿，亲随可以跟进去。

大成殿里，高大的神龛里孔子脱胎塑像前，由主祭跪拜祭祀，孔子像两旁还有“四配”（颜回、曾参、孔伋、孟轲），以及子路、子贡、闵子骞、朱熹等十二哲，在大成殿前面的东西两侧，还有两排绿瓦红柱的房子，有八十多间，称做“两厢”，里面供奉着历代儒家学派的著名人物，（如董仲舒、韩愈、王阳明等），称为“先贤”、“先儒”。四配、十二哲和先贤、先儒神位前也要有人祭祀，叫做“余祭”。主祭跪拜的同时，他们也在各自的神位前跪拜。大成殿里有“大成乐”、编钟、编磬、应鼓、排肖、埙等等数十件古代乐器，还有爵、盃、豆、尊等等古代祭器。祭品有太宰（牛）、猪、羊都是

整只的。还有盐、猫血、芡米、菱角等。祭孔时用檀香，乐舞生穿着古代服装奏古乐和跳八佾舞。小弟穿的古代祭服，绛紫色，绣团花，喇叭形宽大的袖口，下身穿“裳”（和裙子相似）。祭祀是在半夜子时开始，约一小时下殿，大祭时主要仪程如下：（叫“大成殿释典礼”）

鸣：乐舞生就位执事者各司其事陪祭官就位分献官就位

引：就位

鸣：瘞毛血

引：诣盥洗盥手指酌奠位跪酌酒尊，一叩三

鸣：迎神

（起乐）举迎神乐奏昭平之章

引：诣盥洗所盥手升堂至先师神位前跪叩头平身上香复位

鸣：三跪礼叩

奠帛行初献礼

（起乐）举初献礼乐奏宣平之章

引：诣盥洗所盥手洗爵诣酒樽所司樽者举幂酌酒诣至圣先师神位前跪叩头平身献爵复位

鸣：行终献礼

（起乐）举终献礼乐奏叙平之章

引：诣盥洗所盥手洗爵诣酒樽所司樽者举幂酌酒至圣先师神位前跪叩头平身献爵

鸣：赐福胙

引：升堂诣复位赐酒受福胙一跪三复位

鸣：三跪九叩瘞饌

（起乐）举瘞饌乐奏懿平之章

鸣：送神

（起乐）举送神乐奏德平之章

鸣：三跪九叩恭捧祝帛诣燎位

引：诣亡王位焚正位祝一柝帛一段复位

鸣：礼毕

祭祀中的帛是一纸筒内放丝绸、棉花，叫做“贝”，祭祀完，下殿后要由主祭将“贝”送到大殿后面的“焚贝祠”烧掉。

祭祀中主祭多次盥手，因为族规第一条就是：祭祀“必丰、必洁、必诚、必敬”，清帝也下过这样的圣谕：“孔庙孔林总要留心祭祀洁净……”如稍有不洁就会认为是对祖先的不孝。

北洋军阀时期曹锟、吴佩孚、潘复都和孔府联系，拟拍摄“三孔”及祭孔的电影，但始终未成。

小弟长到十来岁时，祭孔礼仪相当熟练而准确，走路时神态庄重眼睛不看地面，一步一块砖，脚落在方砖的正中。老人们夸奖他有“神仙风采”，但他自己并不理会这夸奖，我也不理会，我们还是喜欢在后花园跑竹马、放风筝……。

蒋介石时期，国民政府曾派中宣部长褚民谊来祭孔，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也多次来祭孔，祭文不随身带来，为表示郑重，要另外寄到曲阜来，韩复榘文化很低，是个粗人，赞扬孔子的那些“道冠古今，德昭中外”之类的文词他不会说，新生活运动时，提倡旧道德，又大兴尊孔，一次祭孔时韩复榘上来就说：“孔子现在又走运了”，孔府的人听了都哭笑不得。

新生活运动中，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圣诞节祭孔，是蒋介石时期最隆重的一次，中央政府派叶楚傖做代表，同来的还有考试院代表林祥民、民政厅长李寿春、山东教育厅长何思

源等几十个人，叶楚仓住在西学的忠恕堂，还有外地的来宾一千多人，都分别住在十二府，来的人多，十二府和孔府都住满了，孔府里组织了好多人赶制被褥。

中央派大员来祭孔，叫国祭，前面所说的由小弟德成主持祭孔叫家祭，国祭和家祭仪式不同，国祭没有祭品，由中央代表献花圈。叶楚仓从南京带来一个很大的花圈，是用专机运来的，很讲究，是芭兰花的。

国祭时不穿古代祭服，穿长袍马褂，胸前佩带长条标志，凡短装打扮者一律不许入孔庙，有许多记者、来宾不知道这规矩，没有长袍，来到曲阜后，到处借衣服，一时间曲阜的长袍奇缺。致祭时也不磕头，行鞠躬礼，时间不在半夜，在早晨七点。仪式如下：

- 一、典礼开始
- 二、全体肃立
- 三、主祭者就位
- 四、陪祭者就位
- 五、余祭者就位
- 六、上香
- 七、献花
- 八、献爵
- 九、读祭文
- 十、全体向先师孔子行三鞠躬礼
- 十一、礼成

参加国祭的，除中央派来的代表，还有处长、专员、委员、县长、编辑、记者、画家、参观团等。孔府方面的有各奉祀

官，各执事官、孔府职员、孔府交际、主祭、陪祭、庙亭导引、孔林导引、各处长班、庙员、礼学随从、林役奉卫等等。

早晨举行完国祭，下午还要到孔林孔子墓前致祭，半夜子时还要举行家祭，举行家祭时，这些官方人士就是参观者了。

祭祀后，要将祭肉分给参加者和送给十二府，每人能分到一小条。

每次大祭都要花费很多钱。每次祭祀前，孔府都要忙着卖粮食。内宅后面有粮库，整天整天地往外运粮食。据一九二八年统计全年用于林庙祭祀费约一万六千元。

按孔府族规，祭祀时，妇女不能参加，妇女参加祭祀有辱祖宗，而且有妇女在场，孔庙的乐器就敲不响。据说，从前有一次祭孔时编钟忽然不响了，后来发现在人群中有一个尼姑，把那尼姑撵走以后，编钟才又响起来。不知道这是谁编出来的，大概也为了证明“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但在民国以后，这族规已不很严格，加之我和大姐又是孔府的小姐，我们常常在旁观看，也无人干涉，十二府的姑娘们也有一些去看的。但从曲阜县志记载，过去也有妇女参加祭孔的，而且妇女还是主祭，那是在五十代孙的时候，在大德元年，大成殿修建竣工，皇帝的妹妹大长公主曾经两次来到曲阜，亲自到孔庙大成殿祭孔，曲阜还为她刻碑留念并载入了县志。这件历史事实是个极好的证明。

8. 丧 礼

在孔府办理好父母的丧事，这是孔子家规第一条，是衡量孔子后裔道德水平的首要标准。各府平时都有孝服，遇有本家

死了人去吊丧时都是自备孝服。孝服种类繁多，要根据与死者的关系确定穿什么孝服。

在丧礼上，孔府有许多独特的仪式和仪仗，来了吊丧的亲友，门口的乐棚要奏乐，是男客，还是女客，还是男女客一起来，奏的乐曲都不相同。大门两边还站着“方比”、“方相”，这是两个用绸缎和木架扎成的大汉，衣冠服饰和脸谱都很象京剧中的花脸，有一丈多高。人站在大汉的身体里，可以操纵着大汉活动、走路、做出各种动作，人还可以从大汉的肚脐向外看，来了吊丧的客人，根据男客、女客或男女都有，操纵大汉伴着乐曲上前迎接，在送殡时，这“方弼”、“方相”，也要走在队列前面，一直跟到墓地。这只有孔府办丧事时才有的仪卫、十二府则没有。对于扮“方比”、“方相”的当差，要给重赏。

死者装裹分为大殓、小殓。三日小殓穿常服，五日再大殓，就要换官服。女的凤冠霞帔，嘴里含珍珠，全身撒上香料，再用绸子将死者从头顶到脚都裹起来，脸也不露出来。女的用绿绸子，男的用红绸子，裹三层，最外面一层都用白绸子，缠裹得很紧，不留一点空隙，将死者裹成花瓶形状。装裹完毕，看不见人，只看见一个白绸子花瓶。十二府也都是这样装裹。

停灵的地方也有规定。衍圣公和一品夫人死后停在内宅前上房，姨太太或住在孔府里的亲属，死后停在后面的白虎厅。孔府的建筑是“左朱雀、右玄武、前青龙、后白虎、明七星、暗八卦”。朱雀、玄武是指孔府两侧钟鼓楼，青龙、白虎是孔府前后两个厅，七星是孔府中的七座高楼，八卦是地下的八条水沟。据说前青龙（又称“喜房”）里生孩子，后白虎停死人，这对孔府的风水有利。但近支本家很少住在孔府，我不记得白

虎厅里停过哪个本家，我的生母灵柩也停在西学，没停在白虎厅。

灵棚要用蓝玻璃做顶，灵棚里除了纸人纸马、聚宝盆、摇钱树、金银元宝等各种“社火”，还要摆上成百件的“明器”，锡制的小茶壶、小茶碗、木头小桌椅、小床、床上都有枕头被褥，还有绣花的小衣服、鞋袜等等衣服用具，都是真的，但极小，不能超过半寸，做得非常精致，在几分大的小尖鞋上绣着很复杂的花朵、图案。我的堂伯母袁夫人以做“明器”而著名，她绣出的花纹需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这些“明器”在安葬时一起埋进墓内。

灵棚里棺柩前还要悬挂“明经”，大红绸子条幅象幔帐一样从上面垂下，遮住棺柩。红绸子上写着死者的各种官衔，在出殡时要将“明经”放在棺柩上。

出殡时抬杠的杠夫因死者地位不同人数也不同。孔府死了人要用六十四人抬，十二府死了人用三十二人抬。孔府有事通报时，在街上敲十三下锣，十二府则敲七下。如果有人犯罪，他家办喜庆或丧事时，不能用乐器，八府里就有人犯了罪，一直不许用乐器，光敲鼓。民国以后才逐渐改变这种状况。

孔氏家族规定：父母去世，三年不应酬客人，不听丝弦，不论是孔府还是十二府都一样要执行，这三年叫“丁忧”，孔府的官在丁忧时，粮饷照发，国家的官不发。我很小的时候就接受了关于三年丁忧的教育，说是圣祖孔子有个弟子叫宰予，他认为三年时间太长，主张缩短一些，孔子坚决反对，责问宰予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按照孔子的说法：一个人出生三年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为父母行三年丧礼是起码的“礼”，不

这样简直就是没有良心。我在启蒙教育时，人们就不断地向我重复了忧的重要。

由于孔府很注重丧礼，就是当差的死了，府里也要派人去他家吊丧，一般都是派个大当差的去，派去的这个当差称为“天使”，全权代表衍圣公，只是不乘坐八抬金顶红轿，而乘四抬银顶绿轿，轿前要有衍圣公的全套仪仗：金瓜、钺斧、朝天凳、旗、罗、伞、扇、“肃静”、“回避”牌等一百多种，死者全家要象迎接皇帝那样，到村外路边跪迎。

如果当差的死在府里，按规定不能从门口出去，那就只有从墙上抬出去了，孔府的墙又高，幸而我没有听说过以前有哪个当差的是死在府里的，否则真不知该怎么运出去。我生活在孔府的时候，这项规定实际已经取消了。有个当差的叫赵安福，病死在府里，就从门口抬出去的，谁也不提这事，连当时掌管孔府大权的一品夫人陶氏也假装不知道就过去了。

孔府大门外东边有条胡同叫“鬼胡同”，当地老百姓出殡，不能从孔府大门前经过，要从“鬼胡同”绕行。除了出殡，平时很少有人从那里走。

孔林是孔氏家族的墓地，两千多年来，墓碑林立，坟茔无数。其中“上三代”和“下三代”的坟茔最讲究。上三代就是孔子，孔子的儿子孔鲤、孙子孔伋；下三代是我的父亲孔令贻、祖父孔祥珂，曾祖孔繁灏。每年清明，是孔林里最热闹的日子，孔林门口水泄不通，门前还有“林门会”，是盛大的集市，真象赶庙会一般。

我们不光是清明去，平时三天两头地去致祭，父辈的、祖父辈的、曾祖辈的、高祖辈的以至更上一辈都要祭；明祭（生日）、死祭（死日）、清明、圣诞、十月，还有许多其他的日

子都规定要祭。除了到孔林致祭，还有拜家庙，拜影堂、慕恩堂、抱本堂等等，祭礼极为频繁，是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内容。司房有个很厚的大本子，专门记载某代某人生死祭日，在大堂前边挂着个木牌子，每月初，司房就将这一个月哪天该拜庙，去林，拜谁，都写在牌子上，象个功课表似的，我们按照木牌上的日期去叩头、拜祭。

扫墓时由挑祭户抬着四个大方祭盒，里面有很多层，摆满祭盘，祭品有鸡头米、馍馍、肉、酒等，上的香是檀香，放在烧红的炭井上。此外还要挑着茶炉，还要有跟班的奉卫丁以及其他随从，约百多人。

我们每次扫墓前先要在洙水桥后的更衣亭休息，扫墓后我们姐弟也总要在林里玩耍一阵。我记得孔子墓附近西南方向草丛中有个洞口，有些倾斜，洞口小，里面大，象个油篓似的，当差的和老妈妈们不许我们走近洞口，怕掉进去。还告诉我们说：这叫“油篓墓”，又叫“牛栏坟”，是秦朝留下来的，那时候人活到六十岁还不死就要活埋，做儿子的不愿活埋自己的父母，就挖这种“油篓墓”，让老人待在里面，儿子每天夜间来送饭，用竹篮子吊下去，当时在孔氏家族中这种坟墓很多。

孔林里的风水很重要，在封建社会里，认为孔林的风水和国家的“国运”有关。清帝召见我的高祖父孔庆镒时曾这样训示：“林内第一讲究风水，风水甚小，断不可轻信更改，况咱们本朝以文治天下，与国运有关，断不可大意。”

我父亲在世时，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勘测津浦铁路，原计划从歇马亭向南经过曲阜离孔林的西墙很近，听说当时我父亲非常着急，向朝廷连递几件呈文，说铁路将“震动圣墓”，“破坏圣脉”，祖宗的灵魂不得安宁等，最后终使铁路

绕道，拐个大弯，逶迤向南。一位本家老奶奶曾对我说：“咱们孔家千年不衰，就是因为孔子的风水好，皇帝的坟是正北，只能是一朝一代的贵族。孔子的坟不是正北，有点斜，能保住子子孙孙”。可是为什么坟墓斜就能保住子孙，她却没讲清楚，后来我去孔林时曾仔细察看孔子墓，象座小山丘，看不出什么斜不斜来。

一般的生、死忌不走动，都在各府的祠堂由本府祭拜或去孔林扫墓。但每逢死者整生日时，要过“阴寿”，就要大大庆贺一番，把死者的大影像挂在厅堂里，本家们都盛装打扮，太太们穿着大红裙子，都要来给这影像磕头祝寿，象给活人过大生日那么热闹。我记得最隆重的一次是在我七、八岁时，我祖母彭太夫人过阴寿，寿堂设在忠恕堂，影像四周挂满本家们送的锦缎寿幛，院里还搭起乐棚，吹奏细乐。影像前大红供桌上供着寿桃，还有献酒的三脚银爵，来拜寿的人在银爵里斟满酒向影像举一举然后将酒倒掉，就算是影像喝过了。

二、我的父亲和母亲

1. 我的父亲孔令贻

我的父亲孔令贻，字燕亭，是七十六代衍圣公，从五岁世袭公爵。一九一九年我两岁时，他去世了。他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我是从周围人们的不断叙述中了解父亲的。父亲在世时，小弟德成还没有出生，只有我和大姐两个女儿，我从父亲遗留下来的写给别人的信件中多次提到我，知道他是十分疼爱我的。在我小的时候，很爱看一张照片，那是父亲和我的合影，他坐在椅子上，微笑着双手把我举在膝头，我常常按照这张照片上的形象来想象父亲曾经怎样爱抚过我。在有了小弟孔德成以后，时常听到人们说他长得如何象“老公爷”，在我脑子里，父亲的形象似乎就鲜明了：高大魁梧的身材，白净的面孔，温和的眼睛。我觉得脑际的父亲的形象要比客厅里挂的那张他的照片真实而亲切。

父亲年轻时曾在曲阜古泮池孔府行宫办乡塾，又和颜、孟、曾的后裔建立了“四氏师范学堂”，亲任学堂总理（校长）。后来父亲奉清政府命稽查山东学务。

光绪年间曾四次派官员来曲阜祭孔，父亲也因祝寿和谢恩四次进京，多次受到赏赐的御书、御笔、福寿字、四库全书、袍挂衣料等，慈禧赏赐花眼花翎顶戴。光绪十五年奉谕翰林院

侍讲。清帝为我的祖母彭夫人建碑，在父亲的前妻孙氏去世时派官御祭。光绪二十年（1894），慈禧过六十岁生日，父亲携妻陶氏随我的祖母彭夫人进京祝寿。我的祖母和陶氏各向慈禧进贡早膳一席并雇戏班在皇宫唱了三天戏。慈禧亲自召见，赐宴赏字画等。

辛亥革命后，据说地方曾推举他为国会议员，他辞绝了。在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组织“筹安会”时，曾推选父亲为“名誉理事”，并组织过教育界请愿团出任理事长，代表教育界劝袁称帝。一九一五年袁称帝后授予他“一级大绶宝光嘉禾章”，年俸两千元，以后又加“郡王”衔。执事官四十人，每人年俸一千二百元，祭器、乐器修理费每年二千元，林庙奉卫职每年四千元。洪宪帝制失败后，前清的遗老们还在继续搞复辟活动。清室遗老们组织了“孔教会”，保皇党康有为任会长。康提出“孔教为中国之基础”，“请定孔教为国教”。我父亲孔令貽发出“请定孔教为国教”的通电，提出“孔教以人情为道，难须臾离，中国数千年政化风信，以孔教为命，国体虽更，人道不异，若弃其教，是自绝其命。”

北洋军阀中的定武将军张勋，一向尊孔崇儒，清王室被推翻后一直不肯剪辫子，故有“辫帅”之称。我父亲和他关系密切，结为异姓兄弟。张勋驻兖州时，派重兵守卫孔林、孔庙、孔府，据说我父亲曾打算在曲阜建张勋生祠。地点已选好，在滋阳旧县署。济宁、巨野、郓城、嘉祥、东平、邹县、滕县、临沂、峄县、滋阳等地代表也已开会研究，并绘好了工程图，后来张勋复辟失败。

一九一九年父亲曾到北京晋见废帝溥仪，溥仪赏他紫禁城骑马。同年在京病逝。

父亲一生酷爱书法，在孔府里多处悬挂着父亲的手迹，至今曲阜仍有复制拓片并在文物商店出售。他也喜爱画画，尤善画梅花，我曾收藏了几幅，可惜后来在动乱中遗失了。

父亲先后有四个妻子。前妻孙氏病死；纳妾丰氏，不生育，又续娶陶氏，生一子，三岁夭亡，以后不育；最后收王氏为侧室，生两女一子，就是大姐孔德齐、我和小弟孔德成。在母亲怀孕五个月、小弟德成还没出生时父亲去世了，他从发病到去世只有二十多天，是非常突然的。二十多天前还在家里写信提到以后的打算，二十多天以后就病逝在北京了。

我从父亲遗留下的书信里知道了这几天的经过：最初是陶氏带着四岁的大姐去北京看望陶外公的病，来信说病情好转，父亲也很高兴，回信又劝慰一番，还打算待府务稍闲及岳父康复后，去北京玩玩。但事过两天忽接电报谓岳父病逝，于是匆匆赶去吊唁。刚到北京的第二天，忽然生了背疽，立即请医治疗，不见成效，反而日益沉重，于十一月八日在孔府设于北京的官邸太仆寺街圣公府逝世。

父亲在病危时，想到身故后世职承袭及家事料理，由他口述，别人代书给大总统及逊帝各一遗呈。给大总统遗呈全文如下：

呈为令贻病危伏枕哀鸣，谨口述遗呈，仰祈
钧鉴事：窃令贻东鲁愚庸，毫无知识，于前清光绪二年，承袭斯职。复于民国成立，蒙前大总统袁明令，仍以孔令贻为衍圣公。八年以来屡承历任总统厚赐栽培，俯仰寸衷，愧无报称。乃于十月四日因令贻岳父陶式蓼之丧来京吊唁。忽生背疽，赶即延医调治，不幸效验毫无，日来愈见

沉重，恐致不起。查 圣典例第一条衍圣公膺受前代荣典，均仍其旧。其公爵按旧制由宗子世袭，报经地方行政长官，呈由内务部核请承袭，等语。令贻年近五旬，尚无子嗣。幸今年侧室王氏怀孕，现已五月有余。倘可生男，自当嗣为衍圣公，以符定例。如或生女，再当由族众共同酌议相当承继之人，以重宗祀。但令贻病已至此，恐不能待。前因林庙事重，曾经内务部规定奉卫官，以资助理，由令贻遴选。现已专咨省长，以前清分发河南大排知县孔广达，转请部委。惟此就近期间，林庙祀典应以奉卫官孔广达恭代。俟令贻子嗣成立时，再行交卸事。至家事一切。应由令贻嫡堂兄孔令誉料理。伏乞

恩准，明令施行，俾林庙事宜，庶无陨越，则不第令贻九原感戴，即罔族亦同荷

恩施矣！谨呈

大总统

衍圣公孔令贻

病危时给逊帝溥仪的奏折如下：

奏为

君恩未报，臣病垂危，伏枕哀鸣，仰祈

圣鉴事：窃臣东鲁愚庸，愧无知识，于光绪二年承袭世爵，屡岁仰叨

恩眷，渥蒙

宠锡，下怀钦感，莫可名言。本年正月，恭逢

圣诞。曾随班祝

嘏，喜近

天颜，复蒙

赏赐紫禁城骑马，感邀殊遇之荣，弥切涓埃之报。十月四日，臣岳父前直隶道员臣陶式望之丧，遵礼来吊，抵京后正思展覲

慈颜，仰聆

圣训。詎料次日背疽骤发，赶即延医调治，效验毫无。日来愈见沉重，恐致不起。伏念臣年近五旬，尚无子嗣。幸侧室王氏现已有娠，倘获生男，自当承袭世爵。惟臣世受

国恩，初无报称，五中摧裂、瞻恋弥殷。伏愿

圣德日隆，勤求学问。将来正教辅翊，祀典攸崇，叨庇鸿慈，正未有艾。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所有感恋微忱，谨口授遗折具陈，伏乞

皇上圣鉴！

奏

臣衍圣公孔令贻

父亲去世后由他的当差赵庆具名呈报大总统及内务部备案。那时候，这样贴身当差，如同京剧中的老家人一样，是可以出头料理许多事情的，赵庆是这样发的讣闻：

民国九年

敬禀者

衍圣公孔讳令贻号燕庭于阳历十一月八日丑时薨于太仆寺

衍圣公府正寝兹择定阳历十二月十七日受吊送库

十八日午时发引运枢回曲特此报
二十

闻

长班叩禀

赵庆并星夜赶回曲阜报丧，陶氏则留在北京等待随灵柩一起回乡。这时陶氏的九弟陶勋正在孔府，自从陶氏结婚后就独揽孔府一切大权，孔府府务多由陶勋经手操办。陶勋在济南当个什么官，和张勋关系很好，与山东省政府来往也密切，经常住在孔府。父亲刚死，在赵庆回曲阜前，陶氏已连续发出两封密电，要陶勋控制局面，陶勋按照其姊意图，将孔府所有重要物件加封加锁，孔府内外密密层层设派军岗，并将本家中一位有威望的远房叔叔接到孔府前上房，让他看守一切。父亲逝世消息传来，孔府及本家中引起一片惊慌，为衍圣公突然去世及子嗣问题议论纷纷，但这时陶勋已经布置妥当，孔府到处都严加警戒了。陶勋给陶氏的密信中说“府事弟已连日内外密布”，要陶氏有什么吩咐“密示于弟”，“弟必竭死力以效劳”。父亲遗嘱要嫡堂兄孔令誉（式如）暂时料理府事，但陶勋对孔式如是不信任的，恐怕他有夺权野心，在孔式如去京料理棺柩回乡事时，陶勋给陶氏密信说：“不知式如……藏有私心否？务乞五姊时多留心，勿受其欺。”还说：“弟已……从中暗探消息。”为了控制住局面，稳定人心，陶还准备找张勋，让他转求总统下令有关公爵世袭问题暂不考虑，待王氏分娩再定。但后来这道令并没有下达，不知是陶又改变主意还是另有其他原因。

父亲去世两个月后准备灵柩回籍，国务总理靳云鹏签署下

达了大总统指令，从优议恤，给予三千银元治丧费。大总统并派王达致祭，回曲阜后营葬时又派陆荣棠致祭，灵柩回籍时所用火车，用花车一辆，随从及行李用头等和三等车各一辆，并且通知沿途各地，灵柩所经之处，地方官员亲往迎送，妥为照料，要求表现出“优礼圣裔之至意”。父亲的殡葬是隆重而奢华的。棺材是专程从福建运来的，里面四独木紫杉内棺，外面大柏木硃红外槨，棺材里要铺金盖银，还要放许多殉葬珍宝。棺材外槨是“五龙捧圣”，就是在硃红棺材上，四周围及上面共描着五条金龙。出殡时上面还要盖上“龙头凤尾”的大红绸子“棺罩”。遗体大殓后本家们送完纸，就要闭丧了。在孔府前上房院内搭起四周蓝玻璃、中间白布顶的灵棚，棺材前摆着许多桌的各种“明器”、“社火”、遮着“明经”。棺材停放在灵棚内一年多然后才发丧。发丧时专程从北京雇来六十四名杠手，演习了一个多月，六十四人抬起棺材来走路，棺材上放一碗碗水，滴水不洒。棺材上站着一个人监视着。为了走起路来平稳，从孔府到孔林墓地的路面都重新修整，还拆除了有阻碍的建筑。

父亲出殡时，我三、四岁，记忆中只是朦朦胧胧一片白，别的什么都不记得，多少年以后，本家长辈们还常常谈起，因为那是曲阜的一件大事，说曲阜城外百十里的人都赶来看，当时正值冬天，又下着大雪，远道来的人露宿街头等待第二天看出殡，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人。他们这样不辞辛劳，不畏严寒，不单是为了看热闹，还有一种迷信说法起作用，父亲在世时，每次外出，围观者也甚多，说是谁能看见衍圣公，一辈子不害眼。现在虽不能看到他本人，亲眼看看棺材也是好的，何况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那天天下大雪，人们又议论说老天爷也在给公爷穿孝，送殡的人又多，到处都是一片白，从孔府大门一直排到孔林墓地，至少有五、六里长，队伍最前边是“开路鬼”、全套执事，仪仗、旗伞、鼓乐、旌幡、马仗、纸人纸马、还有夜役、刽子手、方弼、方相、恩赐亭、用玩亭、祭案亭等。棺材左右各有十六个小孩拉纤，叫“挽歌郎”，手端烛台，用绸子与板头相连。此外棺材周围还有用绫子糊成的铁拐李、何仙姑、韩仙子等“八仙过海”中的八个仙子。

棺材后面是孝主，孝主四围用白布象帐子一样围起来，德成刚一岁，不能当孝主，由贴身当差屠世贵代替，送殡时也没让德成去，怕吓着他，只是在“请棺”时抱着他在旁边站站。我和大姐都去送殡了，我们坐在轿车里，坐轿车送殡的女眷也很多，光在门前上车就上了四个小时。

送殡时还有一种特别的仪式，要有点主官点主和辞土官辞土。点主比较简单，在牌位上点一点，算是有了灵了。辞土官则很有趣，在送殡行列到达墓地前，他先带着两个排的奉卫丁，荷枪实弹，全副武装，骑着马到墓地去和那里的“鬼怪”们“打仗”，把“鬼怪”们赶跑了或消灭了，以便使灵柩安静地下葬，不致受到“鬼怪”们骚扰，据说如果镇压不住“鬼怪”，辞土官被打败了，就要招来许多灾难以致丧生，所以认为担任这职务是很危险的，不但要有地位，还要身体素质好，会打仗才行。我父亲下葬时担任辞土官的是兖州镇守使，主家对辞土官特别优礼相待，重金酬谢。按规定，十二府办丧事都应有辞土官，后来因经济衰败，除了孔府，别的府也就不用了。

我父亲出丧那天，孔府里摆了酒席一千多桌，整个丧事花

费银洋一万一千一百多元，钱一万九千六百五十多吊。

在发丧时，清废帝溥仪也下了谕旨，赏治丧银五百元，派官员前来致祭，祭文由皇帝的书房，也就是皇宫的南书房撰拟。后来在我的父母合葬时，也是由南书房行走、清朝著名的历史学家柯劭忞写的墓志铭。而这位柯劭忞就是我未来的公爹，不过那是十多年以后的事了。

现在把话说回来，父亲死后还剩下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正在怀孕的母亲王氏。母亲腹内胎儿是男是女关系到公爵子嗣大事，也关系到陶氏能否继续独揽孔府大权的切身利益。为了防止母亲发生意外，陶勋指派专人看管，母亲一举一动都在被监视之下。陶勋又在内宅后院单设小厨房，派去他的两名心腹专为母亲做饭，三令五申明确规定除这两人送去的饭菜外，任何食物不得入口。陶勋还时时提防着有人花钱买通厨房。陶氏姊弟在我母亲身上真是动了不少脑筋。而我母亲的命运就完全掌握在陶氏姊弟手中了。

2. “小公爷”的诞生

父亲在给大总统遗呈中写明母亲已怀孕五月，倘若生男自当继承公爵封号。那么母亲是否确实怀孕？内务部要求孔府开具一系列证明呈报省长公署转部备案，对于父亲的遗呈方可照准。于是孔府族长孔兴环、本家孔祥棣、孔令誉、孔令侯、孔令煦以及中国医生、德国医生等等都写了许多证明，证明母亲确实怀孕。在一些历史档案中竟然还有一张“邻佑东野颜某某”的证明，证明中写道“……已故衍圣公之侧室王氏确系怀孕五月有余……”。这使我百思不得其解，孔府外面的所谓

“邻居”（其实并无邻居），怎么能证明那高高的围墙所包围着的深宫禁地的事？何况我的母亲从不出府，就连本家亲戚进孔府去应酬什么红、白事时，也从不许她出头见面，这样一位“邻佑东野”居然证明我母亲怀孕了，真不知道这证明是怎么弄出来的。然而不管怎么样，手续具全，备案照准，“王氏遗腹”一事确认无疑了。

紧接着就是生男生女带来的问题了。这成了当时孔氏家族中人人关注的大事。如果这个遗腹子仍是女孩，公爵的世袭封号就要由同族近支商议另举一个相当的人来继承，那么陶氏和我们姐妹，就要搬出孔府，陶氏也就结束这里的“公太太”的地位。当时族里已经议定，如果我母亲王氏又生个女孩，衍圣公的爵位就由南五府的孔德罔继承，孔德罔那年还不到十岁，和孔府的关系算是比较近的了。那些日子里，陶氏整天烧香磕头，祈祷许愿，盼望我母亲生男孩。孔府里每天有人出出进进，乱哄哄。许多外县的族人，如汶上县、南宗、菏泽等地也都来了，人们怀着不同的目的或出于平日对陶氏的怨恨，或出于想在子嗣问题上得到什么好处，多数是希望我母亲生女孩，也有少数人出于正统观念或是同情的情绪给陶氏一点劝慰，总的看人们是不站在陶氏一边，有些本家也竟然提到要我们母女准备搬出孔府。看来是很有“逼宫”之势。

正月初四这天，母亲临产了。那时父亲灵柩刚运回不久，停放在内宅的前上房，母亲就在前上房后面的前堂楼分娩。产房里中国医生、外国医生都有，主要接生的还是一位旧式的“老娘婆”——孔府当差陈占魁的母亲。为了防止用“狸猫换太子”的手法偷换婴儿，和防止其他意外，北洋政府派军队包围了产房，孔府内外到处设岗，还有一个将军在孔府内宅坐镇。临

产前孔府本家中所有的长者——老太太都集中到孔府来“监产”，孔府大门前排满了轿车。这天省里也派了官员来。陶氏在产房外烧香叩头，祈求“圣人”下降。为了迎接“圣人”，陶氏命人将孔府所有门户层层打开，从内宅一直开到孔府大门，甚至连威严的重光门也不例外地打开了，并且在门上挂上了弓箭。偏巧母亲又难产，几个时辰还未落生，大家都很着急。本家老太太们议论说：“前两次分娩，两位小姐都很顺利，这次拖延时间这么久，大概是‘小公爷’了。”有人提议开孔府大门还不够，要开正南门，公爷要从正南门进来。正南门是正对孔庙的曲阜城门，平时关闭，只有皇帝出巡或祭孔时才能打开。民国后德国公使来曲阜参观也曾开过一次，除此以外就是小弟出生这一次了。正南门打开后，刚才鸦雀无声的紧张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变得轻松了，当差的纷纷忙着准备鞭炮、红纸、彩绸等，好象是这位“小公爷”已经出生了。当然陶氏仍是提心吊胆地等待着，后来不知谁的主意，说是内宅后面后花园地势高，压着前面，必须将前边的地势抬高后，小公爷才好出来，于是把一块写着“鲁班高八丈”的大木牌挂在后堂楼的角门上，而且还据说是挂上这块大木牌以后，小弟德成才落生。直到后来我结婚的时候，这块大木牌还挂在那里。

当小弟终于出生，一场惊险过去的时候，曲阜全城立即沸腾。城内鸣礼炮十二响，全城鞭炮声不断。孔府更是张灯结彩，派出当差四处通报。还派人敲着锣高喊“小公爷诞生啰！”走遍全城，家喻户晓。这时本家亲戚们也表现出各种不同的情绪，有的高兴，有的失望，有的担心，有的旁观，至于那位陶氏，已因过度紧张，躺在床上昏迷不醒了。

孔德成出生后，孔府族长立即电函大总统、国务总理、内

务总长、山东省长，京兆尹、知事……。呈报：“先衍圣公令貽之妾王氏遗腹，已于二月二十三日即夏历正月初四日巳时产一男，大小咸安。”申请承继衍圣公爵位。刚刚发出许许多多电报，紧接着又收到许许多多贺电。其中有康有为的贺电，全文如下：

德成上公世兄执事：前闻
尊公溘逝，不胜伤悼。幸
玉麟诞生，载绵
圣胄，
冢嗣有托，
圭袞克承。鄙人逊听，不禁于重哀之后继之以喜也。
伏维
上公綉褙有喜，戏豆承徽。将来诗礼有闻，教宗光大。此则鄙人所深望也。
敬颂
孝安不宣！

康有为谨启

其他贺电也都大同小异。不久，康有为还亲自来曲阜看望德成，听说他当时还抱了德成好长时间。

在孔德成刚过完百日时，孔府收到了徐世昌大总统的命令：

民国九年四月二十日 奉
大总统令孔德成袭封为衍圣公。

于是经过了这繁多的手续以后，经过了漫长的忧虑和不安以后，到此为止，出生才三个多月的孔德成正式继承了衍圣公

的公爵封号。

3. 陶 氏

现在，我要说说陶氏了。按照封建家族的规矩，她要算是我们的正式母亲，但当我一想到她是怎样折磨虐待以致最后害死我们的生身母亲，我就不愿违心地那样称呼她，在这篇回忆中还是只称她“陶氏”吧。

此人娘家原籍浙江绍兴，久居北京，是北京大房产主，很有钱，但官职不高。她的父亲陶式鋈只是个大名府的知府。论门第，根本不能和孔府攀亲，因为父亲是续娶，而且在娶她以前就先买了姨太太丰氏，这就不得不屈就了。她在娘家排行第五，人称“陶五小姐”。身材不高，冬瓜脸，很少看见她有笑容。我小时候听老人们说，她除了身材外，那长相，那神态，都极象慈禧太后。后来我看到了慈禧的照片，我的第一个印象，她果然很象慈禧。但听说，慈禧并不喜欢她，因为她不是“名门闺秀”。父亲的前妻孙氏是钦差大臣的女儿，而陶氏只是个知府的女儿。当父亲和陶氏结婚后去给慈禧叩头时，慈禧问道：“这是那家的姑娘？”当知道了她娘家是房产主以后，就说：“唉！满朝文武官员，谁家姑娘不行，怎么单找这么一个？”因为历代衍圣公的妻子都是诰命一品夫人，父亲的前妻孙氏也是。出于惯例，慈禧还是封了她诰命一品夫人。后来父亲又带她随着我的祖母进北京给慈禧祝寿，花了很多钱，除了贡品，还雇戏班在皇宫唱三天戏。这次进京光是平日发些零碎赏钱就花了四、五百两银子。这次见慈禧，慈禧很高兴，亲自召见，优礼赐宴，还赏了好多东西，据说是象家里亲人一样亲

切。后来慈禧还亲笔写了大“寿”字，为她祝寿。

听说我的祖母彭夫人也不大喜欢陶氏，常教训她：“一品夫人举止要稳重，说话要和。”

她是以阴险凶暴在孔氏家族中闻名的。曲阜老百姓送给她个绰号——“母老虎”。我想这个绰号是很合适的。她对我母亲的种种虐待迫害就是明证。

我的母亲姓王，是河北遵化一个穷苦农民的女儿，从小卖给北京陶家当丫头，陶家给她取名为“宝翠”，整天受着陶家打来骂去的虐待。长到十六、七岁时又有了新的灾难，陶家的两个少爷都看上了她，兄弟俩为此闹得不可开交。这时，陶家五小姐和我父亲结婚后回娘家来，其母为了解决兄弟间的纠纷，就将宝翠由陶家带到孔府。在母亲二十岁时，我的父亲已四十三岁，仍无子嗣，那时遵循着封建道德标准行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儿子就没有根苗，特别是孔府，没有儿子，衍圣公的延续成了严重问题，于是就将我母亲收房为姨太太。那陶氏在北京她的娘家时，就一贯对我母亲打骂虐待，来到孔府当上诰命一品夫人后脾气更大。我母亲被收房后，因为父亲对母亲感情很好，陶氏的凶残暴虐更达到了空前程度。在寒冬腊月，在父亲离开曲阜以后，常常命母亲全身脱光，跪在地上，用皮鞭抽。她有一种专用来打母亲的皮鞭，一根半尺长的木柄，头上并排钉着好几条皮鞭，拿着木柄抽一下，身上出现好多条鞭痕，陶氏就拿着这鞭子抽我母亲，直到她自己精疲力尽为止，还要母亲给她磕头致谢。母亲逆来顺受，从不反抗。我的父亲经常在外，陶氏在孔府任意折磨我的母亲，没有一个人敢管。就是在母亲怀孕期间也照样打骂。

有时候，陶氏什么也不为，好象只是做为——一门必修课似的

来打我的母亲。听说有一次她要去济南，把一切都准备好以后，想想还有什么没做呢？想起来了，还得打一顿宝翠。接着把我母亲叫进来，进来后，她只说两个字：“跪下！”就开始毒打。打完后，她才去上火车。

有位彭祖奶奶是我祖母娘家的亲戚，她为人很正直，也敢说话，陶氏多少还有些怵她，每当这位老奶奶来孔府住亲戚，我母亲挨打就少些，陶氏打她的时候，内宅老妈妈就悄悄把彭祖奶奶请来。

在亲戚和本家中看见过我母亲的人很少，在平时，孔府内的红白喜庆，本家的应酬来往，我的母亲不但从不出头，而且就是近支本家的女眷来到孔府内宅拜望时，陶氏也从不许我母亲见人。我母亲到孔府十多年，几乎是从没见过亲戚本家们。

内宅老妈妈们，象王妈妈、金妈妈、朱妈妈、张妈妈……对我母亲很好，很疼爱她，亲切地叫她宝姑娘，象对自己女儿一样。每当我母亲挨打受骂后，老妈妈总要趁着陶氏不在时来劝慰一番。陶氏对我母亲的这些事，也只有内宅的这几位老妈妈知道，内宅外的几百名仆人和十二府的本家们是不清楚的，时间久了，风言风语地有些耳闻，也有信的，也有不信的。

陶氏每天除了打骂虐待我母亲，还要烧香拜佛。她盼望自己能生养，因此最信观音菩萨，送子娘娘。这些神像面前总是供品不断，香烟缭绕。但这些神仙始终没给她送来个孩子。

我们姐弟三人当然要算她的子女。她是太太，我们是少爷、小姐，都是孔府的主人之列。我的母亲是个收房的丫头，又是那种处境，实际比仆人还不如。当母亲在分娩的时候，陶氏就盘腿坐在她自己房内的床上等着，我们刚刚落生，立即就被抱到陶氏房中交给她。亲戚本家也都来向她道喜，把她当作

我们的母亲。从此就在她的吩咐下由乳母照料，而我们的亲生母亲却没人去理会，她只能同其他仆人一样地称呼我们“少爷”、“小姐”。

孔府的府务，大小事情都要陶氏说了算。孔府司房的师爷是她从北京娘家带来的，此人姓杜名炳勋，杜师爷是陶氏的心腹，把持了帐房大权，陶氏还叫我们姐弟三人认他做干爹，杜师爷来到孔府以后，变得很阔，在外面盖了房子，买了姨太太。但是这个人后来也倒了霉，陶氏发现他大量贪污，将他撵走，要他离开曲阜。他走时，没人监视、检查，偷走了孔府的大量财宝，没想到半路上有陶氏预先设下的“埋伏”，截住他的车辆检查，将他所有东西没收，而且弄得狼狈不堪，看来这位杜师爷在陶氏面前还得拜下风。

陶氏从北京带来了好几个人。除了杜师爷还有个师爷叫陈文彩，另外还有赶车的冯二、花园里的老陈、种菜的崔五、裱糊匠贾俊昌等等。还有陶氏的几个兄弟、九舅、三舅、十一舅都常来常往，来了就住在南花厅，那是贵宾住的地方，孔府的许多事都由他们经手。孔府的土木兴建、物品购买，应酬送礼等等，一概都要过问，族里的人对此很有意见，也是敢怒不敢言。后花园目前的规模，就是按照陶九舅意见修的。陶氏则每天上午坐在前上房书案前听“回事”，批各种呈文。在有了小弟以后，直到陶氏去世，孔府的官员、执事、小甲的呈文里，抬头都要写“老太太、公爷 恩准”。由此可见陶氏在各方面都要保持她在孔府的位置。

在我父亲去世，小弟德成诞生以后，陶氏掌握了孔府大权，她在家族和社会上都很有活力。陶氏还准备主持修订家谱。由妇女主持修孔氏家谱，这在两千五百年来还是第一次。筹备

了两年，刚要正式动手，她就病死了。

内宅的前上房挂着块红底金字的横匾，上书四个大字：“宏开慈宇”，那是曲阜和附近几个县的绅民联合献给陶氏的。据说有一次军队路过这里，陶氏派人给军队送去酒肉等许多慰劳品，同时要求军队不要干扰四乡。结果当官的下了命令，不许占民宅、不许骚扰地方，军队开走后，几个县就联合献给她这块匾，匾的两边抱柱上还有一副红底金字对联，原句我已记不清了，大意是赞颂陶氏深明大义，发扬两千年的祖风，精心培育幼圣，施恩乡里。单看那对联和匾额，陶氏真是完人无缺了。

与此相对照的是我还看过一份控告信。那是孔氏家族六十户的代表，孔宪标等人联名写给国务部总理兼内务部总长的，现摘抄如下：

“陶氏……门实卑微，性尤妒忌，先衍圣公孔令貽之侧室王氏生子，数日即暴死，岂无原因。杜炳勋、陈文彩皆前清刑部恶吏之子，不知何因以姐弟相称盘踞府内，穿堂入室，共饮共食……林庙柴草每年约一百余万斤，原为孔氏公产，杜等唆使陶氏据为己有，剩柴运走，不许家员族人拣拾，近又强占孔繁电坟地，种种恶迹实难胜举……”

这封信或者这许多封同样性质的信，都丝毫削弱不了陶氏的权势，她稳坐孔府的天下一直到死。

还有按照孔府家规，内宅是不许留男客住宿的。比如康梁变法时，康有为来曲阜宣讲他的学说，以及应康的好友孔祥林（衍圣公近支，是个翰林任过孔教会总理，）邀请来曲阜写曲阜碑节考序，孔林碑文序等，后来又来过几次，每次孔府都按家规招待他，在南五府孔昭增家下榻，而不留宿在孔府，更不进

内宅。可是在我父亲去世后，张宗昌来到孔府，带着十个装饰妖艳的姨太太和百十来个“毛子兵”（俄国人），轰动了孔府上下，陶氏竟然打破祖例招待张宗昌和他的十个姨太太住在内宅。那一伙毛子兵也在内宅里叽哩呱啦，随便游逛，还跑到后花园去，那后花园平日除了我们姐弟，轻易不许人去，那些“毛子兵”在后花园任意攀折花木，当时石榴正熟，摘下石榴来连皮一起啃几口又扔掉，满地狼藉，孔府里的人们和本家对于这些都十分看不惯议论纷纷，当然，只是背后议论，并没人公开提出异议。

陶氏这样做当然也说明了张宗昌和孔府的关系非同一般，我父亲在世时和张交往甚密，结为换帖兄弟，我父亲去世后，陶氏带着我们姐弟三人去过济南，向张诉说孤儿寡母之苦，张也曾在经济上多次给予援助。孔庙里修寝殿就是用张捐的两万元，工程很大，张从东北运来许多木料，都是在窑村车站卸货，当时组织了很大的人力运木料。

张宗昌多次来孔府看望，去孔林给我父亲上坟，孔府的奉卫队就是他派来的。在小弟德成六岁时，他又叫他的儿子张济乐和小弟德成换帖，结为盟兄弟，张济乐十四岁，在张宗昌的义威军幼年模范第一团任团长。

4. 母亲之死

一想到我善良的，可怜的母亲，泪水就涌上眼眶。

小弟出生第三天，我的可怜的母亲被陶氏毒死了。

在“母以子贵”的封建家族中，“小公爷”的出生必将抬高母亲的地位，这是陶氏所绝不能容忍的。母亲自己当然也很

清楚这点。在母亲产后第三天，陶氏命她的心腹本家孔心泉买来一种中药，据说是“穿山甲”，产妇服用即大出血不止，最后死亡。

平日里我们内宅的人有病，总是请刘梦瀛医生，从来没吃过孔心泉的药。而且我的母亲产后正常，就在她死去的当天，孔府还向北京内务部发出电报，报告“大小咸安”。但突然陶氏端来一碗汤药给母亲，说我母亲睡觉时打哆嗦了，非要她喝下这药去。这种反常情况，引起母亲的警觉，母亲对陶氏为人是了解的，也有预料陶氏会对她下毒手，当时有个姓唐的老妈妈凑巧看见了，她见我母亲跪在床上哀求陶氏说她没病，不用喝药，陶氏当然不答应，非逼着她喝下去。我母亲喝完药，唐妈妈一直守在她床边，心里很难过。我母亲对她说：“我活着也没好日子，我倒不怕喝这药，我就是想孩子，想看看孩子。”但这小小的要求也没满足，我的母亲临死前没能再看到我们，特别是我的小弟德成刚生下来就抱走了，她连一眼也没见到。

母亲死后，陶氏放出话说，她是产后受风死去的，说她是在分娩后，由产房移到里间屋的床上时受的风。

母亲死后，陶氏让几个当差的在一天夜里不声不响地将母亲棺材从内宅后门抬出去，在孔林的一个角落草草掩埋，只一堆黄土，连墓碑也没有。

对于我们母亲的死，本家中背后议论纷纷，但没有一个人出头说话。当然，不说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偌大的家族中，也许是有敢于说公道话的人而又苦于没有证据，对这样的人也无可非议。至于那些在小弟出生前忙于争权夺势想在袭爵上捞一把的人，他们的沉默，那是由于衍圣公的继承由于小弟的诞生已经定局，对于我母亲的悲惨结局是无所谓的，虽然这

些自命以衍圣公的后代为荣的亲戚，是会虚伪地维护封建道德标准，标榜忠孝之道的，但他们出于私利，慑于权威而表现沉默。就做人的品质来说，孔府底下的那些愚忠的老仆们要比他们纯洁得多。

但是在数百名仆从杂役中，也有反叛者，出现了一位“义仆”式的人物。母亲死后十多天，有一个听差的逃跑了，头天晚上还有人看见他干活，第二天早晨就不见了。事后才知道，他跑到济南省政府告状，要求省里来查明母亲死的原因，要求惩办凶手。我很难想象他在那漆黑的夜里是怎样急急忙忙地奔走在通往兖州的路上，又怎样上的火车？那个时代是“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他到了济南以后，既无钱又无势，省政府怎么会理他的呢？何况陶氏的九弟就在济南，在省里当官，他不怕死吗？他一定遇到很多我想也想不到的困难。然而这位抱打不平的勇敢的人终于“胜利”了，省政府居然答应派人来孔府调查。这也是很侥倖的事，与时局有关，“五四”运动后，社会上掀起“打倒孔家店”的热潮，在政府官员中也出现了尊孔派与反孔派之争。反孔派官员想利用此案扩大自己阵营的影响，所以成立了“王氏死因案”派了两个办事人员来。此事非同小可，使得陶氏大吃一惊。听老妈妈们说，当省里派人来孔府办案时，陶氏吓得瘫在床上浑身发抖。但是这样恶人，是不可能甘拜下风的，她还是诡谲地筹划对策。省里来人首先追查药方，陶氏决定找个替死鬼。孔心泉是开药方并且亲自去买药的人，而陶氏向他面授机密时，并无第三者在旁可以证明。这样，孔心泉有口难辩，就成了陶氏的替罪羊。陶氏的狠毒在孔氏家族中闻名，孔心泉也是深知的，即使省里不法办他，陶氏也不会让他活下去，说不定还会株连全家。在走投

无路的情况下，孔心泉终于无可奈何地服鸦片自尽了。

孔心泉死后，陶氏还假惺惺地去他家吊丧，孔心泉老婆说了些很难听的话，陶氏这位“一品夫人”在众多客人面前狼狈而去。

孔心泉服毒自尽后，省政府以“一命抵一命”匆匆宣告结案。这里面，陶氏用了些什么手段？花了多少活动费？以及她那在济南当官的弟弟又怎样为她出力的？就不得而知了。

陶氏害死我的母亲的时候，我的大姐德齐五岁，我两岁，小弟德成出生三天。母亲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我是从照片上认识母亲的。在她生前的卧室里，前堂楼西间，挂着一张单人大照片，照片上是位端庄、慈祥、温顺的年轻妇女。我模模糊糊地记得，大约三、四岁时，我一个人站在这里抬起头呆呆地看着母亲的照片。这就是我对母亲的最初记忆，我并不知道这就是我的亲生母亲。

回想起来，在我小小的心灵里究竟想些什么是很茫然的，什么是母爱和家庭的温暖，我是不知道的。在我逐渐懂事以后，我从我的乳母王妈妈一边擦着眼泪，一边低声讲述中，才知道了自己的亲生母亲是谁，知道了母亲的许多事情。

在母亲生出我们之后，立即就被割断了任何联系。我们被抱到陶氏房中，按照陶氏的吩咐，由乳母照料。从此，陶氏就成了我们的“母亲”，我们称呼陶氏为“娘”，称呼丰氏“大妈”，称呼我们自己的母亲为“二妈”。在我们家里，“妈”不是表示母亲，是对结过婚的女仆的称呼。我们的母亲虽然近在咫尺，她也不能走到我们跟前亲吻抚摸我们一下，甚至连用爱抚的眼光看我们一眼也不行，只能低眉顺眼地恭立在我们面前，和别的仆人一样称呼我们“大小姐”、“二小姐”。这时

她是什么心情呢？她直到喝了毒药临死的时候还想着自己的孩子，可是她却从来没有接近过我们。有一次，我和南五府的老姑奶奶，那是一位比我长四辈的老太太谈起来，她说我的母亲曾接触过我的大姐德齐，在母亲怀着小弟的时候，有一次陶氏又打她，老妈妈们怕打坏了，可又不敢管，就跑去找大姐，大姐刚四岁，老妈妈小声嘱咐她，要她进来夺陶氏的鞭子，夺不过来就扑在母亲身上，大姐照办了，母亲跪在地上，大姐紧紧搂着她，那时也并不知是自己的亲娘，只是叫她“二妈”，而且又是个小小的孩子，自然不会有什么深刻印象，但是对我母亲来说，她是到死也不会忘记的。

老姑奶奶告诉了我这件事，使我更加凄然，母亲和女儿就是这样地接触吗？

在我做了母亲以后，每当儿女们亲昵地偎倚在我的膝前，这时候，我便常常想起自己的母亲，她做孩子的时候，离开了母亲；而做了母亲的时候又离开了孩子。逃荒、被卖、挨打、毒死，这就是她一生的道路！一个善良、美丽、聪明的农家女儿的道路。我的母亲已经死了，但是这条道路不是还有人在走着吗？

人们啊，保卫母亲和孩子吧！

老妈妈们还告诉我，我母亲生前总是孤零零地一个人生活，她既不是主人，又不同于仆人，她最早住在佛堂楼那边，后来搬到前堂楼西间，她一个人单独在房中吃饭，每顿两个菜——她自然不能和我们吃一样的。应当由仆人给她送到房中，但她常不用人送，自己到厨房来取，有时还来要点咸菜什么的，厨房的老师傅能看见她，一般的人见不到王姨太，老师傅到外面跟别人说，王姨太高个子，梳着“姑头”，说话很温

和，凡是按规定该仆人侍候的事，她都常常亲自去做。内宅里，除了陶氏，都对她好。

陶氏十分嫉妒我父亲和母亲的感情，总是千方百计不许我父亲到母亲房中去，每当她发现父亲在母亲房里，就要追到我母亲房里来大吵大闹，还要给我母亲记一笔帐。好在那时我父亲经常不在家，当父亲病重远在北京时，很想念母亲和我，捎信来要照片，陶氏还在父亲病床前讥讽说：“都病得这样了，还不忘你的小夫人。”母亲和我照这张像时，我虽然只两岁，但坐在正中，母亲侧立在我的身后，因为我是“小姐”，母亲是丫头被收房的姨太太，不能和我平起平坐。

去年我重访曲阜故乡时，看见母亲这张照片还挂在孔府前堂楼西间。是从合影照片上剪裁下来重新翻拍的单人照片。这是我母亲一生中唯一的一张照片。

尽管我们是从别人的叙述中才知道了自己的母亲，但在我们心灵深处，还是自然地呈现着人类美好的天性，固执地保存着对母亲的爱。母亲善良优美的形象，深深地印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上。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和大姐、小弟在一起谈论过，将来如有可能一定要为母亲重修坟墓。虽然已经再也看不见母亲了，但是如果把她的坟墓修好，也就使我们做儿女的心里平静些，使母亲有一个很好的归宿，永远安静地睡在那里。在我十三岁那年，陶氏病逝，准备与父亲合葬，有些好心肠的本家提出：我们的母亲王氏生了第七十七代公爷，为孔府立了大功，应当三人合葬。姨太太与衍圣公夫妇合葬，这是在孔府历代都没有过的事情。但最后还是商定三人合葬。当本家们在一起做出这个决定时，我的小弟激动得热泪盈眶，立即跪下向本家们磕头致谢。那年他才十一岁。

5. 一个被遗忘的人

每天早晨，一个身材瘦长、面容忧郁的少妇，象幽灵似地进到前堂楼堂屋，站在正中，向里间轻声问道：“老太太起来了么？给老太太请安。”得到里面的回答后，又象幽灵似地出去了。

这就是我一直还没有说到的另一位姨太太，我们的大妈丰氏。她按照孔府里姨太太的规矩，每天早上来给大太太陶氏请安。除了早晨请安，每到年节、初一、十五以及二十四节气，还要按规矩来给陶氏磕头，每次她都是规规矩矩地站在陶氏面前，眼睛看着地面说：“今天是初一（或是别的什么日子），给老太太磕头。”磕完头，还是眼睛看着地面，后退三步，转回身，悄悄地出去。

她的一生也是很不幸的，是姨太太，又不生育，长得也不算漂亮，这都引不起陶氏嫉妒，因此她没遭过什么打骂，在冷落和忧郁中度过一生的岁月。她是本地一个商户的女儿，进了孔府以后，好象就再没有出去过。按照孔府的规矩，不生育的姨太太不许随便进入正房，她除了请安、磕头，从不进入正房。也极少走出那厢房的房门。在我的记忆中，她除了重复地说着请安磕头那两句话，一生中就没有再听她说过别的话。

陶氏毒死我的母亲以后，为了掩人耳目，表明她对姨太太是贤明的，后来在她会客时有时也让丰氏同时在场。本家亲戚们从来没见过丰氏，所以看到陶氏旁边多了个陌生的妇女，都不认识；但略一留心，不必介绍也就明白了，因为丰氏穿着藕荷色的裙子，坐在陶氏身旁下的一只凳子上。按照孔府规矩，

姨太太不能穿正色裙子（大红、大绿），只能穿藕荷色的。姨太太在大太太面前也不许坐椅子，只能坐凳子，而且凳子要比椅子矮一截。

除此之外，孔府里对姨太太的规矩还很多。比如：大太太死了，姨太太要和儿女一样披麻戴孝；姨太太对叔伯妯娌们称呼，不能称哥嫂，要称呼老爷，太太等等。

我母亲被陶氏毒死后，陶氏为了掩人耳目，表现她对姨太太的贤良，还破例让丰氏住进了前堂楼西间，我母亲生前的卧室，陶住在东间，丰氏和陶氏离得近了，象个老妈子似地侍候陶氏，整天呼来唤去，端茶倒水，她总是默默地做着这些，常去厨房替陶取吃食或是吩咐什么，厨房的人还以为她是新来的仆人。

我十一岁那年她病死了，还很年轻。

当然在孔府及其本家众多人口中也有个别的姨太太得势，而大太太受气，甚至上吊自尽的事。孔府的“礼门义路家规矩”再严，常常也要因人因势而异。

三、内宅生活

1. 禁地

占地二百多亩、厅堂楼阁四百六十多间的孔府，主人却只有四个人，就是陶氏和我们姐弟三人。我们四人住在孔府的内宅。

进了孔府的大门，从中路一直往前，经过三门、仪门、大堂、二堂、三堂以及六个大院落，就来到内宅门前。

内宅是孔府的禁地，绝对禁止随意入内。在从前，内门上曾贴过这样一条谕告：“圣府内事关重要，无论何人不得擅自入内，如有违犯轻者司察处，重者定予严惩不贷。”在孔府的数百名仆人中，只有十几人可以进去。内宅的大门两旁排列着雁翅镗、虎尾棍、金头玉棍等刀枪剑戟、刑杖棍棒，很象京剧里的道具。但这并不是演戏，而是为了维护孔府的尊严。这些武器表示如果有人冒失闯进去，就犯有杀身之罪。

因为不许随意入内宅，特别是男仆不能入内，我父亲在世时，大约光绪年间，孔府遭“回禄灾”（火灾），是内宅里由于蜡烛烧着幔帐引起的。着火后，内宅里人手少，又多是妇女，外面人离得远，有的稍近些的，听到里面呼救也不敢进来。结果大火蔓延开，烧了三天三夜，七座楼房都化为灰烬，楼房是木结构的，火苗窜得很高，由于热浪冲击，有烧断的木头带着

火苗腾空而起，人们看见了，说这是飞起的“火鸟”，这场火是“天火”，那时没有消防队，水源远而少，真是束手无策，曲阜县县长来了，就向大火跪着，求火神爷开恩，大火烧了三天，县长也整整跪了三天。孔府里救火的办法是在地上堆了好多堆钱，谁挑来一担水浇在火上就到钱堆那儿抓一把钱，也不用数，能抓多少抓多少，然后担着空桶再去挑水，回来再抓钱，专派了好多当差的负责往钱堆上堆钱。曲阜县远远近近的老百姓都来挑水救火。在我少儿时，老人们闲谈常提起这次火灾，说是火灾后重新修建孔府花的银子，比明朝修筑一座曲阜县城还多，还不算被烧掉的字画、古玩、财物以及救火中买水用的钱堆。

这次火灾后，曲阜城里有了消防队，那时候叫“天衣社”，在鼓楼附近。民国初年，孔府又着了一次火，是从学屋烧起来的，因为发现及时又有了“天衣社”，当天就扑灭了。

几次火灾，也不接受教训，水源仍很少，男仆仍然不许入内宅。连络内宅挑水的水夫也不许进去，在内宅门的旁边，有一道流水石槽，从墙外通到内门里，水夫将水倒进水槽，水就象小溪一样沿着水槽流进内宅。

在内宅大门口左右两条黑漆长板凳上坐着十余名看内门的当差。他们也不能进去，只能在内宅门口活动，遇有贵客到来，他们就站成一排垂手恭立，由领班的拉着长声向里面通报：“××太太到！”然后再由里面的老妈子出来迎进去或者挡驾。我小的时候，内门上有七个当差的，看门的四人，传事的有三人，他们是：陈寿卿、许炳文、赵启栋。陈寿卿早先是孔府戏班子里的演员，嗓门很响亮，这时，他们三个传事已可以进内宅禀报，规矩不那么严格了。

还有，早先内门当差的起仪卫作用，都要很懂礼节，但在我那个时候，有个看内的当差叫韩德魁，这人挺怪，轮到他值班，他就蹲在门口一动不动，什么贵客来也不理，就那么蹲着，脸上也毫无表情，十来个小时不喝水、不上厕所，从这点看又没人再比他忠于职守了。管事领班也没人说他。人们都叫他“门蹲”。按照府规如果贵客是乘轿车来的，就在角楼旁的小东门停下，换乘孔府内的小轿子抬进内宅。这种小轿子和电影《红楼梦》里林黛玉进贾府时乘的小轿子完全一样，蓝呢轿罩，一个座椅，小而轻便，由前后两人抬。这种小轿子，只在孔府内行走时使用。每逢陶氏外出，也是从她居住的前堂楼门口或前上房门口，乘这种小轿子到小东门，换乘大轿车，再跟上跟班。孔府里有个“跟班房”，里面的当差就是专在主人外出时在身后随行侍候。主人不外出时，他们则在跟班房内休息。跟班房的人要跟随主人外出，所以很注重他们的仪表，体态要和主人般配。我父亲高大、魁梧。常跟他出去的跟班房的人也都是高个，其中有一位名叫赵北夫的现在已九十来岁了，还健在。

陶氏外出一次很麻烦。在孔府内她乘坐的小轿子，除了轿夫外，还要有一名当差扶轿杆。经过哪道门，哪道门上看门的当差都要站成一排恭敬请送，还要由领班的上前打千问候，说：“给老太太请安！”后退三步，回到队里，小轿子继续前进。经过许多道门上的请安后，方才到角门换乘大轿车。大轿车的最前面有一个骑马的当差开路，叫“顶马”。如是晚上，则“顶马”的前面，左右还要有打灯笼的，灯笼上印有红色扁的老宋体字“袭封衍圣公府”。“顶马”后面至少要有八个荷枪实弹的奉卫丁——孔府的警卫部队奉卫队的士兵。在奉卫丁

的后面才是陶氏的轿车。轿车很讲究，拉车骡子的鞍是由珐琅制成，缰绳是紫红色的。车身很宽，左右各两个大玻璃窗。夏天，换成纱窗；冬天，车篷子里面是灰鼠皮的。陶氏坐在车里，外面两边的脚踏板上站着车夫和一个当差，前面车辕上盘腿坐着个老妈子手托陶氏用的银制水烟袋，她是专给陶氏点烟的。轿车后面有十多名跟班的当差，有的骑马，有的步行。

我小的时候听说，我的父亲孔令貽外出时的排场更大。清明节去孔林上坟，仪卫队的阵容是：炮手一人，锣夫四人，鼓乐四人，高帽四人，车门提炉二人，内门提炉二人，引马三人，马夫四人，轿夫八人，预备轿夫一人，帮轿二人，大跟班四人，小跟班五人，长班一人，家丁十五人，车房仪卫若干人，影堂二人，正身一人，司垫一人，挑供一人，茶挑二人，挑银二人，厨役一人等等共近百人。沿途吹吹打打，轰动全城。我的祖父和曾祖父时期如果进一次北京，不仅随从仪卫更多，而且沿途各州、县都得动员起来，事前要通知各县准备“印官一员，大轿一乘，轿夫三班，皂隶十八名，杠夫三十名，坐马两匹，中马二十五匹，马快十名，吹鼓手一付，雨具全，遇夜多备灯火。”

到了我的父亲孔令貽去北京时，就用不着事先通知沿途州县了，只乘坐头等软席专列火车直达北京。只是在我父亲死后，灵柩运回曲阜时，北京内务部给沿路各县下的通知，地方官员都要隆重迎送，对灵柩小心照料。

我们姐弟很少外出，外出的仪仗队伍也不如陶氏那么多，而且我们的轿车和陶氏也有不同。陶氏乘坐的叫“坐车”，我们乘坐的叫“小二车”，不及“坐车”讲究。另外还有一种轿车叫“大二车”，比我们的“小二车”又稍差些，是专给孔府

7. 7.

老妈妈们外出时乘坐的。至于当差的外出，一般都骑马。孔府马号里养着几十匹马，是给当差预备的。小弟德成十来岁外出时，也没什么仪仗，就是贴身当差陈景荣、吴健章、李凤鸣跟着，顶多再带几个奉卫丁。而且我们总是从后门出去，在孔府里也没那些排场了。

大姐小的时候有一次去北京玩，看见北京街上跑着的马车很喜爱，就从北京买了辆马车带回曲阜，并且从北京带来个姓冯的马车夫。于是在曲阜城里出现了第一辆马车。孔府的骡车换马车，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件很时髦的事。

由于内宅轻易不让人进去，而我们又很少出来，出来时又是前呼后拥，很不一般，所以人们对于我们在内宅里怎样生活也总觉得好象很神秘。本家们在一起闲谈时，谈到我们的内宅生活也好象是个谜。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神秘，只不过是一个妇女和三个小孩，整天过着平淡乏味的生活罢了。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孔府既是公爵之府，又是圣人之家，因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既有大贵族的豪华，又有所谓读书人的某些简朴的素质。整个建筑群是个典型的大贵族的官衙和庄园，而处处又显示着书香门第读书人家的气氛，屋里屋外，门框、抱柱，到处都是：“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一时贤者皆从之由”；“万卷诗书易读”，“十年树木长春”，“交友择人处世循礼”，“居家思俭守职宜勤”，“有好友来如对月”，“得奇书看胜观花”。在前堂楼院里大影壁上，画着一幅很大的“贪吃太阳”图画（“贪”是象征贪得无厌的一种动物），脚踩遍地金银，还张开大嘴向着太阳。给我们留下这幅画的祖先，想以此丑恶形象告诫子孙什么吧。

千百年来世代居住在这里，陈陈因袭，很少变化，内宅生

活几乎与外世隔绝，一切都是非常守旧而单调的。

孔府有个祖传的习惯，就是所用物件都是祖宗传下来的。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一件不能少，新的东西一件不能添。就拿忠恕堂这一个厅堂来说，室内摆设一百三十多件，如镀金花盆、古铜罐、玉花篮、小铜鼎、古铜鼎、昌黎集博古灯、沉香凤凰山、古铜穿衣镜、扑翠凤凰镜、玉镜、自鸣钟、玉片钟、大理石方几、檀香笔筒、六楞宫灯、竹根狮子、琴桌、罗汉榻、小片金炉、碧玉碗、霁红瓷瓶、御赐书、多宝阁、玉鱼龙花插、珊瑚盆、琉苏灯、汉扁瓶、景泰瓷鼎、硬木刻花脚踏、玉香亭、御制诗文集、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尚书精义、行宫图、八大家字帖、蒋廷锡条山、山水高挂达、唐寅山水、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多少代就摆在这里，不论大小，一件不能随意移动，也不能随意添置新的用具。但民国以后，毕竟也随着社会进展有所变化，后来在孔府里也添置了玻璃穿衣镜。孔府以外的人家有一面玻璃镜子，是很平常的事，可是在孔府，不照古铜镜子，而照玻璃镜子，却好象是一次了不起的革新。

在孔府，没有热水瓶，虽然市面上很多，可是竟没有人想到买一个来。我们用开水要到茶炉上去打。孔府的茶炉也是外面极少见的，铜的，象个火锅，但比火锅大多了。中间烧木炭，四周是水，每逢我们去孔林或外出，当差的要挑着茶炉跟着，一头是茶炉，一头是木炭，比起携带一只热水瓶来真不知累赘多少倍。

还有一件事也可以说明不改变祖传习惯，在孔府人员编制中过去是有轿夫的，后来轿子取消轿夫也早改做别的行业，但在造编制表格时仍要写上轿夫，小弟结婚后，别人从青岛送来了一辆小汽车，也有汽车司机了，可是孔府编制上还要设上轿夫

的名额，轿夫没事干就做些勤杂事务，而且只有一个人。仍写他的职务是轿夫。

孔府里传统的刺绣——鲁绣，在全国是闻名的。绣法多样，有单丝绣、双丝绣，打子、百纳、绣花等。绣品的形式有包、带、盒、套、条、幅等。绣的有山水、人物、花卉、禽兽、草虫等，都体现了鲁绣的构图严谨、手法多样、艳丽夺目、形象生动的特点。孔府里有个专绣花的叫朱二妮，她的刺绣在孔府常做为礼品送人，还将她绣的花装在镜框里，象画一样挂在墙上。孔府里还有专人养蚕织丝绸，有个养蚕的人叫姚荣，他也常和我们一起玩，我们也常到后堂楼去看他养蚕，他和别的养蚕人都穿着孔府发的麻布大褂（那是养蚕的工作服），后堂楼铺满了帘子，他们养蚕织的丝绸与外面市场上卖的不同，质细且厚，夏天穿特别凉快，看起来也格外挺而软，多为古铜、灰、蓝色。

尽管孔府自己织丝绸，有刺绣，但我和大姐——我们这两位“小姐”的绣房里却都不用。为了保持我们是“圣人”后裔的家风，严格恪守读书人简朴生活的祖训，在我们的床上只铺着家织的蓝底白花土布床单（后来我看到农村里常用这种布），我们的被子也不是丝绸被面，而是普通的花布被面。在我们的绣房里没有一般女孩子们所喜爱的那些红红绿绿颜色，所有的门帘幔帐之类无一绣花，大多是蓝色的。

在衣服穿着上反映着上述矛盾现象：一方面是大量的缝制华贵的衣服，一方面又放在箱子里压箱底不穿。比如陶氏，她在民国五年九月一次做衣服就做了一百六十二件，其中只是貂皮、灰鼠等名贵皮袄就有十余件之多，其他丝棉、绸缎、单夹衣裤就更不用说了。我父亲的衣服也是很多，从他的《找衣簿》

来看，一年为他准备四百多件大件衣服。第四号找衣单上记着下列一些衣物：珍珠毛蓝宁绸袍、珍珠毛青缎长袖马褂、狐腿长袖马褂、狐腿对襟坎肩、银灰长袖马褂、花灰蓝宁袍、灰青缎长袖马褂、小毛羊皮灰绉袍、小毛皮蓝长袖马褂、中毛羊皮青长袖马褂、灰呢大氅、珍珠羊裤缎袍、灰羊绉绸扎腰。

一张外褂单上写着，花灰鼠二件、珍珠毛一件、金银嵌、天马狐嵌、天青织地、元青宁绸、织锦麻地、红青线绉、红青洋绉、红青缎子、元青实地、天青呢子、天青线绉、青呢子、天青线绉、青线绉、红青羽缎、天青羽缎、青袖绸、天青纱。

我们的衣服自然也不少，有好多件都是多年前做好的，可是我们自己都没见过。我们实际日常穿着却完全不同。说起来很难使人相信，我和大姐这么两位“小姐”虽然有大量名贵衣服，可是平日穿的只是蓝布大褂，黑布鞋，脑后梳根大辫子，扎着红头绳，完全是普通女孩子的打扮。这大概也是为了体现出我们是“圣人”后裔的朴素“家风”吧！小弟德成因为是男孩子，就更如此了。只有在年节喜庆之日，我们才穿绫罗绸缎，插花抹红，打扮一番。

我和大姐出于女孩子爱美的心理，不满足于整天穿蓝布大褂、黑布鞋，想漂亮一些，可是我们从来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怎样打扮才算漂亮？我们女孩子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甚至孔府里面的许多地方，我都从未去过，更不要说到外面去了。所以外面市面上时兴些什么样式，什么衣服鞋袜之类的东西，我们是从不知道的。就拿穿鞋来说吧，我们除了穿家做的布鞋，从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别的鞋。在我十多岁时，有个本家给我和大姐送来两双雨鞋，黑色、浅脸，小圆口，如现在老头儿们还常穿的那种古老样式的雨鞋。那时候不叫雨鞋，送鞋

的人也不懂这是下雨才穿的鞋，他看着黑胶皮鞋上的亮光，说这是“带亮光的鞋”，告诉我们这是现在大城市街面上最时髦的鞋了，特意买了两双送给孔府的小姐穿。这就是我们第一次、也是结婚前唯一的一次看见布鞋以外的鞋。我们真是视若珍宝，不懂是用什么材料做成，对鞋面上的“亮光”极为惊讶。那些日子虽是晴天，又值酷暑季节，我俩却整天穿着雨鞋在孔府内象逛大街似地到处走，逢人便显示新鞋。许多人不知道是由于赞赏还是由于揶揄，都说：“啧啧！这世道真和过去不同了，小姐穿上带亮光的鞋子啦！”

后来我和姐姐更“时髦”了，穿上了“洋袜子”（从北京、济南买来的线袜子），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应当怎么个穿法，于是按照自己的猜想穿起来。先穿上家做的白布袜子，布袜子外面再套上洋袜子，因而感到脚上相当闷热不舒服。可是当时心中只想到漂亮，很得意，耐着性子忍受那种闷热的痛苦。

我和大姐的帽子，就是农村梳髻的老大娘们戴的那种黑平绒圆帽。我们以为所有妇女不分年龄只有这么一种帽子，从来也没打听过还有没有别的样式，我们只是按照自己的设计，随便挑拣了许多珍珠翡翠缝在帽沿上。至于发型？过去是脑后梳一根大辫子系红头绳，十多岁时忘了是从哪里学来的，有时就梳高发髻，当时虽然早已是民国了，我们却梳起前清时期满族妇女的那种高发髻。

绫罗绸缎我们并不喜欢，我和姐姐结婚前最时髦的衣服就是一件从济南买来的花洋布大褂。

小弟德成不象我们那样追求时髦，家里给做什么就穿什么，从不挑剔。从两、三岁就穿长袍马褂，小帽沿前面用珍珠缝成个“寿”字，一直到他结婚，还是穿长袍马褂。

2. 童 年

人们常说：“金色的童年”，我的童年是什么颜色的呢？我说不出，好象是蒙着一层灰尘，是陈旧的。但是在灰尘下面也有稚嫩的童心，真挚的情感，天真无邪的欢笑和幻想。人对童年的记忆是最深刻的。

现在的孩子都有许多小朋友，同学呀、邻居呀、亲友呀，我们可没有，在那样大的一大片房子里只有我们三个小孩（后来又加上了三妹），不管干什么，我们都是三个人在一起，在我们相处中从没有发生过争吵，如果我们正在玩，小弟被带去见客了，我们就停下来，等他回来。吃饭、睡觉、读书、游戏。从没有分开过，真是朝夕相处，形影不离。

小弟是小公爷，小圣人，在日常生活中对待我们姐妹和小弟自然也要有区别。比如过端午节，要将雄黄浸泡后涂抹在我们姐弟的前额，说是在这一天脑门上抹了雄黄，一年都可以避邪。在抹雄黄时，小弟和我们就有区别了，用手指沾雄黄后在他的脑门上写个“王”字，而在我和姐姐的脑门上不过是随便抹上几横道。

除此以外，如同历代衍圣公一样，自然还有不少关于小弟不同凡人的传说。比如说某扇门上有条巨蛇趴在那里，多少人来关门都无法推动，后来有个当差的爬上去看，当时就吓昏过去，而门仍无法关闭，恰巧小弟走来，那时他刚几岁，他刚走到门口，那蛇立即逃跑了。如此等等，举不胜举。说的许多事情，常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在我们姐弟相处时，特别是我们在一起玩的时候，倒总是他要听从我们的意见。捉迷藏、过家家、逮

人玩、或是做什么别的游戏，我和大姐说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我们也难得有几个小伙伴，有个男孩叫刘三元，他祖父常来给内宅的人看病，因为年老每次都把他当做“拐杖”扶着他。后来他祖父死了，由他父亲来给我们看病，还是由他搀扶着，他来了以后我们总要在一起玩耍，有时不看病，我们也派人去他家把他叫来一起玩。他长大些就来到孔府当差，在书房当过书僮，练出一手好字，会背很多经书，还跟他父亲学会看病，还有德成乳母张妈妈的女儿，我们都叫她“妈妈妮”，她除了干活也经常和我们玩，后来她不住在孔府了，到外面帮他父亲种菜，也常来，此外还有小朱小，朱二妮等，每逢有这些小伙伴在一起的时候，就显得格外热闹，玩的时候是没有什么主仆、尊卑之分的。我们有一辆小平板木车，常是我和大姐、刘三元坐在车上，用一只黑羊和一只白羊拉着车，小弟拿着鞭子在地上一边跑、一边赶车。

我们姐弟小的时候，没什么玩具可玩，因为我们的祖先没有留下玩具，而孔府又轻易不买外面的东西。我们只有许多珍珠、翡翠、玛瑙、金子之类的珍宝可玩。还有，内宅有许多零散的圣迹图或碑帖上的拓片，我们也常用来折叠成各式玩艺。

“过家家”玩的时候，没有小布娃娃，常用后花园的野草或秫秸扎成小人玩。后来，当差的用木头给我们钉了这辆小平板车，又牵来两只羊，一黑一白，我们坐在车上，用小羊拉车，这是我们姐弟三人童年时代唯一的一件玩具了。

我们也常在后花园玩，每次都跑到假山的山洞那里去，我们说那山洞是我们的“老窝”，在那里追跳嬉戏。谁也不顾小弟是什么“圣人”不“圣人”的，有一次，小弟拿小土块砍着刘三元，刘三元哭了，小弟很着急，赶忙过来哄他，拿万金油给

他抹，还央告他别去告诉陶氏。可是有一次刘三元和我们玩“三仙传套”的游戏，是变戏法，小弟把玻璃球放在嘴里，不小心咽下去了，把刘三元吓坏了，也惊动了整个孔府，直到小弟大便时，将玻璃球拉出来了大家才放心。

陶氏不喜欢我们玩，看见我们跑啊，笑啊，她就不高兴，看不惯。说：“学安稳点”，其实正是我的祖母嫌她不安稳，她和我父亲结婚后，我祖母嫌她走路慌里慌张，一点不端庄，稳重，没个“一品夫人”的派头。她大概是用我祖母教训她的那一套，来要求我们这些几岁的小孩子。

我们常一边玩，一边要留心陶氏，看见她远远地过来了，立刻就停止，等她走过去再继续玩。

孔府东学临街的高墙里面，在墙根有个大土堆，站在土堆上可以从墙头看见外面。有的时候，我们闷极了，非常想出去看看外面是什么样子，就跑到那个大土堆上扒着墙头往外看，看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摆摊的，挑挑子的小贩和那些小商店的门脸。后来当差的觉得公爷和小姐经常扒墙头不太雅观，不成个体统，可是又不好制止，就想出个法子，在那个土堆上搭了个小看台，还有棚子，我们就可以坐在那里堂而皇之地往外面看了。

从我出生直到结婚，在孔府生活了十七年。这十七年里我没有到外面看过一次戏，更不知电影为何物？每次看戏都是在孔府里前上房的大院里搭上戏台。搭台埋柱子不许挖土，孔府的土不能乱动，怕破了风水。院里有四个大“坠石”，中间有眼，是专用来插柱子的。

使我一直都感到奇怪的是，搭戏台埋柱子不许动土，可是小弟的乳母张妈妈，在前堂楼院里，擅自掀起许多青砖，种了

一大片金瓜，竟然没人管，陶氏也置若罔闻，这大约是因为她是乳母的关系吧。

再接着说搭台唱戏，这是孔府生活中唯一的文娱活动，我父亲是个“戏迷”，清末时期孔府里有两个戏班子，一个京剧、一个山东梆子，有全套戏装、道具，从北京、济南招聘来不少演员，有个叫纪花玉，据说很有名。我父亲去世后，他到北京去了。后来戏班子解散，有些演员就留在孔府里当差，而且那些戏箱都还有，每逢唱戏，还由这些人唱，再配上一些别的当差，如马号的陈心泉唱大花脸，花园的老陈跑龙套，这些当差的嗓音和作派都很不高明，不过孔府的戏装却很讲究，单凭那些华丽的戏装，就足以使我入迷，何况我从未见过专业剧团的戏，也无从比较。因此我们姐弟一听说搭台唱戏都非常高兴。

除了看孔府搭台唱戏，我们几个小孩平时也唱戏玩，那就总要找上三元、妈妈妮，有时还把照看小弟的当差陈景荣拉上，在后堂楼，我们各自用些另碎绸缎打扮起来，后堂楼喂蚕的姚荣替我们放哨，看到陶氏过来了就拍巴掌，我们立即停下，等陶氏走过去了，总是小弟急不可待地问：“刚才唱到哪儿了？”于是又继续唱。我们唱过《捉放曹》、《陆文龙观画》等好几出戏。有一次孔府里搭台唱戏，小弟也参加演出，唱《举鼎观画》，小弟专管拿“狮子”，他拿早了，还没拍板，他就去拿。下来后大家都笑他。

玩了一阵，饿了，就派人挎个竹篮到厨房去取馍馍或点心，取来后，由我或小弟按人数平均分成若干分，有时谁从家里带来馍馍了，小弟也要来吃。

我们很少吃到外面的东西，我记得曲阜城里有个挑担子卖糖果零食的，叫赵蹦儿，有的时候我们很想看看外面的一些东

西，就叫当差的去叫赵蹦儿，他挑着满满一挑糖果零食进来，花生糖、糖葫芦、山楂糕之类，我们就叫许多仆人，不管大人、小孩，男的、女的，都围在担子周围随便吃，我们姐弟也吃，觉得吃外面的东西很新鲜，很好玩。等到满挑糖果零食都被仆人们吃光了，就叫赵蹦儿到帐房去领整挑甜食钱。

每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就用轿子从外面请来一位姓刘的老医生，一直抬到内宅来诊治。这位刘老医生，叫刘金佩，世代祖传中医，医道很高明。是我祖父时由皇帝御赐给孔府的御医，后来不知为什么小事得罪了陶氏，被陶氏撵出孔府了。有一次我父亲生病，请了好几位医生治疗无效，最后又把他请来，只服用一剂药，病情立即好转，三剂药后，痊愈了。从此我们有了病还是要服用他的药。但陶氏既撵他出府，自然不能再叫他回来，所以每次我们有病就用轿子抬进来，平时则住在外面，他去世后，他的儿子刘梦瀛继续给我们看病。刘梦瀛对孔府很忠心，除了看病，平时还替我父亲干许多事情，我父亲有时候顺手把一些钱放在他那里随后就忘记了，多少年后他还提醒，有一次孔府通过他借给别人一笔钱，后来那人破产，买卖全被查封，刘梦瀛没对我父亲说，自己卖了些东西，又借了些债，将钱还上，他说这是圣府的钱，不能受损失。

小弟小的时候得了一场重病，大概是伤寒之类，刘日夜守在床前，他还熬了一锅鸦片在家里放着，把后事也料理好了，对他妻子说：“什么时候小公爷一合眼，我也就把这鸦片喝下去。”这事是在小弟病好以后我们才知道的。我们对他都很信服，他的医道也很高明，曲阜城考医生都是由他出试题和临床考试。后来他的儿子刘三元也会看病，曲阜城里老百姓有病都愿意找他。

我们有时也出去玩，曲阜有个古泮池，是孔府的别墅，我父亲在世时修建的，有山有水，景致很美，夏天我们常去那里，古泮池里的虾特别透明，我问一位老奶奶，她说是因为皇帝看过的原因，她还说古泮池的青蛙不叫，是因为皇帝在这里住过，听见蛙声嫌烦，下了命令不许青蛙叫，以后就不叫了。但那时古泮池的青蛙叫不叫，我也不知道。此外还有个西关花园，我们也去玩。小弟有一张照片，是七、八岁时拍的，站在中间，两边各有两名高大的奉卫丁全部武装，持枪守卫着这个小孩子，就是在西关花园照的。

3. 乳 母

我深深地怀念着我的乳母王妈妈。

我出生几个月她就开始喂养我，此后每一天都在她的照料下生活，她在我的童年生活中，在我的心灵上占着重要的位置，是陶氏所不能比拟的。

我们和陶氏的关系，谈不上什么母女或母子感情，一切都按礼教家规、规格化了，很难看出什么喜怒哀乐，而我的乳母王妈妈却是个有血有肉，有感情，活生生的人。她慈爱、温厚、诚实，从这个农家妇女身上我得到了从陶氏那里所得不到的母亲对女儿的爱抚和温暖。

我是我乳母的娇女，她爱我，直到她死。我记得每天早晨，当她给我梳洗打扮完毕，常常微笑地看着我，象欣赏自己的得意作品。有时喃喃自语：“真和宝姑娘一样”，这是夸我的话，那眼神流露着欣慰，也有一些哀怨。

我在她面前可以尽情地玩耍嬉笑，她从不象陶氏那样管

教，她说：“小孩子嘛，哪有不玩的。”

她有着说不完的古老的传说，曾带给我无穷的神奇幻想。

她对周围所有的人都热诚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这使我终生难忘。记得有一次她病了，正要吃药，听说有个当差的也病了，也需要这药，又没买到，她就立即把自己的药送去，而她也并没有多余的。刘三元在多年后提起这事时还十分感动，但对于王妈妈这样做却是很平常的。

我结婚后到了北京，她也跟着我来到北京，她看到我婚后生活不美满，她经常暗自垂泪，并且为了维护我的正当权利（譬如我的丈夫贪婪地索取我的钱财或者粗暴地对待我），表现出了在孔府十多年中从未有过的刚强，我这个读经书长大的圣人后裔处处以礼仪待人，对不讲礼仪者却不知如何是好，而王妈妈总是毫无畏色地据理力争。后来弄得矛盾越来越尖锐，我又无法解决，王妈妈为了不使我为难，她自己一个人又回曲阜了。但她的心一直在我身上，沧桑变换，几经飘泊，几十年后她还惦记着我，当她知道我在异乡处境十分困难时，她给我寄来了钱和她亲自缝制的棉衣、棉裤、棉鞋。那时正是严冬，真是雪里送炭啊，那些衣服都是丝棉、绸缎的，非常讲究。王妈妈——那时已是一个孤伶伶的老人，住在偏僻的农村，生活十分艰难，她有什么力量给我制作这样贵重的棉衣，她自己又要忍受着怎样的饥寒而把温暖寄给远方的乳儿呢？

一九七九年，我六十多岁了，有机会回到曲阜，在我的心上第一件事就是想再看到亲爱的王妈妈，但是她没有等到这一天，已经离开了人间。小弟的乳母张妈妈也病逝了，只有她的女儿“妈妈妮”还在。小弟的乳母张妈妈也很特别，她不是孔

府世袭仆人，这里面也有一段故事。小弟出生后总是大哭不止，找来了十个奶妈都不合适，有的吃不饱，有的吃了闹肚子……孔府上下都很着急，后来刘梦瀛发现在孔庙大门口坐着一个要饭的年轻妇女，抱着个小女孩，衣衫褴褛，而那孩子却非常胖。把她找进来洗了澡，换了衣服，喝了一大碗海参汤然后给小弟喂奶，小弟吃着奶安静地睡了，陶氏很满意，又让她试了三天工。这要饭的是在孔庙大门口发现的，都认为这是“天意”，于是便将她和她的小女孩都留在府里了。张妈妈的伙食由小厨房单独做，每天早上墩个肘子，晚上墩只鸡，一天二斤半馍馍。那个小女孩送回家由她婆婆抚养，每天由孔府发给那孩子一斤馍馍四两白糖。孔府还给了张妈妈的丈夫一个菜园子有十来亩地，还盖了几间小屋，使她家在曲阜定居。小弟九岁断奶后，张妈妈还住在孔府里，住了三十多年。

我们姐弟三人都和陶氏住在前堂楼东间，我和大姐住在里间，暖阁里一人一张床；小弟和陶氏住在外间，共睡一张床，由陶氏亲自带着他睡觉。张妈妈在陶氏房中搭个小床单睡，睡觉时不能脱衣裳，随叫随起。

张妈妈很爱她的乳儿德成，她病死在十年动乱中，临死时还反复说：“小成来了！小成来了！”她至死还怀念着远在海外的乳儿。

乳母可以和陶氏一样喊我们的小名，大姐叫大姐，我叫二妞，小弟叫小成，别人则要称呼大小姐，二小姐，“小公爷”。除了乳母外，还有专门照料我们的男仆，有个叫陈景荣的，我小时候就由他整天抱着，后来他又专抱小弟，陈景荣、吴建章、李凤鸣三个人照顾小弟，寸步不离。夏日每当小弟独自睡觉，李凤鸣就放下蚊帐，在蚊帐外面长时间地扇扇子。小弟幼

年祭孔时每次都由陈、吴在旁照料。一九三七年陈、吴跟随小弟由曲阜去重庆，又迁南京，一九四八年底又跟随去台湾。去台前在南京时，小弟外出还常常是陈景荣跟着，日用钱也多由他保管。

大姐的乳母也姓王，为了和我的王妈妈区别开，都叫她大王妈妈，她在大姐结婚时没有跟去。

4. 家 学

我们姐弟三人都是从五岁开始上家学读书，学屋最初在前上房西间，后来迁到西学后面。在学屋门外抱框上镶着一付木刻对联，上联是“东迨家庭，学诗学礼复旧业”，下联是“西瞻祖庙，肯堂肯构属何人”，书房里正中供着孔子神位和老师用的一张书桌，靠窗前放着我们三个人的小书桌，小椅子，还摆着一些盆花，墙上挂着大挂钟。教我们的老师是几位名儒翰林，主要有吕老师、王老师，另外先后还请过詹老师、边老师、庄老师。课程自然是四书五经、七弦琴，还有数学和英语，后面又加设地理、历史，从课程的开设多少也可以看出一些时代的影响。除了学这些功课以外，我们每天要花大量时间练习写字。孔府是很讲究书法的，这是一门传统课程。每有客人来拜访，总要在前上房大案子上摆出文房四宝写会儿字，这已成为接待贵客的不可少的礼仪。小弟德成七岁时就有人求字，以后求字的人越来越多，他忙不过来常常由我代笔。去年我回曲阜，看到文物商店还出售我的父亲孔令贻和小弟德成的墨迹。据说在仓库里还保存着我当年写的对联。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读书生活实在是枯燥无味，整天读

死书，没有什么休息时间，更没有安排过什么活动。每月有三个休息日，以旧历书上，建、朙、平、收、闭、破、成、开、定、执等字为序，每逢“成”日是休息日，但却不执行，老师对我们的时间控制得很严格，读书时如有客人来会见小弟，老师总是限制会客的时间，要求按时回来，下学以后会客也要经过老师同意。

每天早晨起床后，由各人的乳母照料洗漱完毕，就到书房去“读早书”。读到八点钟，我们和老师书房共进早餐，早餐后继续读书，读到中午，回内宅和陶氏一起吃午饭。午饭后又来读书，下午五、六点钟回去吃晚饭。在冬天，晚饭后，还要来书房上“灯学”，直到睡觉。夏天不上灯学，可以到后花园乘凉。平时从没有休息日，只有祭孔、扫墓的日子可以不读书，除此以外就只有过年时休息几天了。

过年后哪天开学上课，要由老师查皇历确定。开学那天书房里书桌上供着孔子的牌位，我们要先给牌位磕头，再给老师磕头，然后开始一年的读书生活。读书时，老师极少讲解，只是一味要我们背诵，顺序背诵还不算，还要倒着一句一句地背。书里的意思，我们是全然不懂的。记得我上学第一课，老师就叫背诵《诗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正着背完又倒着背：“君子好逑，窈窕淑女，在河之洲，关关雎鸠。”都背下来，老师微笑着向我点头，却一点不讲解。下学后，我问别人什么叫“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回答是：“小孩子，问这干什么？”从此，就只得一味地死背书了。

我们那样小小的年纪，一天到晚死读书，虽然读得头昏脑胀，但从不贪玩，倒也用功。在书房外面有一架很大的石榴白，夏天密密地开满小白花，香气很浓，飘进窗内，有时引得

我们放下书本，到石榴白花下玩一会儿。不等谁招呼，我们三人又一同回到书房继续读书了。

在我们读书时，陶氏也有时去书房看看。好象是检查，又不象检查，从不过问什么，站一站就走了。大概也完全是礼节性的吧。

我们上课时，没课的老师就在他自己的房中休息或读书、写字。这几位老师都是经过陶氏和本家们商议很久才决定聘请的，最初请的是王毓华老师，莱芜人，他是新式学堂毕业，经书基础较差，来孔府任教不久，本家中就有人提出异议，说如果光是跟新学堂毕业的老师读书，将来圣裔就要忘了祖宗了。恰巧这时庄海兰老师随中国邮政代表团来曲阜参观。庄老师年近七十，是个翰林，经书和书法造诣很深，孔府就挽留他不要回去，在家学任教，庄老师最后同意留下，但是客居孔府，不要薪俸，只是每日生活所需由孔府开支算是招待，专教我们韵字和经书。

后来庄老师又介绍吕金山老师来共同任教，吕老师是个举人，略年轻些，吕老师来后，王老师就不怎么上课了，只是辅导我们自习。王、吕、庄，这三位老师俨然是孔府的“忠臣”。他们一年到头住在孔府，很少回家。在我十一岁那年，陶氏患半身不遂，小弟德成原是和陶氏睡觉，陶氏患病后，小弟就和王老师一起睡了，王老师对他非常爱护，经常夜间起来为他盖被子。有时吕师母从外地来，吕老师就总要请我们去吃饭，放学后也时常带领我们三人到园中散步，除了读书，小弟在和亲友及官方人士交往中的问题也常向吕老师请教，每宴请贵宾也总要请老师作陪。

抗战前夕，德成由曲阜去重庆，吕老师同去，王老师留在

孔府。协同一位本家代替小弟照管府务，那时庄老师年事已高，但仍教三妹读书。抗战胜利，德成由重庆到南京，王老师又由曲阜去南京找他，王、吕二老师都住在南京孔德成办事处的楼上。解放前夕，他们都随德成去台湾了。

王老师这个人比较开通，他极力反对妇女缠足，他来到孔府时，恰巧大姐刚缠足几天，终日啼哭，王老师坚决主张放开。吕老师对此也不表示反对。孔府是特别尊师的，老师既然说了，也只好听从，于是就将大姐的缠足放开了，而且我也就从未裹过。这样，我和大姐就成了孔府中第一代“天足”的妇女。

我们上学不久，就按王老师要求写日记，都是流水帐式的。小弟在七、八岁时一篇日记如下：

“十二月十八日

早受穀梁传二小时，写小字六行，大字二张，作文题：宋公与楚人战于泓，诗为冬日即景，得冬字，下午受穀梁传二小时，温唐诗文选二小时，晚宋君来访，十时就寝。

是日晴，寒暑表三十六度”。

我幼时一篇日记如下：

“早七时起，梳洗毕，七时半到校受礼记一号自八周至上士二十七人，九时用早点，写小字六行，受左传一号自公会齐侯拔来至齐泄治之魏乎，十二时下课，午饭后一时拜影堂又拜佛堂，一时半到校写大字授左传一号又授唐诗二首五时下课往后园散步，晚饭后到校温诗经八时记日记，稍憩，十时就寝。

是日半阴半晴大风，寒暑表四十二度。”

我们每天除了晚上记日记，还要做一首诗，下面几首是小弟十来岁时所做：

夜中读书

今夜茅斋冷， 长吟寒灯前。
犬吠深巷静， 书声月在天。

园中

黄昏斜倚碧栏杆， 惆怅东篱菊花残，
闲步小园岁亦晚， 柏桐雀噪夕阳寒。

残秋

小园木落尽荒凉， 惟有老圃菊花香，
满地寒虫鸣寂寂， 空林雁声带夕阳。

红叶

何处秋树似吴枫， 点缀小园一带红，
犹似征人新战血， 几点乱洒此林中。

老师很少夸奖我们的诗文，多是提出不足，但态度总是很温和的。有时看到我们习作中的个别句比较满意，就反复念，我记得庄老师读小弟幼时写的“枫林叶初丹，归鸦万点愁”、“西风帘卷人同瘦，孤松独伴岁寒时”，他就很高兴，微笑着吟了好几遍，但仍不夸奖，后来说：“写诗格调还要高些，不要有郁闷之感”。

我们还学算术，现在想起来也很好笑，我们做算术，横式竖式都用毛笔写，没用过铅笔，更没用过钢笔，每道题下边的答话都须是规规矩矩的蝇头小楷。

家学里还经常考试，题目形式也很多样，写诗做文不算，还有卷面答题，填空、默写、改错字等等，我们三人的成绩差

不多总在90分左右，很少得一百，每次考完就要学屋的当差把分数禀报陶氏，本家长辈来府里拜访时也总要问起我们最近的成绩如何。

作业本或试卷上我们都要写上年龄，姓名、字，大姐德齐字伯平，我字仲淑，小弟字达生，他九岁时的签名是“九岁，孔德成达生七十七代孙”。

我们每天上学是由吴建章、陈景荣送去，上课时他俩就在学屋旁边的屋里等着，随时看着窗外，只要我们一出来，他们立刻就出来跟着，下学时他俩再送我们回来。学屋里还有个当差叫吴建文，是吴建章的弟弟，他比我们大十多岁。我们读书时他总是小心地在旁侍候，每次放学都是他和吴建章、陈景荣送我们回来，冬天要上“灯学”，总要晚上八、九点钟才放，孔府里几百间房屋的大院落一片漆黑，吴建文提着一盏小马灯，领着我们在长长的、曲曲折折的走廊里走着，不断地轻声嘱咐我们注意脚下台阶，或者是招呼我们，怕我们害怕。那情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几十年来不能忘记。

我的大姐结婚，嫁到北京，吴建文也跟过去侍候了。大姐婚后郁郁寡欢，二十五岁就在寂寞中死去，灵柩停在北京法源寺。大姐死后，吴建文哭得非常伤心，他独自一人长时间地在庙里守灵。后来，他又继续照料大姐留下的两个幼小的儿子，直到他年老病逝。

吴建文的哥哥吴建章一直跟着小弟德成，从曲阜到重庆，从重庆到南京，又从南京去了台湾。如果现在还在的话，也该是八十岁的老人了。

5. 年 节

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要算过年了。

年前祭灶在孔府也很特别。一般百姓家对灶王爷恭敬而虔诚，而孔府里的人们是瞧不起灶王爷的，认为灶王爷的地位远不如衍圣公高，财势远不如衍圣公大。所以孔府的主人是不能亲自祭灶，只由当差的去祭。

灶王爷所在的房子也可怜得很。他的神位不配供在孔府的厨房里，只贴在一小间多年不用的柴火间，烟薰火燎，墙壁乌黑，而且布满蜘蛛丝、灰尘。每年祭灶时常由一名当差的去祭，那仪式倒也热闹，总有七、八个吹鼓手在前面吹吹打打，司塾提着跪垫伺候，还有一些小当差的捧着供品之类跟随。在祭的时候，那当差的，好象是命令式地嘱咐几句，并不祈祷什么，因为“圣人自有天保佑”，灶王爷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到了我们那个时候，已经不大讲究这些了，只图热闹，好玩，小弟就亲自去祭过灶，由刘三元跟着，还有好多当差的。

腊八那天喝腊八粥也是件挺麻烦的事，平时仆人们都自己回家吃饭，这天全都在府里喝粥，还要给十二府的本家们送，还要给祖先牌位上供，给佛爷上供，所以要安排好多人熬粥，“户人”中的烧火户这天也专来烧火。支起大锅，熬出粥来盛在大缸里，摆很多缸。腊八粥分两种：一种是粗的，给当差的喝。放大米、肉片、白菜、豆腐之类，喝粥时一人还给一斤馍馍。还有一种是细的，内宅、十二府以及上供用，这种很讲究，薏米仁、桂圆、莲子、百合、栗子、红枣、红江豆、江米等等熬成，粥面上还放上“粥果”，做“粥果”很费功夫，比

如山里红吧，就把山里红刻成透空花篮放在粥面上，我们每次喝腊八粥，总是舍不得吃粥棵，要欣赏很长时间。

上供也是挺麻烦的事，就拿佛堂楼来说，大大小小的有成千上万尊佛：关公、玉皇大帝、观音菩萨、弥陀佛、送子娘娘什么都有，好象所有的佛都集中在一起了，每个佛爷面前一碗粥，光盛要盛半天，上完供还要再倒回盆里。这上供的粥就归管佛堂楼的当差所有了。我记得他姓陈，在我十来岁时他也学聪明了，改变了上供的方法，端来一大盆粥往佛堂楼中间一放，意思就是让所有的佛共用一盆，摆完了以后，这盆粥就由他端回家了。我看了好几次他这样上供，觉得他这个想法很新鲜好玩，管事人也不加制止，好象也默许了。

孔府在外面还有好多香火院，也来要粥，还要“盆头米”，大庄上的、东关娘娘庙的、以至泰山的都来，尼姑很多，在小弟德成出生以前，陶氏每年正月初八都要派人去泰山拴个娃娃，我父亲为了有个儿子也在泰山许过愿，所以人们都说小弟是泰山拴来的娃娃，替他在泰山认尼姑为师傅，每年都要派人去泰山进香还愿，过年前，也有许多尼姑来要米。

一过腊八就大忙起来，准备过年了，扫房、搭彩棚、铺红毯、换椅垫、宫灯、“蒸壮”……，“蒸壮”就是蒸各种馒头、包子、糕饼。孔府所有的厨房，三个班的人全都来，“烧火户”还来专烧火，都在内宅里，白天黑夜的忙。光是馒头蒸出来存放到大缸里就摆满好多间大屋子，馒头也分各式各样，大到半斤多一个，小到一两面蒸两三个，各有各的用途，有上供的，人吃的，普通饭的，酒席上的……区别很细。我们非常喜欢那种充满人声笑语，热热闹闹的欢乐气氛。那些天，一放学就赶忙回来，哪里也不去，就在家看“蒸壮”。

我们这时也很忙，每天都要大量写对子，快过年时求字的人特别多，除了亲友，孔府当差的也求字，我也给小弟代笔，我俩每人每天都要写十来副，有时我俩忙不过来，就由书房先生代写。

蒸完灶，这些内宅的当差老妈妈们一人赏一篮子馍馍、年糕、包子等蒸食。到了年三十又都集中在内宅整夜包饺子，孔府里到处都点着大玻璃穗子灯，牛角宫灯，大红蜡烛，立地大仙鹤铜炉里燃着檀香末，地上铺着红地毯，院里搭着彩棚，拉起五颜六色的彩带，我们姐弟三人午饭后去报本堂行礼，晚饭后去祖庙辞岁，还要拜报本堂，回来后就跑出跑进的玩，实在累了才去睡觉，到两、三点钟又被叫起来拜天地神，这也是孔府独有的规矩，在前上房院子里用席子搭起“天地楼”朝各个方向（东、南、西、北、东北、东南、西南、西北）摆好多张桌子，桌上摆着各种神的牌位，正中间那张桌子是天地神，但各种神的位置每年都要变换，要现查皇历确定位置。我们睡得迷迷糊糊被叫起来，朝这许多牌位不断地磕头，总要磕一大阵子才能磕完。

在前上房院里除了搭起“天地楼”供各种神位以外，还要立“朝天竿”点“天灯”，竖起一根很高的大杆子，象个大旗杆，顶端挂一盏大玻璃灯，日夜不灭，要点半月之久，因为高，曲阜全城都可以看到。

年三十晚上大人们要给我们三个人“压岁钱”装在红纸袋里，写上长命百岁，放在枕边，还要在我们每个人的景泰蓝食盒里放上用粘米面做的如意，小柿子，桔子等食品，大年初一我们一醒来不许说话，先要用手摸摸这些东西，起床后又要去拜庙、拜祠堂，大年初一这天，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整天磕

头，从清早开始，孔府的五百多名仆人分批进来拜年，这是他们一年中唯一的一次机会进内宅。陶氏坐在前上房堂屋的太师椅上，小弟和我们站在旁边，孔府里的，还有孔林、孔庙、马号、柴火园、各处奉卫队等等，一批一批地进来磕头，有的还要发赏钱——红纸做的小荷包里装几百个小铜子。前一批磕完头迅速退出，下一批又进来，磕不完的头，说不完的吉利话，就这样要折腾好久，好不容易仆人们拜完年了，十二府的本家们又开始来了，于是又是长时间地磕头，说吉利话。除了本家们来孔府拜年外，我们也要出去拜年，自从我十三岁，小弟十一岁那年，大姐出嫁以后，每次外出拜年就是我和小弟两人了。我们常是该拜的还没拜完，就开学了，只好每天放学以后再继续去拜。

从初一开始，连续多日，孔府门前直到鼓楼门，每天上午有集市叫“鼓楼门会”，很热闹，除了卖各种东西的，还有杂耍、洋琴、评书、打拳卖艺。我们每天都要去看这些表演，从不放过一次机会。

鼓楼门会是在上午，每到下午还有“龙灯会”，曲阜当地民间很流行耍龙灯，跑旱船，踩高跷，耍狮子，几乎各村都在过年期间组织这类活动，不管哪个村子的龙灯都要到孔府里来耍，孔府里的龙灯会总是不断。地点在二门里的大堂前面，村民和孔府外的人都涌进来看，这对我们来说是一年中能够看见农民的一次机会。但为了怕挤着我们，规定我们姐弟不能夹在人群中，只能坐在大堂的暖阁里远远地向外面看，不能出大堂。

耍龙灯时，孔府当差的和“花炮户”还要放焰火，焰火制作得很精致，五颜六色在高空中变幻出各种花朵。孔府里有两

套十八罗汉的头型面具，龙、虎、仙鹤、大肚子弥勒佛、小孩……等也都由当差的出来耍。

大姐稍长大些时，她也想要龙灯，我们都积极鼓动她去，她饰那个拿狮子头的，好多农民都笑着说：“孔府大小姐耍狮子了。”我们三人都觉得异常高兴。

过年期间还有一次机会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就是在曲阜北门外林前的“林门会”又叫“花市”。在长长的神道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颇为热闹。曲阜的纸花、绒花很有名，差不多家家都做为一种副业，远销到济南、北京等地。有人戴的，上供的（插在供品上），各种插瓶的，五颜六色艳丽夺目，我们姐弟每年都要逛一次花市，但并不买，当差的已经替我们买了许多箱，放在孔府内。我们只是坐在轿子里向外看，在花市转一圈就回来。我们坐在轿里与其说看花，不如说是看人，平时与外面隔绝，非常想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那些不是“圣人”后裔的农民衣着打扮，举止言谈，总是成为我们回来后兴奋地谈论的话题。

除了过年，在一年中我最喜爱的节日就是八月十五和七月初七，这两天晚上在前堂楼院子里，桌子叠桌子，叠好几层，最上面一张摆上香炉、供品、八月十五供月饼（是孔府自做的大小小一套一套的），七月初七供巧果（用模子扣出的各种七巧形的油炸糖面饼）。人们都告诉我们，因为供品摆的高，离天近，嫦娥、玉兔，牛郎织女看得见，就会下来吃，我们信以为真，每当摆上供品后，我们就哪里也不去，仰头看天，虽然什么也看不到，但每年还总要看，一边看，一边脑中还描绘着这些美丽的神仙们是如何飘飘然地过来了的情景。

在我结婚以后，离开家乡，到过许多繁华的大城市，每到

过年我总要想起家乡那些充满乡土气的质朴而热烈的场面，大城市里那富丽堂皇的剧场，造诣很高的艺术家的表演虽然好，但总不及它们亲切。

6. 府 菜

孔府的厨房很象皇宫的御膳房，但另有一套独特的传统菜谱和烹饪方法，通常称为“府菜”。府菜很有名，深受皇宫赏识，每年要有好几次进贡。孔府的饭菜分成多种等级，酒席也有多种规格。最高级的酒席，每桌上菜一百三十多道，这种酒席叫“孔府宴会燕菜全席”，又叫“高摆酒席”。历代皇帝和蒋介石、顾祝同、刘峙、孔祥熙、冯玉祥等人受过此种招待。在筵席的主宾席上不围桌而坐，要有一个空缺，齐桌围并排摆上四个“高摆”，“高摆”是燕菜全席上特有的装饰品，江米面做的，一尺来高、碗口粗的圆柱形，摆在四个大银盘中。圆柱形的表面和银盘里都密密麻麻地镶满各种细干果（莲子仁、瓜子仁、核桃仁等），而且要选择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干果镶出绚丽多彩精巧细致的花致图案，在圆柱形的正面还要镶出一个字，四个高摆上的四个字联起来是这酒筵的祝词，比如：过生日就是“寿比南山”，结婚就是：“福寿鸳鸯”之类。

用干果镶高摆极费功，象绣花一样，四个高摆需要十二名老厨师用四十八小时才能制成。

这种酒席还要用特制的“高摆餐具”，瓷的、银的、锡的、各种质料的都有，都是整套定做的，如果损坏一样，无法买到配齐，每次使用时，都要安排可靠的人专门照管餐具。餐具的形状很特别，比如盛菜的盆，碟有四方的，元宝形的，云

彩形的……。要根据府菜的特点设计。有一道菜叫“带子上朝”，是一只鸭子携着一只鸽子，菜盆的形状就恰好是这鸭子和鸽子连在一起的外形。“金银鱼”，是并列的两条鱼，一黄一白，餐具也就是两条鱼的形状，半边黄，半边白。每个人面前的小分碟也有不同形状，瓜形、八卦形的等等，各有各的用途。

餐具中还有一套是带“水池子”的，盛大件的餐具或是盛饭的小碗，下面都有个小热水池子，可使饭菜长时间不凉，每个人面前喝汤的小碗叫“口汤碗”，只适盛一口汤，周围也是水池子温着。

府菜中的“燕菜全席”酒筵，有一套完整的规格。“府菜”酒席中较普通的，称为“三大件”，即海参、鱼翅、鸭子，每件附带有四冷碟，四热碟，四饭菜，最后上甜食、点心、水果。这样每桌有菜四十道左右。

最低等的酒席是给当差的、老妈子们吃的，仆人们不能上桌子，在前上院的大院子里搭起天棚，地上铺上新炕席，仆人们席地而坐，围成圆圈，叫做“坐席”。每一“桌”席有十碗菜，这种菜的规格叫“十大碗”，据一张“十大碗”的菜单^①记载，这十碗菜有：海参、鱼肚、红肉、清鸡丝、瓦块鱼、白肉、肉饼、海米白菜、八仙汤、甜饭。

在衍圣公用的饭菜中也并不都是山珍海味，有一套“公爷饭”食谱，就六个较普通的菜，还有就是咸糊糊，煎饼，山芋，咸菜，都是山东农村老百姓常吃的，不过是细做罢了。小弟德成很爱喝糊糊，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由重庆到南京，又回到曲阜，到家就先要喝糊糊。也有极普通的菜因具有其特殊意义而用来招待贵宾，比如：豆芽菜是自乾隆年间开始成为孔府传

统菜的，据说是有一次乾隆来曲阜，用膳时他因为不饿吃得很少，在一旁侍膳的衍圣公很着急，传话叫厨房想办法，厨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珍贵名菜他都不感兴趣怎么办，顺手抓了把豆芽，放几粒花椒炒炒送上来，乾隆没见过花椒问衍圣公这是什么，衍圣公回答是花椒，是提味的，乾隆夹起豆芽菜尝了尝称赞说：味道果然不错，这一句话使孔府如获恩典，从此炒豆芽成为孔府的传统菜。在孔府众多的“户人”中还专设了“择豆芽户”，世世代代专为孔府择豆芽。我小的时候，庄上还要往孔府交春芽（豆芽）。不过这炒豆芽菜后来有所发展，酒筵上的“丁香豆腐”就是。将豆芽的豆瓣去掉，只留嫩芽，将豆腐炒后切成极小的三丁形，炒熟后，一根豆芽和一个小三丁豆腐配在一起正是一朵丁香花，上菜后主人总要先配给客人们看看。孔府的野菜经特别加工后，是酒席上的珍品，也要进贡皇帝。我们也常吃野菜，用野菜做馅，主要是后花园的荠菜和金针。还有孔林中的野生山芋——林芋，也向皇宫进贡。

孔府里最粗的菜要算冬天用大缸腌咸菜了，每年冬天都要腌制几间屋子的咸菜。我记得内宅垂花门旁边两间屋里密密麻麻排满大缸，里面都是又黄又大的醉螃蟹，也腌白菜、萝卜。白菜要去掉外面和中间的菜帮，只留菜心和周围几片嫩帮。腌法是将根部切开口，将特制的调料一个一个地塞进口内，缸上用大石压紧，数周后即成，叫做“珊瑚白菜”。萝卜则是在整个萝卜周围密密地削成一层一层的，放入大缸内，以糖醋浸泡，叫做“簑衣萝卜”。冬天腌制的咸菜，我们吃的并不多，仆人们常常带回家中。

听说我父亲生前除了喜爱珍饈美味，还爱吃“渣菜”（别人吃剩的各种菜混在一起），说是有股酸味，好吃。曲阜城里

有两家“大户”，孙家和蒋家，前清年间当过道台之类的官，我父亲常和他们来往，每逢他们家里有喜庆寿筵，我父亲就派当差拿着盆去要“渣菜”，人家不好意思真的给“渣菜”，现给做些菜混在一起烩烩，设法做得象一些，否则我父亲不爱吃。

祭灶前，厨房就已经准备过年大忙起来了。孔府的厨房分内厨房、外厨房、小厨房。内厨房给内宅做饭；外厨房给内宅外的师爷、管家、帐房等人做饭；小厨房只给陶氏一人做饭。夏天，我们常在后花园凉亭吃饭，那里再临时设个厨房。内外厨房平时分为三班，每班每月干十天。到过年或祭祀时，三班都来而且要连夜干。平时则每月除了干十天，其余二十天都可以在家待着。

孔府的厨房分工极细，做点心的、蒸包子的、做咸菜的、发豆芽的……都各有专职，而且都是世代相传，几代甚至几十代在孔府厨房从事单一劳动。厨师赵玉滢现在已七十多岁了，一九七九年我回曲阜时，他还健在。他祖上十多代都在孔府厨房做菜。我记得那时三班厨房的头是葛文焕、张兆增、张根官，三班厨房互相竞争，哪班菜好摆酒席时就让哪班做，而且有重赏。有个厨师叫王玉怀，我父亲爱吃他做的菜赏过他不少金元宝。他的手艺很好，也会做点心。孔府自制的糕点也很有特色，其色、香、味、形远非当时北京市面出售的名点所能及。而且孔府的糕点讲究现吃现烤，象刚做出的饭菜一样，趁热吃，其味更美。孔府的点心也常向皇宫进贡。有一次陶氏吃他做的点心，看到大小不均，就把他叫来责问。他说：“我虽然用手掐的面剂儿，但分量很准，请公太太过秤，如有差误，甘愿认罚。”当时陶氏就命人拿秤来秤，果然分量一点不差。

厨房不做馒头，孔府东学有个酒坊，专做祭孔用的黄酒和馒头，内宅每天派人去取，遇有红白事时要取很多放在内宅的西厢房存着。

我小的时候，孔府经济已经衰败，我平时也不大吃那些珍饈，但每顿还是有七、八个菜，我们姐弟三人和陶氏一起吃午饭和晚饭。吃饭时好几个老妈子在旁边侍候，有上菜的，有盛饭的，有听使唤的，还有去厨房取菜的，等等。内厨房虽在内宅里面，离我们居住的前堂楼也有好几道门之隔，还要穿过一段走廊，几个院子，所以饭菜都是半凉的。冬天为了吃些热的，就常加一只火锅。我们四个人，一个妇女和三个孩子饭量都很小，每顿菜、饭都要剩下大半，就由老妈子们轮流拿回家去。她们也象值日一样排好了班，该轮到谁拿，记的都很清楚。

7. 传 说

我从很小的时候，大约三、四岁吧，老年人就开始给我讲关于孔子和我的祖先的故事。我没有读过任何儿童读物，也没有听过任何别的故事，而我所听到的这许多有关我的祖先们的故事，每一个都带有神秘的迷信的色彩。在我印象中，孔子好象是介于人和神之间，是个半人半神，或者说是神仙下凡。

传说孔子的母亲颜征在生孔子以前，曾到尼山去祈祷，盼望生个儿子，回家以后在院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麒麟，嘴里吐出了玉帛，上面写着：天上的星宿下凡，将来要振兴周朝。还说孔子出生的时候，天上传来奏乐声，同时有五个仙翁从云彩中冉冉下降，其中一个说道：“天生圣人，天降音乐”。

说孔子是天上的星宿，指的是魁星，据《孝经》上记载：魁星主文。所以魁星被看做天上的文官之首。孔子就是魁星下凡。孔庙里孔子的藏书楼，取名“魁文阁”。

孔子既是神仙下凡，当然就可以预知未来，在曲阜流传着一个有关秦始皇的故事：

孔子晚年，他的儿子和弟子为他建造坟墓，造好后请他去看，他很满意，但子路说：“坟墓很大，象座山，周围又有这么多的树，还应再挑一条河才好”。孔子说：“不要忙，自有秦人来挑河”。

后来到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有人对秦始皇说：“要想让儒学消亡，应当先破坏孔子坟墓的风水，孔林里没有河，如果在孔子墓前挑一道河，将他和故宅阙里用河隔开，孔子也就不能显圣了”。秦始皇采纳了这个意见，征派徭役，在孔林里挑了洙水河，正好为孔子效劳，完成了孔子墓的最后一项工程。

其实孔子本人是不讲迷信的，他说“五十而知天命”，活了五十岁，才认识世界，可见并没有预知的本领，而是在学习中掌握事物的规律。

孔府里有七座楼摆成北斗七星的形状，所以孔府的建筑特点之一是“明七星”，据说孔府和天上的北斗星也是相接，每年八月初四这天，衍圣公还要祭一次北斗，叫“接北斗”，以示孔府与天上的联系不断，这样才可以使孔府如大门上的对联所写“同天并老”。

“接北斗”很有意思，与祭孔那盛大隆重的场面相比，恰好相反，是极神秘地进行，这种祭拜不仅外人不能参加，就是孔府里也只有个别的人知道。

在内宅前堂楼的墙上有个玻璃罩子，里面放着一只小表，小表里放着一团线，八月初四这天，当北斗星升起的时候，由衍圣公和一个替他接线的人去接北斗。两人悄悄地将这线团拿出来，到佛堂楼烧香摆供，供品很简单，七星灯（将七盏油灯摆成北斗形），五碗供，一股香。摆完供就叫看佛堂楼的人出去。屋里只有他们俩人，先由衍圣公磕头，然后接线的人再磕头，磕完头把这团线拿出来，这团线是好几根不同颜色的断线，黄、白、黑、绿、红，这是有讲究的，黄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接线的人将这几段线依次接上线头，这就算孔府和天上的北斗星接通了。小弟德成祭北斗时，是由刘梦瀛接线，刘在病危临终的时候，才将此事告诉他的儿子刘三元，要刘三元继续为德成去接北斗，这以前他的儿子一直是不知道的，因为，人间和天上的联系是不能随便说的。

孔府大门两边的金字对联，上联：“与国威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其中的“富”字没有上面一点，写成“冨”，我问过老师为什么这样写，回答说这是孔府独用的字，孔府千年不衰，富贵是没有头的，所以写“冨”字也不能有头，否则就象皇帝之家那样只是一朝一代的贵族。孔府的人写“冨”字也不点上面的一点，但我们很不理会这些，老师也不大要求，可能因为那时孔府已经衰败，现实已不好解释了。

明朝的时候，有两个很有名的算命先生，一个叫元天刚，一个叫李春风。孔府曾请他俩给孔府的后世各代子孙算过命，据说他俩背对背地坐着，将后世各代子孙的命运遭遇都用一张张图表示出来，然后两人将这些无数张图混淆在一起，合成一张大图，叫推背图，我看过这张图，那上面真是包罗万象，日月星辰，山川树木，飞禽走兽，日常用具，什么都有，极其杂

乱地混在一起，谁也看不懂。其中有一只小猴拿着一只桃子，别人告诉我这就是第七十七代，小弟属猴的，父亲去世，只有母亲陶（桃）氏。我那时就有个想法，这推背图上要什么有什么，不管哪一代都可以找出适合自己解释的图形来，元天刚、李春风可真够聪明的了。

有的故事，特别使我感动而难忘。

如孔庙诗礼堂的后面，有一堵断墙，三米多高，十五米多长，孤零零地立在院子里，这就是有名的“鲁壁”。

相传在战国末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焚书坑儒，反对孔子。当时孔子的第九代孙孔鲋，有个好朋友叫陈余，有一天，陈余给孔鲋送来消息，说秦始皇快到山东来了，孔鲋有许多祖传书籍，自己又是孔子后代，十分危险，要他赶快想办法。孔鲋得知后，就连夜和他的弟子襄把《论语》、《尚书》、《孝经》等藏在祖堂的夹皮墙里。他自己也离开了家乡，隐居在嵩山教书去了。后来陈胜、吴广揭竿而起，起兵反秦。孔鲋是个博学多才，有政治见解的人，经陈余推荐，参加了陈胜的起义军，陈胜很高兴，非常尊重他，尊他为博士、太傅，他在陈胜的队伍里过了六年，病死在兵营中。

到了鲁恭王时，要扩大宫殿，准备拆除祖堂，拆到这面墙时，忽然听到里面有丝竹之声，拆开墙，发现了许多书。书是写在竹片上，用丝绳穿起来的，拆墙时因互相碰撞发出了响声。当时祖堂已经拆除，就独将这面墙保留下来。这样，被秦始皇几乎烧尽，抄绝的诗书、六经等才得以流传至今。

孔府的书是被认为有灵性的。

如孔府的东学有一座御书楼，专门存放历代皇宫赐的经书诗文。我小的时候，那楼里就“闹仙”，说是那些书变成了

一个年轻女子，象天仙一样好看，穿着木底小鞋，每天夜里走动，孔府里有好多人听见“咯噔、咯噔”的楼板响，也有人看见过她，只一闪就不见了。据说不熟读经书的人是看不见她的。孔府里的人都管她叫“御书楼上的小媳妇”，我问过别人，为什么书要变成小媳妇，不变成老头子。别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嘛！”我从小看戏就爱看小媳妇，所以非常想看看她；为了这个愿望，我就拚命念书——自然始终也没有见过。

孔府里也有老头子模样的神仙，西学后面有座厅堂叫“安怀堂”，又叫“九套间”，那时候，这里是无人住的空房，从外面看和别的厅堂差不多，雕梁画栋，榻扇门窗，但是里面却不一样，看不到天花板和四壁，里面搭满了紫檀木剔空雕刻的葡萄架，这许多葡萄架将厅堂隔成不规则的九间，厅堂前面是幽静的院落，花木扶疏，古树参天，树下有黄瓷坐鼓和小石桌。据说每到有月亮的夏夜，就从九套间里出来一个白胡子老头——那是住在这里的神仙，他独自坐在坐鼓上饮酒，传说有个老年当差的，还亲自见过这个月下饮酒的神仙哩！

孔府是千年老府，几百间房子长年无人进去过，有的一锁就是百十年，几乎每间都闹“仙”，都有一个有关神鬼的传说。

比如：哪间屋里有人上吊自杀，死后长期“闹鬼”；哪间屋的门匾上藏着条大蛇已经修行成仙，等等。就是那些普通的厢房没有什么神鬼故事，每当我从厢房前面的长廊走过，看着无数间厢房紧锁着，里面列满了书架，上面都是厚厚的一层灰尘，我就觉得好象那些书也都成了“精”。

传说，孔府里所有的精灵鬼怪，都归九套间那个白胡子神仙管着，由他保佑着孔府平安，所以每年除夕的夜晚，衍圣公

要独自到九套间来祭拜这位神仙，只带一个当差的提灯笼拿供品，到九套间摆好供后，当差的出去，在门口等着，衍圣公自己在九套间里向正北方叩头行礼。我父亲每年拜九套间时都是刘梦瀛跟着。

有的楼堂虽无鬼怪，也很特别，充满神秘气氛，比如有座“避难楼”，形状极象个高高的水塔，四围都是青砖砌成，没有窗户，可能那建筑材料里有些什么特别的东西吧，不怕火烧，炮轰，当初盖的时候是准备在孔府遇到灾难时，衍圣公可以暂时进去躲避；但盖好后从没有用过，那楼下的小门上的大铁锁长满了锈。听人说楼里有口古井，井深无底，是天助人意出现的。井上有块木板，是个“机关”，不知底细的人进来，踩着木板就被翻到井里去。那井到底有没有底，谁也不知道。

楼的附近，很少有人去，每到深夜只有猫头鹰在里面发出怪叫，有时，半夜醒来，听见后花园里“梆、梆”的打更声和远处避难楼里猫头鹰的怪叫，心里想着九套间前面月光下那白胡子老头不知喝完酒没有？闹鬼的屋里不知正闹成什么样子？门匾上的大蛇可能正缓缓地爬下来，御书楼的小媳妇“咯噔、咯噔”地走着……想到这些就很久不能入睡。每天傍晚掌灯的时候，当差的高喊着：“关门啦！”关上了内宅的垂花门，把内宅大门连同大门旁排列的金瓜钺斧朝天镫都关在外面的时候，我总是产生一种安全、清静的感觉。

每天黄昏，天空中就出现一群群乌鸦从远处飞来，噪鸣着、黑压压地落满古树枝头，第二天一早就飞走了。人们都说，这是孔子的三千乌鸦兵。相传孔子当年周游列国以后，回到家乡从事教学，常带着他的弟子到城外去游玩，孔子很爱去尼山，尼山的“坤灵洞”（“夫子洞”）是他出生的地方，他

常和弟子站在坤灵洞的顶上，俯视山下的辽河，看河水不停地流淌着，有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就是孔子站在尼山上看辽河时发出的感慨。

因为孔子常去城外，有时遇见兵匪要来伤害他，这时天空中就飞来一群乌鸦，保护着孔子，使兵匪不得接近，孔子每天早出晚归，这些乌鸦也在早上开城门时飞走，傍晚关城门时归来。在老百姓中有一种迷信说法，认为乌鸦是不祥之物，可是在孔府却受到欢迎，认为三千乌鸦兵是来给孔府壮威的，从没有人伤害它们。我们小时写的诗里还常常提到乌鸦。

天上的飞鸟有灵性，地上的小草也有灵性，孔林里有一种野草叫蓍草，开白色小花，笔直的茎，用六经里的易经算命时就要用蓍草，过去有个讲究：有蓍草的算命先生，算的最灵，许多远地的算命先生，都千方百计托人弄到孔林的蓍草。据说哪个算命先生面前放着一把蓍草，就表示他是真心懂得算命的，顾客也就比较多。来孔林参观的人临走时常常带些蓍草。我们小的时候，也常常拿蓍草算命玩。

除了蓍草，孔林里还遍地长着灵芝，而孔林以外却一点不长。我小的时候，每次去孔林，看到别的坟上都长着青草，唯独孔子坟上没有，不知道是不是看林的人特别精心管理的原故，但老年人告诉我说这些情况都证明老祖宗孔子死后有灵，在“显圣”。

孔林里还有一种野生山芋，叫林芋。和人工种植的山芋差不多，较细长，含淀粉很多，也很甜，可以充当粮食，老百姓都可以来挖取，人们又说这是祖先的“恩德”。我们也吃，还向皇宫进贡。

孔府里的物件更被说的神奇，有的我见过，有的我没有见

过，听说从前大成殿里，孔子像前的龙柱上，龙嘴里镶着颗大珍珠，那珍珠一到夜里就发光，照得大成殿通明，那是“夜明珠”，是个“国宝”。全国就这么一颗，不放在皇宫里，而放在孔子像前边了。后来这“夜明珠”在清朝的时候被人偷走了，一直到我长大以后，还常常怀着惋惜的心情想到这颗“夜明珠”。

不仅孔府、孔林和孔庙，据说就连曲阜县城也是个神奇的地方。早先这里是一大片树林，叫赵家林，在孔子出生后，一夜之间就出现了曲阜城。我小的时候所听到的故事都是围绕我的祖先的，此外没有听过别的；我的女儿小的时候，我向她讲的故事也都是围绕着我的祖先的，别的什么我也讲不出来。

7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四、动乱时期

1. 穷

二十年代初到三十年代末孔府在经济方面是只出不进，一大特点——穷。

民国成立后，随着封建帝制崩溃，断了皇宫的恩赏和年俸，取消了卖官制，因此毫无现金收入，只靠田庄上的粮食租子，而地租又几乎收不上来。

我这样说并不夸张，孔府穷的程度，简直难以令人相信，帐房里经常分文没有，有时来个客人需要到外面打二两酒都拿不出钱来，要打酒去的当差的自己先垫上。

收不上地租的原因很多，天灾、战事、反孔运动的影响，管事人员贪污克扣，土地管理混乱等等。

孔府的土地分布在五个省三十多个县，属于御封祀田；其田亩数，每次改朝换代多有变动；地租方面的规定也很杂乱，佃户又分成好几种〔有钦拨佃户（实在户），是赐祀田时带过来的；投充佃户，赐田后才种上的地，其减免徭役不如实在户；寄生佃户，如同一般农民一样，不负担孔府徭役但加重地租〕。按规定，孔府不能出卖土地，佃户要种孔府的地需交两元领一张帖子；但到民国以后，已相当混乱，孔府管理土地的机构管勾厅，从管勾官到下面的总甲和村里的小甲都有私自盗卖土地

的；佃户也有私自转让土地的；大量土地丢失，到后来，管勾厅掌管的“红册”（记载祀田的帐本）与实际土地情况相差悬殊；有些地的所属权都发生争议。这种土地方面的混乱也不是民国以后才出现的问题，而是历史上遗留下来到民国后有所发展罢了。光绪年间巡抚张耀曾写过奏折，说江苏铜山、沛县一带有大量涸田应属孔府，请朝廷查明拨补，后来朝廷派张之洞去查，也没查清楚，结案是：“原丢失祀田无从查找，从铜、沛一带拨补一百四十二顷，每年由徐州道发租钱二千八百八十吊”，这种由徐州道统一发给孔府的租钱，到民国三年就停发了。民国十五年，山东省长也曾写信给财政厅要求将黄土岗地，圣府遗失祀田四百多顷交还，因时局动乱，档案散失，也无收回。一九三四年蒋介石曾派贾慕夷成立中央的“整理祀田委员会”，要整理清楚到底有哪些土地是祀田，结果整理了三年也没整理清。后因抗日战争爆发就中断了。

蔡元培、蒋梦麟还曾上书蒋介石，要求取消全部祀田；后来因孔祥熙从中阻碍而未能实现，但在社会上影响是相当大的。不仅河南、安徽等较远的省份收不上来租子，后来发展到曲阜周围泗水一带地租也收不上来，许多庄子七、八年不交租。其中有很多是佃户交了，但被管勾厅人员克扣贪污而向孔府虚报未交。我记得管勾厅有个管勾官叫商善道，巨野人，身材魁梧，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但后来被许多族人联名告到孔祥熙那里，说是他欺压佃户，欺骗孔府，灾年租子不减过了限期不交，还要额外多收，勒索严重，民愤很大；而这些租子又全部进他腰包，后来此人被撤职。但此后我又听内宅里的人们议论说，告他的人也和他同样情况，是因为“狗咬狗”，才告发他的。

过去募捐也是孔府一笔主要的收入，许多事情要靠捐钱来办。我父亲生前，有一个香港商人叫郭贞祥，捐助了四万银元，修的尼山圣庙。修孔庙的寝殿是张宗昌捐的两万银元；修林庙是安徽寿县孙多猷捐的款。还有多次小额捐款。以前这些钱都直接交给孔府来开销；民国后，一九三一年阎冯战事攻打曲阜，孔府及林庙都遭严重毁坏，战事结束后，发起全国大募捐，重修圣地。这些钱都由韩复榘收着，绝大部分归他个人所有，他从济南临撤走时，将捐款装在木箱子里，上面贴上“药品”的标签，用专列火车运走。

孔府尽管毫无收入，开支却不能减少，数百名差人一个不减，祭祀照旧，还有孔府所办的私立明德中学，是在中央教育部备案，经费由孔府负担。那时明德中学的教职员工经常三、四个月发不了薪水。曲阜城外的董庄有个小学校，为修村里的文庙到孔府来募捐，孔府碍于自己的地位只好认了五十元，这已经是很寒碜了，可是也拿不出。董庄小学多次催索，孔府回信：“……敝处所认捐款五十元，本应早日寄奉，只因经济困难，望稍迟容缓……”，结果无限期缓下去，一直没拿出来。

那时候，孔府里解决经济的唯一办法就是借钱，上至孔祥熙、张宗昌、韩复榘，下至府里的当差的，都借。办大事要借，办小事，如：买个油灯的灯罩，打二两酒也要借。凡是稍接近内宅的当差，差不多都给孔府借过帐，象陈景荣、赵玉坤、赵安坤、刘梦瀛等，主要当差的，更是经常地借。孔府有极少数的私田（和民间地主的土地一样），原是准备给衍圣公兄弟分家时往外分的，南门、北门、西门外、泗水、大庄、南关、汶上等处都有，各处均几十亩，这些私田已全部抵押出去。

在这样一个又穷又大的府第里，日子最难过的就是孔令灿

（印秋）。自从我的父亲去世后，请我的堂伯父孔令誉（式如）来主持府务，我十一岁那年，堂伯父去世，又请本家孔令灿（印秋）来主持，我们叫他三爷。他要千方百计到处借钱，每到年关更不得了，孔府有句俗话：“立了朝天竿，要帐的把脸翻”。每到腊月二十八立了朝天竿后，要帐的就整天堵住孔府大门以至内宅门，只有三爷孔印秋出来搪塞。实在搪塞不过去，只好再设法借新帐还旧帐。他在给亲友信中提到逼帐之苦。有一封信中说：“借毛务斋三千元，明月亭三百元，本利皆索，月来无日不在索讨中”。陶氏在给陶三舅信中谈到为大姐德齐筹备嫁妆时也说：“办嫁妆需三千元，日夜焦虑”。其实和过去相比，这三千元嫁妆已相当微薄了。一九三三年给冯恕信“……今岁春租，催交不利收入顿减，而寻常日用已感困难，值此年关，一切开销更穷于应付……”那时期孔府和亲友们来往时总是诉穷。

我们在内宅每当听说有债主登门要债时，老妈妈们总要发一通感慨。用她们亲身经历说明孔府过去和现在如何不同。她们说我祖母在世的时候，孔府有时也没钱，要拿些珠宝出去抵押，我祖母总是叫当差的从库房把箱子抬到内宅，然后在半夜，叫她们几个知己的老妈子，把箱子里的珠宝拿出来，箱子里换上砖头再锁上贴上封条，谁也没发现箱子里分量减轻。总是悄悄地拿东西去押钱，赎回来了再把砖头换下来。没有现在这样公开地把土地押出去，更没有要帐的找上门来。说到从前人们如何尊敬孔府时，老妈妈们常爱提起这么一件事：

民国初年，我祖母彭夫人还在世，有一次府里没钱，向山东省借银元，派小车队去运，还选精通武艺的彪形大汉当保镖，都推着独轮车，背着大刀，那时山东正闹“响马”（土

匪)，运银元的车队返回途中遇上一伙有名的山东大盗，经过一番搏斗，银子全部被抢走，派出去的人狼狈而归。银钱被抢对孔府真是晴天霹雳，正当一筹莫展时，有一天，曲阜城里忽然来了一队山东大汉，每人推辆独轮车，车上装满银元，停在了孔府大门口，原来他们就是抢银子的那伙山东大盗。他们把银子抢走后，一打听是孔府的钱，他们说：不能抢圣人家的钱，就又原封不动将银子送来。这伙大盗来到孔府大门前，府里的人都非常害怕，谁也不敢出来，他们也不进大门，就长时间停在大街上，老百姓听说大盗给孔府送回银子来了，觉得十分稀罕，几乎全城的人都来看，孔府大门前挤得水泄不通。

但是在我小的时候，孔府随着经济上的衰败，社会地位也一落千丈了。清朝时，县长要由衍圣公任命，县长审案要按衍圣公送来的帖子所写的意见办事，县长进孔府有事，不许进二门，要在外面等候，孔府办丧事，县太爷应该来把大门口，我小时候，这些都早已不存在了。有个县长叫宋文川，他常来内宅玩，当然也谈不上什么贵宾，陪着德成写写字，说说笑话。后来他不当县长了，也还常来。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和德成在南京居住，宋文川由曲阜到南京，也没职业，成了我们那里的食客。

现在再接着说抗日战争前孔府的情况，那时候，孔府这个“天下第一家”，在地方政权中已有意或无意地不大被看重了。比如曲阜戈山场的玉皇关帝庙，东关观音娘娘庙，大庄的玄帝庙都是孔府的香火院，北洋军阀时期和蒋介石时期，当地县政府都不经孔府允许，擅自拆庙取砖，起石挖坑，有一个县教育局局长竟吞占了曲阜城外孔府祀田三百亩，庙田二十多亩。孔府的轿车在外面，也有路上被当地驻军七十二师的人强

行拉走使用，孔府不得不派人到七十二师副官处索取。那时候兵痞也多，更无什么尊孔观念，竟有夜晚从后墙跳进花园里来偷东西的。我们都十分紧张，天一黑就不敢出内宅门。孔府也为这类事，以小弟德成的名义常找七十二师交涉。

孔府如此之穷，但比起附近的颜府（颜回后裔的府第）还是好多了。颜府是书呆子，家底又薄，他们自己吃饭都要向别人去借麦子。孔府里自己吃的粮食还是有的，而且每逢过生日什么的也多少请请客，当然是无法和过去相比了，我祖母和我父亲在世时过生日要摆几百桌酒席，我堂伯母（陶氏死后请她来照料内宅，也算是孔府的女主人了）过生日只请了几位本家太太。我当时的日记曾这样记载：“……为伯母祝寿请大婶四婶七婶九婶十婶十一婶，余同大姐小弟均在座”。那时庆寿也就是如此规模了。

陶氏未去世时曾决定在孔林伐树出售，那些千年古树都非常珍贵，结果伐倒许多，但卖不出去，堆在孔林的二门里，既毁了林木，又有碍观瞻。还有一段时间，我总听陶氏和人议论打算卖北平圣公府的房子，但始终没卖成，听说族里有人反对，提出不能动圣祖的产业。

孔府的穷还有个特点，俗话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孔府这样一个千年不衰的大贵族之家，金银珍宝无数，再穷也不是一贫如洗。我听说多年后有一次打扫后堂楼，因那楼长年无人进去，里面住满了野鸽子，地上满是鸽子粪，打扫时，鸽子粪里好多金子，珍珠，都是以前散落地上被埋在粪里的，但在没钱买灯罩或打二两酒的时候，谁也没想过要去扫扫地搜集这些东西来解决问题。至于那些古玩珍宝更是不能任意变动的。

2. “子见南子”的风波

孔府大门的对面,是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简称“二师”现在改为曲阜师范学校)。早在“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时,二师即受进步思想影响闹过学潮,组织学生示威游行,下乡宣传,包围校长孔祥桐,大闹校长室,致使孔祥桐被迫辞职。一九二二年共产党的负责人王尽美派人来二师开展工作,后来又派张观成、杨荫鸿二同志与其他同志一起建立了二师最早的党组织,当时曲阜县还没有建立党组织,所以二师党支部成了曲阜县党的领导核心。

一九二八年党组织被破坏,在师生中进行了大清查和大搜捕,抓去共产党员六人。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暂设二师,形势急骤逆转。但由于党在学生中工作基础好,学生们仍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迫使国民革命军山东战地党政委员会释放被捕学生。此时宋还吾来到二师任校长,宋是左倾国民党员、北大毕业生。自称是鲁迅的学生,极尊崇鲁迅,来校后即支持学生进步活动,重建被解散的学生会,并组织俱乐部及学生剧社,开展演剧活动,教师楚图南也在学校公开讲授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使学生运动又出现蓬勃开展的新局面,学生又掀起“打倒孔家店”的新高潮,编印小册子声讨孔府,提出“打倒孔陶氏”,“打倒孔家店”,“打倒土豪劣绅”、“解放百户”的口号。学生组织了许多庙户、佃户上街游行,在孔府门前示威,高呼口号,孔府的高墙上大街小巷贴满标语,孔林的树上都用粉笔写满口号。有些孔氏族人也卷入反孔运动中,一起游行示威,主要是青年学生。还有姓孔的青年,为表示反孔决心,改

别的姓，有个孔少华，当时就改为高少华。其中也有的人后来又改回去了，仍姓孔。

在反孔浪潮席卷曲阜的日子里，孔府大门终日紧闭。我们生活在深宫般的内宅。我那时才十来岁，并不理解形势的严重，每日仍旧照常读书游戏，只是看到陶氏总是焦急不安的样子，族长孔传靖、孔教会长孔传璞，几乎每日来找陶氏，本家中许多长辈也出出入入，来找陶氏说外面情况，在前上房议事。我们也常去前上房玩，对于他们所谈的事不感兴趣，也不大懂，只记得最初陶氏老是派当差的到外面去擦掉粉笔写在墙上的口号，撕毁红绿纸标语，后来因为擦不胜擦，总擦不尽，也就不吩咐人去擦了。对于陶氏每天这样忙碌，我们却很高兴，因为她没有心思过问我们，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追跑嬉戏，也不必再防备她来训斥我们“不安稳”了。

后来听说学生们演戏了，戏名是《子见南子》原作者是林语堂，此剧曾在《奔流》杂志发表。二师学生演出时加以改编，孔子形象已和原剧完全不同。我们都吵着要看戏，尤其听说这次演戏有女学生演出，更是感到新鲜。过去都是男扮女装，从未看过女演员演出，但我们一提看戏，陶氏即一脸愁苦相。许多当差的都看过戏了，我们悄悄向当差的打听，他们只说是演孔子，再问就摇头不再说了。这更引起我们的好奇心，很想看看先祖在台上是怎样活动的。后来戏越演越热闹，听说二师给周翰博、颜翰博府里都发了票，每天演出数场，座无虚席，掌声不绝。后来我们终于也看到了，记得是在双十节后的一天，家家门上挂的红灯还没摘。陶氏带我们姐弟到看台上去看戏，看台搭在孔府东学临街的土堆上。那土堆很高，站在上面可以看到墙外，戏台就搭在对面街上。我们坐在里面，看台挂着堂帘，

外面的人看不到我们。现在回忆起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孔子出场时吓了我一跳，那样子和大成殿里孔子塑像截然不同，头上也戴冕旒，身穿大袍子，但抹着满脸锅灰，猥猥琐琐。有个大美人坐在佛龛上，珠佩叮咣、光彩夺目，别人告诉我“她叫南子”。我还记得南子给了孔子一块绿玉，那是一块绿肥皂，我看的很清楚，当时我还嚷了起来。戏台上还有子路，和我平时所见画像也不相同，穿着大红袍子，红脸膛。我还记得孔子以手指天向子路高喊：“天厌之、天厌之”看戏时台下夹杂着观众的掌声和“打倒孔家店”“打倒孔陶氏”的口号声。我坐在陶氏身边，她一直不说话，我感觉到她浑身发抖，偶一回头，看到她脸色铁青。她那神情我至今不忘。

散戏后陶氏一句话也没说，领我们下了土堆，回到内宅，刚到前堂楼，还没坐稳，当差的来禀报：三老爷去世了。三老爷是我们本家爷爷孔印秋，自从我堂伯父孔令誉去世后，由他接替任孔府总管，处理孔府一切对外事务。在反孔运动中都是由他出头应付外面许多事情。前不久他因病卧床不能走动，但每天还可以过问府务，现在突然去世对陶氏又是一个打击，真是内外交困，当陶氏听到这个消息，立即瘫在床上，从此瘫痪不起，半身不遂数年直至去世。

孔印秋去世，陶氏瘫痪，二师的反孔运动方兴未艾。《子见南子》剧每天上演，这时孔教会会长孔传璞、孔氏族长孔传堉联合了二、三十个“四十员”里的人，给中央教育部写呈文，联名上告二师学校及演剧的学生。听说孔祥熙很支持告状，在中央为孔府说话，蒋介石还当面训斥了何思源，要他“严究”此案。

后来我听人们谈起此事说，蒋介石实际也想趁此机会排挤山东地方力量，使蒋的嫡系势力控制山东。何思源也看出这

点，所以不肯积极办理此案，同时中央方面也有人支持反孔力量，蒋梦麟、蔡元培就曾上书蒋介石要求取消孔府祀田，后因孔祥熙从中阻拦未能实现。孔传璞等在中央告状迟迟不能结案，又希望在地方得以解决，于是又到县政府告状，县政府决定开庭受理。没料到开庭时却出现了滑稽场面，原告这边是孔传璞、孔传堉等十几个六、七十岁的老头，被告那边却来了十几个十来岁的小孩，原来二师的学生没有到场，派一些小學生来了，这些小孩自称是演员，老头告小孩，审问无法进行，孔传璞当场气得不能动弹被抬了出去，不久即病死。

县政府对这场官司的处理是由学生家长出面，登报向原告道歉。

后来校长宋还吾被调走，听说还开除了两个学生。

鲁迅先生曾将“子见南子”案的许多有关材料在《语丝》上发表过。

至于那两位主要演员——扮演孔子的仇森林和扮演南子的陈箴泗，我听族里长辈也说起过，说他们在学校处境很困难，那位女学生陈箴泗被迫停学，投奔革命，后来被国民党逮捕，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事隔几十年，今天重新回想起来，我觉得“子见南子”案以及当时声势浩大的反孔运动，与正确评价孔子，是不同性质的两件事，两千多年来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孔子的学说不断加以改造，以适应其维持统治的需要，孔子已被变成封建礼教统治那一套的具体象征。“打倒孔家店”是反封建的口号，而孔子本人做为一个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在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中所建树的功勋，是不容抹杀的，几千年的历史已证明了这一点。

3. 阎冯战事

一九二九年二月陶氏去世，六月发生了阎冯倒蒋事件，曲阜发生了战事。

我们当时都是十来岁的孩子，又长年生活在孔府内宅，对外面形势毫无所知，战事发生前，一点没有预感到会有什么危险降临。

那天，我和小弟正在前堂楼院子里玩耍，忽然听到远处有炮声，越来越近，越来越猛，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老妈妈们急忙将我们拉进屋里。外边许多人喊：“打仗了，打仗了！”家里的人跑来跑去，搭桌椅、抱棉被，乱作一团。人们把我塞到一张大方桌下面，把小弟塞到木板楼梯下面的三角空隙处，桌面上和楼板上迭起很高的棉被，一再叮嘱我们不许出来，这时院里弹片横飞，不断打在墙上，墙很厚，打不穿；我们蹲在桌下、楼板下，听人们议论是阎锡山的军队和国民党军队打仗了。事后才知道详细经过，一个多月来阎军不断向山东进攻，国民政府派讨伐军进鲁，刚走到曲阜城东北，在春秋书院与河口处便和阎军相遇。两军展开肉搏战，蒋介石军队不敌，当晚，退回曲阜孤城自守，阎军四面包围，猛烈炮火攻城。

阎军以三个师的兵力攻城，蒋介石的一个旅长率部守城，打了十一昼夜没有打开。炮火十分猛烈，曲阜城里落满了炮弹，老百姓纷纷逃到孔府、孔庙里来避难，孔府、孔庙里住满了人，内宅里边也到处都有人。前上房停放着陶氏的灵柩，连棺材下面都有人睡。当时孔府、孔庙落的炮弹虽较外面少些，但孔庙内有十五处被严重摧毁，魁文阁的西北角被打穿，二层

飞檐也被毁坏，大成殿天花板也被打穿。外面破坏更重，颜庙有三十多处遭炮击。曲阜的东、西、北城的楼都是这次战争被破坏的。这次战事双方共死伤三千多人，躲在孔府、孔庙里的人也有被炸死炸伤的，有一发炮弹落在楼梯上，小弟就在楼梯下面，炮弹从楼梯上滚落下来，没有爆炸，还有一发炮弹落在大成殿里孔子像前也没有爆炸。事后人们又传说这是天保佑圣祖和小圣人，其实那时没有爆炸的炮弹很多，忠恕堂里落了一颗炮弹，没有爆炸，又飞出房外，红萼轩里也落了一颗炮弹没有爆炸。

我和小弟在被围困的十一昼夜里，吃、睡都在方桌和楼板下，日夜不许出来活动。这期间城里谣言四起，人心惶惶，还有的说阎军进城后要糟蹋所有姑娘，老妈妈们怕我受伤害，把我打扮成小媳妇模样，脑后大辫子改梳成发髻，也换上农妇的服装，小弟也换上了粗布衣服。

这十一昼夜的生活真是困苦不堪。孔府里人又很多，首先是没有水，平日都是用水车去南门运甜水，现在不能运水，只靠东学的一口苦水井，水苦不说，还供应不足。一口井解决不了数千人的饮水问题。许多人生了病又缺医少药，到最后粮食也快没吃的了，守城部队的弹药所剩无几，而阎军攻城炮火却更加猛烈。这时阎军派人给城上一封信，让限期开城门，否则就要施发毒气，城外又运来许多重炮，城里老百姓和孔府里的人们心急如焚。

正在危急中，蒋介石援军赶到，从东北方向抄阎军后路，阎军北逃，死伤大半。

战事结束，孔府以小弟德成的名义向国内、国外多方发出呼吁，提出历史上的一些战争事例，例如，当两军作战发现是

在圣地耶路撒冷附近时，两军都注意保护圣地；而现在阎军竟以中国圣地孔庙和孔府为炮轰目标，这在古今中外都是罕见的，并提出要求援助。蒋介石、冯玉祥、孙科等都以个人名义发来慰问电。蒋介石给德成电文如下：（民国十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子刻到）

曲阜孔德成先生及孔教总会各会员钧鉴：

此次曲阜林庙受创人民伤亡全由晋逆以猛烈之炮火围攻城垣不意自称崇圣礼让之人做此毁灭圣迹之举良可浩叹至我方将士素以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为职至现已电令到总指挥转饬各将士对于林庙一律加以保护矣总司令蒋中正。

孔德成给蒋介石电报，徐州行营蒋总司令及各方人士团体电文写道：“曲阜圣林附近发生战事，炮弹射击，飞入林内，城关逼近，庙亦震惊，危险万分，莫知所措，查耶路撒冷为耶苏基督圣地，往年欧战均划在三十里外，万国均经公认孔圣为中华文化所关，曲阜是孔圣林庙所在，先总理继承孔子屡经发为言论极端尊崇，我总司令亦曾发布告明令保护……”。

战事结束后，有好几个月，每天我们吃药治病，到底什么病，我们也不清楚，可能是惊吓之类的病吧？

战事结束后曲阜城里又纷纷传言说阎军败走，不是因为援军赶到，是因为城上出现了一名黑大汉，是天降救兵。在那科学还不发达的时候，尤其发生在曲阜不管什么事，总要编出些迷信的和与孔府有关的传说妄加解释。

4. 曲阜沦陷

德成离家赴渝，曲阜沦陷八年，这期间孔府的经济情况略有

好转。首先因为八年战争动乱，德成不在家，孔府里只有一位本家代管，来的人少了，开支应酬也大量减少。其次，在祭祀上也不那么认真隆重了，办祭祀的人员想出许多省钱的办法，这样他们自己也减少许多麻烦。比如：按规定丁祭时不算东西两庑和配殿，光是大成殿要用四十斤黄米酒，装在大铜坛子里，后来那些办祭祀的人员，顶多往里放三、五斤，其余渗凉水，供品中盛在碗里的肉只有上面几片，下面垫上菜，有的肉还用油炸面饼代替，祭祀用的猪、羊、牛、头数不变，但却换成小的。后来还常去卖肉的那里借一些来摆摆，摆完了再还回去，那时负责供品的马振海、马贵，就常去借肉；他们自己也从中得利，原规定祭祀完，这些人应分一小条祭肉。他们商议好，将买肉钱存在卖肉的那里先借肉用，存多了，他们几个人每人可分一整只羊或猪。

日军占领曲阜时期，日本政府也想收买人心，对孔府、孔庙等历史遗迹比较注意保护，也尊孔。日本军官经常到孔庙上香。行礼鞠躬后给香钱，庙里的招待人员把日本军官的姓名和给的钱数写在一块木牌子上挂在香案前，下一个日本人来上香，总希望自己给的钱数比上一个多，每到月底，木牌子上写满了献香人姓名和钱数，下个月再换块新木牌，这香钱是孔府的一笔“活钱”，可以解决不少日常零碎开支。在那个时期孔府不再借帐了，押出去的私田也赎回了一部分。

日本侵略军对孔府的态度，一方面尊孔，另一方面残酷镇压孔府里有抗日行动的人员。

日本军队刚一进曲阜城，头件事就是在孔府二堂的酒金豆绿板上贴张大布告，尊重和保护圣裔住宅，凡日本军人禁止入内。日本军队走到这里看到布告，有的人看完后向布告鞠个躬

就转身回去了，他们不进去，也不毁坏东西。德成临走时，卧室里桌上放着一盒饼干，八年以后回来，看到那盒饼干原封未动。日本军队在街上经常拉伕拉车，孔府的水车出去运水时，车前插一面圣公府的小黄旗，日本军人就不拦截了。孔府员役的家属在家门口也贴个纸条，上写“圣公府服役人员家属”，这样也比较安全些。

在沦陷区，日军经常闯人民宅抢夺奸淫，因为孔府里比较安全，日本人不轻易进来，所以十二府的本家，一些当差的家属都纷纷搬进孔府来往，有些外面的人也通过熟人关系，托人说情，搬到孔府里来，全都集中住在孔府的东学。

那时候除孔警光代理奉祀官，处理府务及对外事项，孔府里还有个招待员孔连舫，府内和当地日伪政权的具体事务都由他出头解决，此人过去即在孔府内任招待员，并在七十二师孙桐萱处供职，长袍，眼镜，样子很斯文，很善于交际。诸如：陆军墓地慰灵祭，新民会筹备会的成立，大日本宣抚班演讲活动，县公署成立，商议修城墙事宜等等都由他代表孔府参加。日军经常借孔庙魁文阁开大会，桌椅茶碗等开会用品也都是孔连舫经手操办。这个人和他家庭关系不好，他老婆经常在街上追着他吵闹，曲阜城里都传为笑柄。后来孔连舫抛下母亲和妻儿，同另一个女人私奔了，一直下落不明。抗日胜利后，他的老母由德成周济供养。

沦陷时期，日军为尊重孔教，在曲阜成立孔教讲经班，机构庞大还设有孔学的图书馆，专供查阅有关孔学资料，地址原订在孔府内，后因孔府不同意，改在文督祠。

沦陷时期，孔府的奉卫队较前有所增加，共有三百多，经常驻在府内的一百五十多人。

孔府奉卫队人数虽多、实际也是虚设，他们是日本侵略军派来保卫孔府的，而当时也只有日军有权来骚扰孔府。

沦陷时期，地下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在曲阜做了大量工作，地下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五府的——我的本家爷爷孔繁人（虚冰），他辈分虽高，年纪不大，抗日战争暴发前，在北京上大学，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抗战期间被党派回曲阜开展工作。在曲阜第二师范任教，从事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他在学生中发展了好几名地下党员，组织进步学生印发抗日传单，召集秘密集会，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那时因为十二府的本家们都集中住在孔府东学，孔繁人又在本家男女青年中做了不少工作，发展了几名地下党员，他和这几名本家中的抗日青年、地下党员，还经常化装外出，打扮成农民模样，戴大草帽，粗布蓝条的裤褂，到农村去进行工作。那时，本家中也有人看出一些苗头，谁也不说，只背后议论：“这些少爷、小姐放着福不享，专吃馊煎饼。”

后来孔繁人又找一个姓颜的学生做工作，吸收他参加抗日宣传，并准备发展他入党。那姓颜的学生表面上很积极，背后却告密了。当时形势已很紧张，孔繁人准备晚上离家出走，就在当天，来了五辆大卡车的日本兵包围了二师，从学校抓走七个人，都是姓颜的告密所致。日本兵又带着孔繁人来家里搜查，孔繁人被五花大绑，衣服已被扯撕破烂了，他趁日本兵不注意冲出去要跳井，离井两步远又被抓回，当场即遭枪托毒打；日本兵还用带钉子的大皮靴踢得他满脸血迹斑斑。当天被押赴兖州日军宪兵司令部，重刑逼供，他什么也没说，后来又押到济南，直到被枪决。我有个远房亲戚也关押在济南宪兵司令部，后来放出来了。他出来后说，他看见孔繁人最后过堂的情形。

那时已被打得不成样子了，可是问什么也不说，过堂的屋里有个小门，凡是将要被枪决的就从小门拉出去。他看见孔繁人是昂着头从小门出去的。

孔繁人牺牲时三十一岁，家中有年老的母亲、妻子、三个孩子，最大的七岁，最小的几个月，他牺牲后，他家生活更加艰难了。

解放后，那个姓颜的叛徒，才被捉拿归案。人民政府判他死刑，枪毙他的布告就贴在鼓楼门上。

五、我的小弟孔德成

1. 手足情

我们姐弟三人从很小就从老妈妈们和本家们的悄悄议论中知道了我们的亲生母亲王姨太如何善良、可怜，也知道了她是被陶氏毒死的。我们虽然和陶氏生活，但丝毫谈不上母子或母女的感情，一切都是按照礼教家规相处。我们自幼丧父，除了姐弟三人没有其他亲人，这种处境使得我们姐弟感情较一般的手足之情更深，我们从没有吵过架，也没有因为什么事哭闹过。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每年我们三人去给母亲扫墓的情景：在那望不到边际的千年古林里，我们三个小小年纪的孩子，向母亲的坟墓磕头祭拜后，长时间默默地呆在坟前。每当这时候，我心里总是感到我们姐弟格外亲近，这世界上只有我们三个是亲人。

大姐孔德齐嫁给北京冯恕的小儿子。冯恕是清朝的探花，著名的书法家。民国以后，他家又开了北京电灯公司，任过经理，冯恕的夫人冯老太太曾多次来过曲阜，那是个十分慈祥的老太太，她非常喜爱我。

原想要我嫁给她的小儿子，因为年龄相差较大，才改为和大姐订亲，并认我为干女儿。在大姐结婚那天同时认干亲，送来许多银筷、银碗之类的认亲礼。

大姐十七岁结婚，冯老太太和他的女儿冯四小姐亲自来曲阜迎亲，借住在东五府。冯四小姐后来一直和大姐很好，在大姐寂寞、冷落的婚后生活中，给了她不少的安慰。大姐结婚时，孔府跟去两个人，一个是男仆吴建文，还有一个女仆席嫂；不久，席嫂被打发回来，说是没有那么多的开支。

在大姐结婚后，孔府里只有我和小弟了。我们的年龄也渐大，更懂得了手足之情的珍贵。每天晚上睡觉时，暖阁里我对面的大姐那张床空着，我心里总很难过，白天去学屋读书，少了大姐也显得冷落多了。我和小弟的感情就更加亲密，我们不大找小伙伴们一起玩了，更多地两个人单独在一起。那时候，小弟会客的次数多起来，每当有人来拜访他，我就一个人等着他。我们也不“过家家”，跑竹马了，常在放学后到后花园或老菜园去散步。孔府的老菜园在外面与孔府隔着一条小街。我俩每次都走厨房旁边的角门，绕过一贯堂从后门出去，一个当差的也不带。那时，小弟的日记中，每天都提到我，下面是连续几天日记的摘录：

三月五日“午饭后即同二姐往东西五府、北府一贯堂拜
年，五时回家”

三月七日“四时下学同二姐往老菜园散步。”

三月八日“同二姐在书房闲读，说故事”

三月九日“余同二姐往林致祭”

三月十一日“同二姐拍球二小时又书对联六副”

三月十二日“五点下学同二姐往后园游戏”

三月十三日“同二姐在家随意写对联大仿游戏，四时往后
园散步五点回家”

三月十五日“老师出门即同二姐谈说故事，十一点命花匠运花置于案上，前为水仙，后为红梅，左置鱼瓶、右设果盘，并用鲜花四盘绕一瓜盘甚为可观。”

大姐结婚后经常从北京回来，总是独自一人，只有吴建文跟着侍候。每次来都带一些北京的小礼物，如首饰小工艺品之类，送给童年的伙伴，朱二妮、刘三元的妻子等人，也带来一些“洋”货，其实也都是些极普通的物品。但因为孔府里的生活那时仍然很守旧，所以觉得新鲜。比如：大姐从北京带来一只暖水瓶，孔府里的人便围拢来看，那时虽是五十年代了，我们却从未见过暖水瓶，觉得十分新奇，不懂得不用火却能保温的道理，整个孔府里五、六百人，就这么一只暖水瓶，真是当宝贝，我们收藏起来，轻易不用。

大姐还带来了一只橡皮的暖水袋，我们也没见过。有一次刘三元来找我们，他和我们很要好，小弟就把这只暖水袋送给他了。他拿回家以后，他父亲急坏了，以为他拿回了什么珍宝之类的稀罕物件，立逼着叫他送回来，不敢要。——如果赏给个金戒指，或者赏几斗粮食，那是认为无所谓的，但这暖水袋却不敢要。

大姐婚后第二年，独自回娘家来住了几天。当时冯老太太去世不久，她正服孝。身穿一件灰色旗袍，戴白色耳坠，脚穿黑皮鞋，神色忧郁，沉默寡言，一点没有做姑娘时那种无忧无虑的风采了。我问到她在北京的生活，她什么也没说。其实，我们心里也都明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好坏都得认命。大姐临走时，和我在后花园的草地上照了张像，至今我还保存着。这是我们姐妹俩最后的一张合影。

事后我才知道，大姐的丈夫整天在外面花天酒地，寻花问柳。他拚命地向大姐要钱，要大姐的陪嫁。有一次，他要了大姐的钱去买了辆小汽车，弄了一车女人，他亲自开车到处兜风，因为技术太差，出了车祸，撞在电线杆上，把满嘴牙都撞掉了，换了一口假牙。这些情况都是吴建文来孔府时悄悄说的，大姐为了满足他丈夫金钱上的需要，每次回家来，总要带些金子回去，怕别人知道了笑话，都交给吴建文带在身上。我们怕大姐难过，也不敢再提起她丈夫的事，又不敢当面给她拿取金银首饰，怕她不好意思，只是在她自己去取的时候，我们假装不知道。但我们心里很难过，很心疼她；而使我更深切地体会到她的苦衷的是在我结婚后，因为我的处境也完全和她相同。我是在十三岁订婚的。记得那天下午我正在园中玩沙子，老妈子传话陶氏喊我。我进到房中，陶氏笑着递给我一张二寸的小照片，上面是个小学生模样的男孩头象。陶氏说：“给你找了老婆婆家了。”我把照片一扔，跑进里间，进到暖阁里，上了床把帐子放下来。因为害羞，老半天躲在帐子里不肯出来。从此，我就算订了婚了。

我的丈夫是北京柯劭忞的小儿子柯昌汾。柯劭忞是清朝著名历史学家，清史馆馆长，是个翰林，教过溥仪读书，溥仪登基后曾任毓庆宫行走。柯劭忞和徐世昌是换帖兄弟，徐极赏识他，在徐任大总统期间，下令将柯劭忞修改的《新元史》列为中国正史第二十五史。徐世昌并将自己的一个孙女嫁给柯劭忞的一个孙子，两家结为姻亲。柯劭忞的夫人吴芝芳是清代著名散文家吴汝纶的女儿，很擅诗词。她的姐姐吴芝瑛也是博学多才，和秋瑾女侠是好友，秋瑾女侠被杀害后，就是吴芝瑛去收的尸。

柯劭忞有三个儿子，大儿柯昌泗，二儿柯昌济，都是甲骨文字学家。小儿子昌汾最受宠爱，也最不成器。

我和大姐德齐的婚姻都是陶氏订下的，都在北京，说是别的地方不好找门当户对的，但我总疑心这里还有一层别的意思——我们幼年，她带我们姐弟去过北京她娘家，她娘家的好多人更是经常来孔府，是陶氏掌管孔府大权的帮手，陶氏希望我们姐妹都嫁到北京，和她娘家来往密切，这对巩固她娘家在孔府的势力是有利的。

小弟十五岁那年，我结婚了，结婚前三天，小弟给我“过礼”（送嫁妆），在数百抬嫁妆中，头一抬就是个大楷木如意。

孔府有两件祖传的无价珍宝——两个象写字台那样大的楷木如意，上面精工雕刻着一百个小孩，相貌姿态各异，形象生动逼真，在中间是一个老头子，那是周文王，一百个小孩是他的一百个儿子。这就是“文王百子图”。

楷木如意是孔府赠送贵宾的一种特有的礼物。相传孔子死后，他最心爱的弟子子贡守墓六年。六年期满临走时，一边哭，一边将服丧用的楷木哀杖插进地里，眼泪也落进地里，那楷木竟发芽长成大树，繁殖起来。孔子后裔用楷树的木头制成如意馈赠贵宾，至于一般客人，则只送金玉之类的如意。但就是赠送贵宾的楷木如意也是很小的，我上面说的这两个大如意，孔府只有这么两个，已经传了千百年了。后来把这两个如意给我和大姐每人一个，做为我们结婚的嫁妆。孔府还有一对大金钟，镶满了钻石珍珠，也是给我们一人一个，我们的许多嫁妆都是相同的，甚至我们的命运也相同。

如意是吉祥如意的象征，幸福的象征。但我和大姐的婚姻

实在是不如意、不幸福。

我结婚，是小弟德成送的亲，在曲阜借住孙宅房子举行婚礼。因为我的公公柯劭忞病重，就由我丈夫的大哥柯昌泗代替家长陪同来；我还记得结婚那天一早起来，王妈妈就给我梳头，梳完头叫我吃了两个煮鸡蛋，换上衣服，坐在前堂楼堂屋的正中间等轿子来娶。当差的和老妈妈们都穿着新蓝布褂子。我穿戴着凤冠霞帔、乘八抬金顶花轿，孔府大门口搭着红布牌坊，院里都搭着彩棚，门外挤满了围观的人。奏乐声，鞭炮声不断。我什么也看不清，听不到，恍恍惚惚的，当时正值酷暑，我头戴凤冠、珍珠翡翠一大堆，穿着霞帔，大长裙子，闷得我出了一身汗，把里面的衣服都染红了，可是当时自己也没觉得。

我结婚第二天上午，小弟就去孙宅看我，下午我们又回门磕头，在后花园凉亭请客吃饭。本想婚后在曲阜多住些日子，但婚后第三天，北京来急电柯劭忞病危，于是匆匆忙忙地告别家乡，赶赴北京。从此，就结束了我在孔府的生活。上车的时候，我穿着一件粉红旗袍，旗袍下摆绣着一只大凤凰。告别了亲人和家乡，告别了我的朝夕相处的骨肉兄弟，挥泪远去北京了。

在我快结婚的那些日子，小弟的饭量大减，我还记得临别时，他说：“你和大姐都走了，府里就剩我一个人了。”他说话时神情凄然，一点不象个孩子。

我离开曲阜的第二天，小弟就病了。当时刘梦瀛不在曲阜，请的乔先生看病，不知是因医术差些还是什么原因，拖拖拉拉地治疗了多日才痊愈。老师知道他想念我，对他格外照顾。他生病时就叫他住在家学的院里。在他病好以后，除了上学，不让他到后花园或内宅来，怕触景生情，总是带他到外面

三皇庙去看戏或到燕宾楼饭馆吃饭，并借我们的三爷孔印秋生日的机会，请客摆筵，想给他解闷。小弟很感谢老师的关怀，但是实际上这也无济于事。我结婚后，他为自己又起了个字叫“子余”，就可看出他的心情，孤独一身，无限寂寞之意。“子余”这字后来他还时时使用。他给我写了许多诗，虽然不是什么佳句，但最能打动我的心，当我远离家乡，婚后又琴瑟不和，郁郁寡欢，思念亲人；每当读到小弟来信，常是泣不成声，反复诵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我还依稀记得一些，抄录如下：

怀 二 姐

黄昏北望路漫漫，骨肉相离泪不干，
千里云山烟雾遮，搔首独听雁声寒。

夜 中

寒夜桥声觉更迟，青灯光下自吟诗，
独叹岁华今又晚，万里月光寄相思。

夜 雨

夜雨三更后，愁人思女兄，
纱窗凉似水，蕉叶滴余声。

秋夜书怀

铜壶漏响三更幽，独对明月感旧游，
何当再逢共话夜，晚雁声里残灯秋。

无 题

天涯久未通雁书，倦首惆怅问双鱼，
菊老西风人亦病，黄叶林中暮已疏。
话酒浑忘漏已深，秋灯频剪月华勤，

遥怜我姐蓼城住， 镇日思亲独自吟。

（蓼城是指我所居住的蓼园）

晚 眺

万点愁思晚眺中， 夕阳欲落别样红，
遥看千里云山外， 几行雁影灭远空。

我结婚后也经常回孔府，有时是和大姐同去，有时是我自己去，每次回去，小弟都欢喜若狂，不去上学，终日陪伴着我。

这个时期，小弟的学习更为勤奋，一般情况他绝不肯停课。即使有中外要人来拜，客人刚走，他就立即回书房念书，无须老师提醒；在性格上也逐渐摆脱了孩子气，思想开始成熟了。除了老师规定的功课，他很喜欢钻研董仲舒的礼，向往着有所作为，他曾写过这样的句子：“长龙远飞驾、天马自行空”，“于古人书无不读，则天下事大有为”，“松风临水朝磨剑，竹月当窗夜捡书”，对于世势，有感而发写道：

“回首茫茫世如何， 且看荷里数只荷，
荷残犹能发新枝， 傍晚雨声潇潇多。”

我和大姐都住在北京西城，她住在羊肉胡同，我住在太仆寺街，相隔不远，经常来往。自从我到了北京后，大姐显得快乐多了。但每想到夫妻关系，出于旧礼教的观念，又不大愿意说自己丈夫的坏话，常是姐妹二人默默对坐着。然而我结婚不久，因为我的丈夫在天津做事，就随同来天津居住，我和大姐又分开了。

在天津时，一天突然接到冯四小姐打来的加急电报，大姐

病危，要我速去。我当即动身回到北京，大姐已经昏迷不醒，北京的名医孔伯华刚诊断完毕，好象也没有说什么，开了些药就走了。我亲自用小匙喂汤药，已经很难下咽。当她醒来，费了好大力气说了一句，“不用喂了”。以后嘴角微动，想说什么而无力说出，只是看着我，眼里无限哀伤，眼角挂着一滴冷泪，辞别了人世，现在回想起来，那情景历历在目，使人心碎。

大姐去世时，她的丈夫不知是良心发现还是怎么回事，竟然也落泪了，真没想到。

大姐停止呼吸后，嘴唇和手指甲都呈黑色，据说是服毒的反映，当时是抗日战争初期，小弟德成正远在重庆，音讯不通。曲阜孔府只有本家亲戚代为照料。因为大姐的死很值得怀疑是自杀，所以孔府派了个本家到北京来与冯家打官司。孔府当然给了一笔钱做为打官司的费用。孔府派的人到北京后，冯家觉得这事张扬出去，名声不好，就贿赂了来人五百元大洋。结果官司没有打，孔府派的人带着孔府给的钱和冯家贿赂的五百元大洋逃跑了，下落不明。多年后才听说他到青岛享福去了。抗战胜利后，德成曾来过北平亲赴大姐停灵的法源寺致祭，并且题了诗，在灵前停留很久，非常伤心。

大姐死后一年，我和丈夫、孩子又回到北京，仍住在太仆寺街。

太仆寺街柯家是一片很大的宅园，其中东大园及其楼房被日本宪兵司令部的一名高级军官强占；后面有一部分租给当时的警察局长居住；我们自己只余下四、五十间，大哥柯昌泗、二哥柯昌济都已分出另过，两个姐姐也都结了婚，柯劭忞去世，人口很清静。

我的丈夫日夜不在家，偶回家来，多是向我要钱，要珠宝首饰，而且态度极粗暴。我在孔府从来没见过象他这样发脾气的，在这种情况下真是毫无抵抗能力，只有我的王妈妈敢为我争辩，但她终于也回曲阜了。后来到底是我所有的陪嫁珍宝钱财、碑帖、字画全到了我丈夫手里。

那时小弟远在重庆，音信不通，大姐又去世了，孔府内又没有亲人，不便回去，我独自在北京带着一对小儿女，卧室后面有个花园叫“蓼园”，因那园中有许多野生的蓼花而得名。

我的公公柯劭忞曾写了一本诗集《蓼园诗抄》。卧室有个小门通向蓼园。我每天总要长时间在园中散步或闲坐，我在北京生活很寂寞，非常思念家乡，思念手足。“每逢佳节倍思亲”。每到中秋节，我常常想起孔府内宅前上房的院里两棵大石榴树，我在孔府时，常和小弟在中秋节采摘那树上的石榴，我便在蓼园，我的房门两侧各种了一棵石榴；想到我们姐弟每天去书房读书必经过一棵大腊梅树，常在腊梅花前玩耍一阵，便也在蓼园栽了棵腊梅花。还有在蓼园种了两大盆荷花，也是因为想到孔府后花园里的荷花。总之借物托情，蓼园里许多处都流露着我对家乡、对亲人的情思。我也常常在蓼园的花前树下，向我的女儿讲述那一个又一个有关孔府的故事，和我童年的生活。

在太仆寺街和柯家毗邻的是曲阜孔府设在北京的官邸——圣公府，大概建于明末清初，规模自然不能与孔府相比，但也相当的大。我的父亲在世时每次来北京都是住在这里，最后一次来北京也是在这里去世的。

随着孔府的衰败，太仆寺街上的圣公府也破落下来。油漆斑剥，屋顶长着枯草，逐渐住进了一些外姓人，但他们大多是

住在前面两进院子里，因为和孔家是亲友关系，被允许住在那里。里面的几进院子和正房，仍是住着孔家的本家。

大约也因为这圣公府和柯家是近邻吧，孔、柯两家来往很密切。我的父亲孔令贻和我的公公柯劭忞是多年至交，他俩也常在皇宫见面。父亲生前曾当面托付柯劭忞为他死后写墓志铭，在父亲死后与陶氏及我的母亲合葬时，柯劭忞为我的父亲写了墓志铭。

在圣公府里住着我的一个远房叔叔，他和柯昌泗是换帖兄弟，和冯恕家也很熟悉。我的婚事，大姐的婚事，都是他做的媒，因为我们姐妹婚后生活都不美满，所以和这位媒人也不太来往。

在圣公府最里面一进院子，还住着一位老太太，比我高五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本家，我和她来往密切。小弟德成的婚姻就是她做的媒，德成的夫人孙琪芳是她的娘家侄女，竟差了四辈。

圣公府里还住着一些孔姓本家，与我也常来往。我在北京时，因为有了这个圣公府，解脱了不少乡思。

曲阜十二府里有的本家，后来因生活原因也迁到北京圣公府；有一位十二府的十一婶，我在孔府还时有走动，她来到北平后也常来玩；但她同样是不幸的，后来服鸦片自杀了。

在那不幸的年代，大家族中的妇女多是悲剧式的人物。我记得圣公府里还有一个远亲，那是个七十来岁的老头子，他有个很年轻的姨太太，模样也很好，我结婚来到北京时，她已经疯了，终日坐在圣公府门前哭笑，我没问过她疯的原因，但那是可以理解的。

2.大婚盛典

孔德成启事

谨詹于国历十二月十六日午刻与孙琪芳
女士举行结婚典礼洁治喜筵

恭候

台光

孔德成谨启

(礼堂设曲阜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府)

这是德成结婚的请柬。关于结婚情况，当时许多报纸都刊登了文字及照片。

德成夫人孙琪芳，安徽寿州人，是前清状元、曾任过礼部尚书的孙家鼐之孙女。孙家鼐在宫廷任阅卷大臣，毓庆宫行走，与尚书翁同龢教皇帝读书。孙家世代书香门第，孙琪芳文学甚佳，人也很老实，较德成年长一岁。德成结婚时十七岁。

孔、孙两家关于婚事商议了很长时间，最后决定以半新半旧的形式举行婚礼：新娘穿新式礼服，白纱拖地长裙，高跟鞋，都是在北平定做的，德成则穿长袍团花马褂，仪式是行跪。结婚前孔府里大兴土木，从大门到内宅最后，全都粉刷一新，而且还有些改革的意思。过去孔府大门上画着两个门神——“哼哈”二将，在这次都去掉，改为红漆大门；屋顶彩绘着蓝底金

色的团龙也都改为云头。大门外搭的戏台，两边还有两个看台，大红牌坊，大红宫灯，门口立的杉竿，挂火鞭用的。新房设在后堂楼，从一进大门，一直到内宅的后堂楼都搭起彩棚，是由孔府内棚匠自己搭的，很好看。棚的四周上部是“五福捧寿”的彩色玻璃，顶是红布和绿布条编织成的。彩棚里挂满了亲友和官方人士送的喜幛，光是挂这些喜幛，就从济南雇了二十个工厂的工人来挂了一天一夜。喜幛上都有用棉包金的大喜字，孔府里各个门上都挂着彩灯、宫灯，形式多样，有带小铃铛的，有带小穗子的。结婚那天各门上都有奉卫丁站岗。

结婚前孔府上下忙于准备，除大兴土木工程，还要日夜忙于准备招待客人。西学的所有房屋都腾出来，准备给远道客人居住。孔府里还组织了一大批人整天缝制招待客人的被褥。孔府里的数百名仆人每人也发了布，做身新衣服。

孙家从北京往曲阜运送嫁妆，在结婚前一天才过完，本来孙家还要陪送全套西式家具，孔府提出因路途较远，运输不便，希望不要做，方才罢休。从窑村车站下车后，路上要跟上全套乐器，吹吹打打，抬嫁妆的人都要披红彩绸。

陪嫁的金表首饰，瓶镜用具，锦缎脂粉等珠宝玉器都摆在院子里，院里摆不下，新房后堂楼里也摆了很多，至于衣物被褥则不在内。

婚前三天，孙琪芳由其母及其妹孙莲芳（孙莲芳嫁给北洋政府财政部长周学熙的孙子）陪同来曲阜，借住在东五府（顺先堂）。

德成结婚时，大姐还没有去世，我和大姐同返曲阜，同去的还有我的儿子柯睿、女儿柯兰以及我的丈夫柯昌汾，大姐的儿子众寿、女儿小康，还有几个随身仆人。我们在兖州下车后，

孔府派小汽车在车站等候（这时孔府的马车已换成了汽车，是曲阜城唯一的一辆）。我们仍住在当年的绣房前堂楼。

德成结婚，由我做伴娘，一同去东五府迎亲。

迎亲队伍很长，前边已经进了孔府，后边还没出顺先堂，迎亲队伍也是旧式和新式相结合，有些地方还保留着祖传的规矩，最前面是全套五班乐器（戏乐），后面是扇、伞、銮驾、军牢、夜役、金瓜、钺斧、朝天凳等全套执事。按老规矩，轿前有两对白色吉羊，两大彩绘坛子喜酒，由穿彩衣的小孩抱着，还有两个小孩背子孙桶（马桶）桶内放银元。还有抱镜子的，抱火盆的……这些小孩进到孔府后每人要给二块银元。

去迎亲时德成乘坐绿轿子，我坐汽车，新娘乘坐的八抬金顶（公爵以下为银顶），花轿中坐着娶亲太太，由一位本家太太担任。到新娘暂时借住的东五府，完全按照旧式的礼节由德成拉弓、射箭等等，才把新娘搀出来，从屋门口用花轿抬到东五府大门，换乘与我同坐的花汽车，到了孔府大门又下汽车，换乘花轿，从孔府大门口抬到举行仪式的前上房，孔府内开仪门，设彩亭，花轿从仪门进去，前上房院内摆着二十张绣围铺毡的长案，上摆龙凤饼，喜盐、枣、栗子、莲子、花生、松子、桂圆、凤枝等果品，以及松柏长青枝。新人面向正东方下轿，迎喜神，前上房长桌上也摆着五供香筒，这些都是老规矩。从花轿一进门，穿西装的记者们就迎了上来，闪光灯不断，新娘又是白纱长裙，高跟鞋，我也穿白纱长裙的伴娘礼服，高跟鞋。我们的这新式礼服和鞋都是在北京王府井定做运来的；德成穿长袍马褂，不穿新式礼服，我们到王府井定做时，只做新娘、伴娘，不做新郎和伴郎的，服装店里的人十分惊奇。

新娘穿着西式白纱长裙礼服，和德成行一跪四叩大礼拜天

地，行完礼，搀扶新娘到后堂楼换装。新娘穿着丝绒花的大红旗袍，大红缎鞋，梳髻，在新房坐帐、喝交杯酒。

那天唱了三台戏，大门外街上唱一台山东梆子，三堂唱一台昆曲，前上房唱一台京剧，是从济南、北京、天津请去的名演员，前上房那台京剧、唱的是《奇双会》，三堂和前上房的戏都印好了演员表，剧目介绍发给来宾。那天凑巧下雨，来的人又多，来来往往太挤，三堂的戏无法开演，临时改到二堂去演出，许多国民党要人都参加了婚礼。原订蒋介石也来曲阜，但在婚前四天（十二月十二日）发生西安事变，蒋被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扣留。曲阜对西安事变不详，也没有接到蒋不参加婚礼的通知，所以在结婚那天，因等待蒋介石而迟迟不举行仪式。到了下午两点左右，国民党驻兖州二十六师师长孙桐萱来到孔府，通知不要等蒋介石了，才开始举行婚礼。蒋介石送的缎幛悬挂在前上房正中，国民党中央党部送的银鼎、织云锦幛；孔祥熙送的银鼎、画金对、衣料外，还有一千元喜仪；宋哲元、戴传贤、叶楚仓等许多国民党要人以及曹锟、徐世昌、班禅、黄金荣等还有许多社会团体也都送了礼；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日本陆军武官石野芳男以及许多国外人士也送了礼品。孔府的佃户也前来贺喜送礼，招待佃户是在大彩棚里，由外厨房开饭，吃“拾大碗”。一次开一百桌席，一个“司席员”负责十桌，随来随吃，前来贺喜的络绎不绝，从上午开饭到晚上十二点还没开完。

演员和职工的饭由中厨开，贵宾和内宅亲友的饭由内厨房开，厨房只管做菜。庶务处供应馒头、酒。内厨房的酒席设在忠恕堂、红萼轩、花厅、前堂楼、后堂楼等等内宅各处，一次开十五桌，规格是三大件（四十多道菜）和九大件（一百多道

菜)。

第二天早晨，新娘要向伯母、大姐、我，以及许多本家长辈们逐个请安。后面跟着个老妈子，端着的大盘子上面放许多盛有桂圆汤的小盖碗；新娘、新郎向长辈磕完头，由新娘敬桂圆汤。长辈的都要给见面礼，也无非是衣料之类。接过见面礼，都放在一个很讲究的长方捧盒内，以红绸覆盖，下面有许多丝穗。

新婚的日子里，德成夫妇常出去玩，那时孔府已有了一辆小汽车，是辆德国车，很矮小，常出毛病，曲阜的土路又坎坷不平，汽车经常半路抛锚，有时德成和琪芳不得不下来帮助推车。那时他们外出很少带跟着的人，有时候买了零碎东西，琪芳就亲自提回家。

他们住在后堂楼，布置样式也是中西结合，有西式沙发，也有老式桌椅，墙上挂着梅兰芳亲笔画的梅花，桌上摆着《孝经》，从结婚直到抗日战争前夕赴重庆，一直住在这里。

3. 奉 祀 官

小弟幼年常常和陶氏一起听“回事”。陶氏每天上午都要“办公”——坐在前上房的书案前，听管家、帐房等禀报各类事项，阅批许多公文。由当差的来顺站在旁边侍候。小弟九岁那年，陶氏患半身不遂，于是这类公事就由小弟独自做了。不过他不是坐在书案前，而是和我一块玩的时候，三爷孔印秋来找他。孔印秋是十府的本家爷爷，以忠厚诚实 in 族人中著称；我的堂伯父去世后，就请他来主持孔府的对外事务；孔印秋十分尊重小弟，每天有什么事总要和小弟说说，征求意见。小弟

常对他说：“三爷爷，我年纪小，不懂事，有什么事您就看着办吧”但不管什么问题他提出解决办法后，还总要经过小弟批准，常在我和小弟钻山洞捉迷藏或唱戏玩的时候，孔印秋拿着文书来找，文书告示都由师爷陈云朗起草，小弟用毛笔在上面写个草书的“行”字，孔印秋拿着走了，我们又继续玩。

一九二四年冬，孔府把四氏学扩建为阙里明德中学，用意在于今天是“德之不明”，“经之见废”，所以要“明德”。第二年春，明德中学正式成立，小弟五岁，出任明德中学校长。后来他一边上家学读书，一边在明德中学学习，只是每天去学一堂英语。这样，他既是明德中学校长，又是明德中学学生。

孔府里常有中外贵宾到来，他七岁时写的条幅对联悬挂在孔府的大客厅里，每次贵宾来访，小弟都要被领去接见客人，又要学一套繁琐礼节。在宴请贵宾时，要设“高摆酒席”，摆出孔府的“高摆餐具”，上菜一百三十多道。但出于礼仪，小弟吃得很少，常在客人刚走就嚷着饿，立即给他重新开饭。

有的军政要人来曲阜是私访性质的，如蒋介石；有的则十分隆重，如孔祥熙来，孔府要大忙特忙；孙科、冯玉祥也来过，还写了好多诗；韩复榘是孔府的常客，说话很粗鲁；戴传贤则文气些，他来时，见到小弟，夸奖小弟：“少年英俊，文质彬彬，济美前徽，可为亲庆”，还将他母亲手抄的《孝经》等书，赠送给德成。

客人们时常带些礼物来，孔府也要回礼。孔府送礼就是汉魏六朝碑帖，圣迹图之类。这些东西很名贵，有许多国民党大官并不懂，就因为值钱，向孔府索取，孔府应接不暇，拓制很多，对碑庙有损坏又不能得罪他们，后来想出个办法，将一些

贵重碑石都帖上了黄封条，情况才有好转。

也有群众团体来访的，如：北大旅行团，齐大旅行团，来孔府后都要求见见“小圣人”，小弟只在外面客厅见几分钟，照张像。

有时小弟也要外出会客。如韩复榘的儿子结婚，要去济南贺喜，有时就不亲自去，上海哈同去世，小弟为他题词“诚朴作人”寄去。〔注：哈同（1847—1931）美籍犹太人，凭借帝国主义势力，进行大规模房地产投机，成为大资本家。〕

外宾也很多，有的外宾来以前由孔祥熙或国民党政府打招呼的，也要隆重接待，到兖州迎接。会见完客人，小弟常常立即回书房读书，或我们一同游玩。

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决定将孔德成的衍圣公爵号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并享受特任官待遇。同年六月，德成偕颜世镛、孟庆棠、曾繁山先到济南与省府主要官员们见面，然后转车去南京。七月八日，由陈立夫领导、戴传贤监誓，德成宣誓就职。然后又专程到上海拜见孔祥熙，孔祥熙为他举行了盛大宴会。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还是由陈景荣、吴建章跟着，德成在上海期间，还亲自去选购几块衣料，给我寄到北平。

上海孔教会举行热烈欢迎活动，德成发表讲话。返曲阜后，将从南京取回的奉祀官大印，供奉在大堂里，由济南找来金匠开印。是方印，“文官难得方”，开印时鸣鞭放炮，门前扎红彩，象办喜事一样，盛况空前。

改任奉祀官称号后，有些编制也相应有了变动。除原来孔林的林役、孔庙的门斗，正身外，又设招待员，身着侍役制服。还鉴于八佾古乐失传，在东学成立“古乐传习所”，招了八十多名学生，由德成任校长，下设主任、教习、校役等。

德成小的时候，孔印秋召集帐房或员役开会，常找德成去听。在德成十七岁结婚后，即正式接管府务，实际上在结婚前即已经接管了。当时许多事情杂乱无章，五六百员役中也有不少问题，外面田庄上的帐册很不清楚，德成下大力整顿了一番，现在回忆起来有以下一些改革：

一、规定了考勤制度。

过去孔府的员役愿意什么时间来就来，愿意什么时间走就走，非常随便，德成规定了上下班时间，上午7—12点，下午2—5点，各处建立签到簿，每日统计，有事不来者必须请假，旷职一次记过，三次记过开除，按时上下班者，定期奖励麦子二斗。

二、给孔府员役发了符号，长方形，白布印黑字，并编有号码，佩戴胸前，定期更换新样式，以免遗失被别人混用，这样就减少了以前发生过的，有外人冒充孔府工作人员在外面招摇撞骗的现象。

三、制定孔府员役纪律及各处职责，如：太平缸内必须水满，随时铲除杂草，临时来客所领物品要登记，用后归还，保护古玩字画，走路要有规矩，各处人员非有传谕不得任意走动，等等。

四、取消了“斗尖粮”，改为赏钱。

五、查出曲阜附近魏庄、东北场等十多处屯庄征收祀租清册未交，限期交齐，失责革职。

六、发布谕告：凡内外员役有犯法者一律开除，其所享受之政府免役权亦呈报政府取消。

七、府内物品统一登记清理，人员裁减增补，款项动用，都要经德成亲自批准，除上述各项，在人事上也做了调整。我记

得有个管田庄的当差陈景堂，德成查出他盗卖祀田，十分生气，将他开除。但对于他的胞兄陈景荣仍然做为亲随，很重用，并未株连。还有个当差马海，屡次旷职，被扣发口粮，停职一段时间。也给一些勤于职守的人奖励，还周济了一些穷苦本家。以他那小小的年纪来管理这样大的家务，确是不容易的。

那时候，常有外宾来，其中日本人最多。

早在“七·七”事变以前，日本政府就曾派人到曲阜进行活动，目的是想拉拢德成，利用他的影响以有利于侵华战争。一九三三年，德成十三岁，日本前民政党领袖犬养毅就带着女儿来曲阜看望德成。日本人来孔府都是以学术研究或私人名义来的，都穿便服，少则一人多则十几人，几十人，象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所长理学博士新成新藏就是自己来的。由驻济南的日本领事介绍前来的一个视察团、团长叫松勇雄治，带领五十多日本人专程来拜会德成，他们都住在忠恕堂，说是青岛体育协会的人。还有个叫佐藤猛雄的带着十多人来看德成，也有没见过面的日本人直接从日本寄礼物来赠送给德成的，有个叫马场春吉的日本人，先后多次来曲阜，住过很长时间。绘制了“圣迹导游图”，对于孔府、孔庙测绘非常仔细，连各门的尺寸都详细量过。以后在日本东京汤岛仿照曲阜孔庙的样式也兴建了一座孔庙。日本的孔庙叫“斯文会”，根据曲阜大成殿上“斯文在兹”的横匾得名。在我的记忆中，不少人曾来研究过孔府和孔庙的建筑，其中时间最长，最仔细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梁思成，再一个就是这个马场春吉了。

一九三五年日本政府发出邀请，要孔德成及孟庆棠等去日本参加日本的孔庙落成仪式。从当时形势分析，日本有可能将

孔德成扣留，所以德成没有去，而是派了个本家孔昭润做代表前去参加仪式。日本方面还托孔昭润给德成带来一些书籍等礼品。后来，日本曾派人来曲阜设宴请德成，德成推辞有病没有赴约，做诗一首致谢：

余病未能延国宾，云涛万里聚风萍。

江川洙泗源流合，况是同洲岂异人。

一九三七年七月的一天晚上，驻兖州七十二师师长孙桐萱带着四个护兵突然来到孔府，德成在忠恕堂接见（德成结婚时，就是孔桐萱前来通知不要等蒋介石来再举行婚礼的，那次是孙桐萱和他老婆来的，赠送了一套沙发，至今还摆在后堂楼当年的新房里）。这次孙又带来蒋介石的急电，通知德成立即离开曲阜去重庆，而且要连夜动身。省政府原打算迁到曲阜，设在孔府里，孔府西学红萼轩等多处房屋都已腾出来了，并且挖了防空洞，但情况有变化，孙桐萱说，黄河大桥一炸，省府立即撤走。德成不愿在日本统治下苟且偷安，但又顾虑祖庙无人奉祀世代居住了两千多年的故乡，突然离开也是不容易的，迫于形势也只得草草收拾，当时有个本家叔叔孔霁光，任过山东省财政厅科长，一九三七年六月刚由济南搬来住在孔府，德成派人喊起孔霁光，拜托他代理奉祀官，由我们堂伯母袁夫人分担照料内府，重大问题由族长、四十员协商，并请老师王毓华、庄陔兰协助，本计划半夜两点动身，结果到早晨四点才在孙桐萱一再催促下匆匆启程。随行的有孙琪芳从北京带来的乳母张妈妈，德成的吕老师及贴身男仆二人。据说走的时候，孙琪芳正在梳头，还没梳完头就催着上车了。

第二天孔府里的数百名员工才知道德成已经走了，许多老

仆人悲恸大哭，当时弟媳孙琪芳已怀孕待产。

德成到武汉时，发表了抗日宣言。路过湖北，孙琪芳产一女孩，取名孔维鄂。到重庆住在歌乐山，蒋介石特为德成建了奉祀官府。

从先祖孔子到小弟德成七十七代了。历史上只有四十八代孙孔瑞友在南宋时期离开家乡随宋王南迁过，但那时还有他的亲弟弟留在曲阜守庙。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我很快就收到了德成从重庆的来信及全家合影，随信还附寄来了德成的女儿维鄂，儿子维益给我的信。那时他俩都正在上小学。这年冬天，我就和儿女等去南方了。我们乘飞机到上海，德成和他的秘书专程由南京到上海机场迎接。姐弟久别重逢，孔府里的亲人又只剩下我们两个了，真是不胜感慨。德成拥抱着我，许久说不出话来，我也禁不住流下热泪。

我们在上海玩了几天，就同车去南京了。德成的家住在南京琅琊路，一座灰色小楼，和邵力子、陈诚的住宅相对。小楼后面是加拿大大使馆。环境幽静，但颇有些“洋”气了，只是德成生活还带有孔府特点。那时虽然美国货已畅销大城市，一般的官太太们也都打扮得很摩登，我的弟媳孙琪芳二十多岁，也很年轻，但仍梳旧式发髻，身穿旧式旗袍，德成也常穿长袍。家里的仆人仍是八年前从曲阜带出来的那几个人。

除琅琊路住宅外，又在夫子庙附近四海里租了一层楼房，设“孔德成办事处”，王、吕二老师及几名办事人员住在那里。德成月薪八百元，负担日常生活及办事处开支，还经常要应酬客人，经济很拮据，自己连汽车也没有，我们出去时常常借朋友的汽车。我们到南京后，正值伪国大开会期间，德成每

天去开会，很忙，但他还是抽出时间陪我到南京各处游玩，也尽量多在家里和我们一起吃饭。王毓华老师由曲阜去南京找他。德成委派孔灵叔（令鏖），王毓华回曲阜来接收孔雪光的工作，组成孔府管理委员会，秘书是李炳南，管理委员有孔鲁泉，孔灵叔，孔恩亨，孔纯洁。德成在南京四海里（后迁至桃园新村）的孔德成办事处，经常召集至圣府管理会议，研究各县征收占用祀田、孔府员工勤怠奖惩，筹划款项，周济穷苦本家等事項。

一九四八年他要去美国考察文化，我们全家就暂住苏州。德成赴美前又到苏州来看望我，住了数日。一九四八年末，当时形势已很紧张，德成匆匆回国准备赴台湾，我又去南京。我们姐弟又分别了，临别依依不舍，再三互道珍重。

此一别，转眼已是三十二年。追怀往事，不胜缱绻；天各一方，相逢何年？但愿台湾快些回归祖国，以期姐弟团圆之日尽早到来！

六、重返故乡

离别故乡四十年了，故乡早已没有亲人。然而，那遥远的童年记忆，那对乡土的深切眷恋之情，依然萦绕在心头，牵动着我的梦魂。十年动乱后，从报纸上知道遭林彪、“四人帮”破坏的曲阜古迹已整修一新。我的心情异常振奋，终于想要回去亲眼看看了。尽管那里都是陌生的人，使我有些疑虑不安，但我还是带着女儿柯兰、儿子柯达和外孙刘勇回来了。

在兖州下车，受到了前来迎接人们的盛情接待，我住进了原来的家——孔府。

第二天清晨醒来，窗外一片鸟鸣，凝神细听，惊喜地和孩子们说道：“树上还有这么多‘哇子’呀！”这种小鸟的学名叫鹭鸶，“哇子”是土名，它们只生活在孔府的大树上，而孔府外面却一只也没有。我童年时就很喜欢它们，离家几十年来，它们常常在我的梦中展翅盘旋，而我那思乡的梦也如它们一样飞在故乡的上空，我的乡思如它们那灰的、白的颜色一样朴素，如那啼声一样深沉。我推门出来，久久地望着停落在古树枝头的“哇子”，它们有的引颈长鸣，有的绕枝飞舞。我领着孩子们从地下拣起它们一些散落的羽毛，做为纪念。

我环顾庭院，仍旧是花木扶疏，幽雅清静，厅堂绿瓦飞檐，雕梁画柱，在早晨的阳光下越显得绚丽夺目。我漫步在刚刚油漆彩绘过的长廊里，一边回忆，一边向孩子们讲述着每间

厅堂和厢房的特点。

前上房院里，一棵“十里香”象个小凉棚似的，开满密密的小白花，香气袭人。我不由得停下脚步。当年，我们姐弟在前上房读书写字时，每到夏季，这花香阵阵飘进窗内，常惹得我们停下笔，跑到花下玩耍。我们当年使用过的砚台，如今还摆在前上房的书桌上，那情形犹如昨天一般。陪我们的同志，希望我能留下一点话语，以作还乡纪念，盛情难却，提起毛笔，暗暗沉思，由于长久没写毛笔字了，手中好象拿着一根铁杵。但还乡的激情使我写下了贺知章的名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我还能说些什么呢？这诗句就足以道出我此刻的心情了。

孔府的室内陈设，大体恢复了原状，厅堂里多处悬挂着父亲孔令贻和小弟德成的墨迹，这些墨迹已成为曲阜文物一部分，条幅和对联被复制成拓片，在当地文物商店里出售。

前堂楼西间，悬挂着母亲王夫人的大幅照片。这是母亲生前的卧室，我们姐弟三人就出生在这间屋里。我们出生时，摆在桌上的一对座钟，现在仍然在走动，我俯下身仔细听听钟摆走动的声音，还是那样清脆、均匀。

在小弟德成结婚的后堂楼东间，仍保存着结婚时的陈设，沙发、书桌等都放在原处。桌上的插瓶、镜台等也都是弟媳孙琪芳的陪嫁。在里间卧室墙上挂着一张他俩夫妇和两个孩子的合影。我想起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和我的孩子们乘飞机由北平去南京看望小弟，他从南京专程到上海机场迎接，八年离别，姐弟在舷梯旁相会，他留给我的印象和这照片上的模样儿完全相同，我凝视着照片，好象又看到了亲人，不忍离去。

德成结婚前，和我共同居住的前堂楼，院内两棵石榴树几

十年来又长高了许多，果实累累，枝叶也更加茂密。记得从前每到中秋，我们常常在这树下赏月，摘采石榴。现在又正值中秋季节，我已年过花甲，独自在这里手扶树干，遥望南天，思念远方的亲人。“举首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远方的亲人，这时也是同一种心情吧！

现在，孔庙已重新修葺，金碧辉煌，焕然一新，十三碑亭，诗礼堂，许多厅堂殿庑都已施工完毕，还有一些未完工程，许多工人在忙碌着。我站在杏坛前，仰望宏涂壮丽、气势雄伟的大成殿。大成殿屹立在双层平台上，平台四周围着半人多高的汉白玉栏杆，我走到殿左侧一根栏杆前，指着一根石柱的雕花顶石对孩子说：“这根栏杆和其它根，从表面看没有区别，但是你用手拍拍这块顶石，它能发出响声，别的就不响，这叫响石。”我的小外孙高兴地用手拍击着，贴耳一听，果然发出如悦耳的琴声。

又一天清晨，我们来到了孔林。汽车沿着新修的环林公路缓缓行驶，在我的父母墓前停下来。墓靠公路，三面古树参天，墓前石案依旧。墓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砸碎，现在又完整地修复好，只是在碑的中部留有一条粘合的痕迹。碑石在晨雾中，沾着晶莹的露水，我静默在墓前，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离开父母的坟墓，我们来参拜先祖孔子墓。墓前泰山封禅石、石香炉，黄养正题的篆字石碑都完整无缺。陪同的同志告诉我说：十年动乱中，当地老乡们看到碑墓被毁的情形，都非常痛心。就在孔子墓被毁的当天夜里，有些人冒着危险，悄悄来到这里，在草丛、泥土中找出被砸的碎石块，把它们收藏起来。粉碎“四人帮”后修复孔子墓，这些乡亲们就纷纷把收藏

的碎石块献出来，被砸碎的原物才得以修复，群众中类似这种保护文物的事情还有许多，如孔府大门上那块金字竖匾，曾有人命令一个农民摘下去烧掉，但他没烧，小心地藏起来，一修复孔府就拿出来挂上。还有孔府门前那对精雕的大石狮子，当时曲阜县一位县长得知有人要毁坏石狮子的消息。他急忙找人用木板将石狮子罩起，并在木罩外面贴满当时流行的标语，才使这对石狮子免于粉身碎骨的灾难。当地的干部和群众，就是这样，冒着被批斗，被抄家等等危险，机智而勇敢地保护了曲阜的古迹文物。这些感人事迹，使我想到：人民尊重历史，并能正确的评价历史；对于孔子在发展我们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历史中所占的地位，是不容抹杀的！

曲阜的乡亲们有人知道我回来了，都用热情的眼光欢迎我，有的拉着我的手，喊我小时候的名字，使我非常感动：乡亲们没忘记我呀！

从我出生到离开曲阜为止，我在孔府里生活了十多年，那时，孔府里面和外面是隔绝的两个不同的世界，对墙外的人民情况我一无所知。由于好奇，我曾站在孔府里高墙根下一个大土堆上，扒着墙头，偷看过外面的过往行人。除此，我是很难有机会到孔府大门外去。而现在，我回乡仅仅几天，就觉得和乡亲心心相通了，心境变得充实，开朗了，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所没有过的。

再见了，亲爱的乡亲们，再见了，我的故乡！

后 记

孔德懋是我的母亲、是孔子第七十七代嫡孙女，这本小册子是我根据母亲的回忆口述整理写成的。

为什么要写这本小册子？我出于两个想法：第一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颠倒历史，大搞“批孔”，把孔子描绘成复辟倒退的祖师爷。这对正确评价和理解孔子这个历史人物，给人们在思想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孔子，做为我国的古代“圣人”，他的思想和学说，当然有他的历史局限性。尤其自汉朝以后，历代统治王朝把孔子的思想尊为正统，备加推崇，并从实用出发，对孔子思想不断加以补充、发挥乃至篡改，使孔子思想成了封建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

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伟大人物，孔子的思想和学说之所以在我国流传了两千多年，除了封建阶级的推崇外，也还有它合理的、积极的一面，不然它不会流传那么广，影响那么深，直到今天还在人民生活中起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足以说明问题的。

本来，写这本小册子并不牵涉到对孔子的评价问题。但如果不是粉碎“四人帮”，恢复了孔子的历史地位，本书是不能写的。这也起一点拨乱反正的作用吧。

第二、也正由于历代王朝对孔子的推崇，使得孔子的后代也

世袭“圣恩”。从宋朝以后，在孔子的故乡山东曲阜就兴建了孔府，距今有近千年的历史，同世界各国的公爵府邸相比，被称为“天下第一家”。多少年来，人们对孔府除去有一种“神圣感”，还有一种“神秘感”，不知道那些住在森严内宅的人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其实在那“万世师表”的后面，既有骄奢淫逸的一面，更主要的它又是一个最能体现封建道德、传统、礼教的活样板，甚至连末代圣人的生母也被无辜毒死。因此，在继续反对封建主义的今天，我希望《孔府内宅轶事》一书，能对人们认识封建主义，多少有一些参考价值。

在写作中，我得到了全国政协、天津政协、天津作家协会、《新港》文学编辑部、曲阜政协、曲阜文管会、天津工人业余文学社以及我所在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董一薄同志在病中给予我亲切的关怀和鼓励，天津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杨大辛、柴寿安同志热情给我以许多帮助，初稿曾在《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辑上发表。

这些帮助和关怀，我除了深深地表示感谢外，还将成为我今后继续前进的力量。

为了尊重历史，反映历史真实，在整理我母亲口述的同时，我还查阅了一些资料，访问过在孔府当过差的老人，但限于个人水平，难免有谬误之处，尚希读者指正。

柯兰

一九八一年五月